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邮发代号:82—507　刊号:CN11—2817/K

炎黄春秋

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历史学家黎澍

蔡元培与北大诸教授

项英的辉煌与失落

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俞平伯

萧克张爱萍“蟠桃”相会

省委书记赵健民三写血书

4

1998

总第73期

本刊举行特邀编委暨在京部分作者座谈会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里，
耕耘着的
有我有他有你。
一篇文章，一点建议，
一条信息，一个主意……
撒下的是关怀呵护，
换来的是田野的碧绿。
莫小视这里的
一草一木一枝一叶，
摄下的是时代风云，
留住的是历史记忆。

（详细报道见64页）

发言者群像→

座谈会全景↓

炎黄春秋

1998/4 (总第72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64031144转2191或2004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8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80元

目 录

春秋笔

②**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历史学家黎澍** …… 丁守和
⑭**新中国外交是这样开创的**
——重读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五封信 …… 高 梁
⑳**蔡元培与群星灿烂的北大教授** …… 姚同发
㉖“大跃进”广西放了颗大灾星 …… 王 定

英杰谱

㉘**访陈独秀江津故居拾闻** …… 欧远方
㉜省委书记赵健民三写血书 …… 席星嘉
㊴黄公略的最后岁月 …… 毛祖棠
㊷萧克张爱萍在“蟠桃”相会 …… 东方鹤

殒星篇

㊹**项英的辉煌与失落** …… 曹 英
㊽**任弼时来到我们红二、六军团** …… 杨秀山
㊿**张经武将军之死** …… 单 超

遗闻录

52常荫槐之子谈常荫槐 …… 晓 觉
54四千日本战友在四野 …… 唐义路
56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俞平伯 …… 舒 云
58肖华为曾思玉作媒 …… 刘永路

时代风

60**名将之后陈方安生** …… 吴跃农

同心结

62**斯特朗沉痛反“文革”** …… 武际良
65爱国华侨陈志昆传奇 …… 张 彦

古今谈

67**真假天堂梦** …… 靳树鹏

赤子心

68**当代茶圣吴觉农** …… 胡士弘

神州光

74**李铎与《孙子兵法》碑拓** …… 任永忠
76折叠伞、三轮车、蜂窝煤的发明者 …… 陈英茨

文荟园

77贺绿汀说周璇 …… 陈浩望
78**皇庄考略** …… 张宝年

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历史学家黎澍

● 丁守和

历史学家黎澍，早年投身革命，在主编报刊的同时，即从事近代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精通马列著作，但绝不搞教条，而是用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他生前的社会实践活动，阅读他的著作和论述，会使我们活生生地感受到他作为史家的深沉，智者的聪慧，战士的无畏。今年是黎澍逝世十周年，本刊不惜篇幅发表丁守和研究员的文章，把黎澍这样一位学者介绍给读者。

我认识黎澍是在 1953—1954 年间。那时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我在中央编译局，一次开会姜椿芳局长介绍说，50 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的《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斗争》社论，是黎澍起稿，经毛主席修改过的。这篇社论我仔细读过，印象很深。所以这次认识黎澍，感到格外高兴。1955 年他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问题有时向他请教，求得帮助，我们写的东西，也送给他看，他也要我们做些事。

在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谁也难于逃脱。1957 年反右派，黎澍为别人讲了些公道话，受到批判。1959 年反右倾，我受到批斗，下放安徽农村劳动一年。回来后姜椿芳告诉我，编译局不再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室的人已多到中央党校。还说黎澍已到近代史所任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希望我去他那里。当我去看黎澍时，他说已同范文澜、刘大年谈过，都同意我调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61 年春节后，我正式到近代史所工作，开始编马列论历史科学，也看些稿件。《历史研究》搬到近代史所，便负责编辑部工作，因只有四个人，组稿审稿编稿校阅什么事都做。黎澍还领导一个思想史组，后改为文化研究室，也由我管，直到“文革”。1975 年下半年，我又随黎澍去《历史研究》两年多。1977 年底开始，我虽不再在黎澍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仍然常去看他，谈谈学术研究、学术界动态等，直到他 1988 年去世前一个月还一起参加理论现代化学术讨论会。

在我与黎澍相识的这三十多年中，受到很多教益。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决不教条。他研讨马列，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不畏权势、敢于仗义执言，执著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总是难于忘怀的。在本世纪初，严复曾说过，学术研究“就是平实的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我觉得黎澍就是努力这样做的。

发表《反对放空炮》，险些酿成大祸

我到《历史研究》后，同黎澍的接触自然多

黎澍(左)于70年代末与作者丁守和合影

起来。在组稿审稿方面,他都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要办好刊物,主要是组织和发表些好的文章。要提倡唯物史观指导,但不能当作套语和标签。要注意稿件确实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物、论之成理,不要发表或尽量少发大而空的文章。

也谈到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建国后提出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对的,也有成绩。但也存在着教条化、公式化的倾向,如空洞议论多,扎实研究分析少,只讲阶级观点,否定历史主义,只强调党性革命性,不重视科学性,还有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等,都是不利于历史科学发展的。应该坚持辩证唯物观点,从事实出发,全面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坚持科学态度。

他还谈过"双百"方针。认为在反右派时把"百家争鸣"的口号当作"引蛇出洞"的策略去用,那是非常错误的、有害的。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允许人们在理论、学术等方面自由探讨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办刊物要重视"双百"方针,就一些重要的具有思想理论意义的问题开展讨论,对提高认识、推动研究和活跃学术气氛,都是有益的。

黎澍接任编辑《历史研究》之初,为使刊物有个新的起色,曾与邓拓商量,请他写篇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研究的文章。这固然有打旗号的意思,但主要是想请他讲讲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针对当时史学界和社会上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甚至破坏实事求是原则而发的。邓拓文章发表在1961年1期,着重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观点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强调无论任何工作,包括历史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态度。

1961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一文。这原是范老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文中批评了当时历史研究中放空炮说空话,写批判文章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戴帽子打棍子等倾向。范老虽然未点谁的名,但实际是有所指的。如上年《历史研究》发表的《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为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而斗争》等文章,戴的帽子很大,火药味十足。原来1958年曾发动一场所谓"史学革命",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认为应以农民战争为主体改写中国历史。近代史所丁名楠等写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某些人便指责说这是以帝国主义为主体,应改为写"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史"。又是批判又是纠正,结果把写侵华史的这个组搞垮了。1960年,翦伯赞、吴晗等对"史学革命"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认为研究历史既需要阶级观点,也需要历史主义,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要重视近现代史研究,古代史也必须研究;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存在,只能研究分析,是不能也无法打倒的等。于是就出现了所谓"为保卫党性原则而斗争"的颇带火药味的"豪言壮语"。

黎澍对这种情况颇为不满。他说,这真是荒唐,难道讲点历史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就是反对党性原则?那不过是用空话吓人,大帽子压人,使人们不敢用科学态度研究历史而已。实际上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历史观点从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并特别强调科学性。他的这些意见曾同范文澜谈过,并请范老专门讲讲反对放空炮说空话等不良倾向,提倡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风。

到发表范老这篇文章时,黎澍又煞费苦心,仔细推敲,反复修改,将具体有所指的话都删去,只是批评一种现象或倾向。我也看过两稿,记得还曾向黎澍谈过,范老反对放空炮,我很赞

成，不过他的文章似乎也是放空炮，未有实例。他说，现在只能这样，如果放实炮那不打着人吗？现在放空炮说空话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限于史学界。这篇讲话发表后，果然遭到某些人的攻击责难，认为反对放空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引起一场风波，甚至被告到中央。好在范老德高望重，尚未酿成大事，但一直到“文革”还是一桩公案。

强调坚持科学性，被诬为反对革命性

有关历史研究中的偏向，黎澍曾向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谈过。周扬当时还兼管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工作。他要黎澍编一本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的书，以便让大家多了解些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编辑要求和编辑体例是黎澍的意见，具体工作是我和几位同事做的。当时还看到同样题材的两个样本，那是以阶级观点为核心编辑的，我们则力求全面、客观些、科学些。我阅读了许多原著和抄写的资料，进行分类和章节安排，分为历史和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研究历史的方法共四章。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两章用力最多。如研究方法就有从事实出发、阶级分析方法、用历史观点考察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特列上坚持科学性。黎澍看后作了修改调整，加上“反对教条主义”、“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套语和标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义愤不能推进科学，客观主义要迷失方向”、“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到惩罚，玩弄辩证法必然导向诡辩主义”等。他在征求意见的“样本”上还附录有黑格尔的两句话，意思是“不能用现代人的思想改铸古人”，“不要把现代人的观点加到古人身上”。文科教材办公室的田珏来谈，说周场看过样本，认为编得不错，还可以再增加些材料。还说周扬对附录中黑格尔的两句话很感兴趣，说我们也有这种现象，应该注意。但黎澍考虑再三，正式出版时还是把黑格尔的话删去了。

应该说，我们编这本书是用了不少精力和心思的，特别是黎澍，他的基本意思是希望大家多读些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个基本了解。他在“编辑说明”中强调，读者应该“注意作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为着什么事而讲这些话的，正确地加以理解”。还提出“最好能查对原文，细绎原意，使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黎澍还同我谈起，马克思主义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是科学，无所畏惧。马克思始终关注实际，研究实际情况，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但坚持科学又谈何容易，如哥白尼、伽利略都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所以坚持科学性，就应该像马克思所说的，要有敢于“下地狱”的勇气。他还说，彭德怀有什么罪？他不过是了解些实情，替人民讲了些真话，结果被打入地狱。我们编这本书，列上坚持科学性，选入马克思的那些不要怕进地狱的话是必要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又被某些人多方挑剔，在当时特别是“文革”中被横加指责。罪名之一是，坚持科学性，而不强调“革命性”，就是“反对革命性，反对党性原则”。罪名之二是，目录上只列阶级分析方法，没有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是把“观点”贬低为“方法”，是别有用心的等。这些罪名是够可怕的，但是是不能安在我们头上的。这些我都向黎澍谈过，议论过。我们当时的意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革命性是与科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性是基础，是第一性的，没有科学性就不可能有革命性。他还说，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科学家、思想家勇于追求科学知识，探索科学真理，敢于冲决宗教神权和中世纪权威，无所畏惧。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表现得勇敢和坚决，就愈加符合工人们的利益和向往。”

至于说不讲阶级观点，那并不是事实，在唯物主义历史观部分，就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节。即使说方法，那也是不错的。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教条，而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方法。列宁也说，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节，而是着重指出“说明问题的方法”。难道这也是贬低阶级观点，是否定党性革命性？黎澍说在战争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是

可以理解的，在建设年代仍然强调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月月讲，实际上是用政治帽子压人，不容许有不同意见，无论什么都是一致一律，几亿人只能围绕着一个人的脑袋转，怎么能不失误呢？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谈，不好谈，但历史的辩证法终久会证明这是错的。

支持翦伯赞，反对否定历史主义

60 年代初，翦伯赞发表的关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多篇论文，揭示出 1958 年以来"史学革命"的不良后果，诸如否定封建社会历史、否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等，批评脱离或否定历史主义、片面强调阶级观点的倾向，提出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写作史书。翦伯赞为此受到某些论者的激烈反对。黎澍很重视这些问题。他认为，解放后我们往往是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很不好。如《武训传》、《红楼梦》讨论，领导人干预，引起大批判，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以为只有通过学术讨论，才能澄清问题，提高认识，推动学术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亲自组织了几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一时引起轰动。

一是农民战争史研究问题。黎澍同蔡美彪商量，请他写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从正面阐述了古代农民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特点，农民战争的起因、要求、口号、作用、意义及其前途等问题，着重讨论了农民战争研究中的现代化倾向，并作了具体分析和批评。文章在《历史研究》1961 年 4 期发表，《人民日报》摘要报道，引起很大争论，反对者赞成者皆有之。我从中选了几篇不同意见的，经黎澍同意，在《历史研究》发表开展讨论。

有一件事使我难于忘怀。刘桂五出差南京回来同我谈，那里军区某领导看了蔡文很生气，说我们就是靠农民战争胜利的，我们对农民很有感情，谁否定农民和农民战争就是"反革命"。我当即作了说明，对农民有感情是一回事，研究农民战争史又是一回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如果将古代农民战争史说得与我们的农民战争差不多，那么古代农民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或被镇压，或受招安，或转化为封建王朝，我们是这样吗？那样的说法不符合唯物史观。我也曾将此事告诉黎澍，他同意我的回答。并说，毛泽东也说过，古代农民战争往往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正说明那时的农民战争没有出路。

二是历史主义问题。从 1960 年起，有些学者就"史学革命"中只讲阶级观点、否定历史主

1986 年 9 月摄于黄药眠家。左起：黎澍、黄药眠及夫人、黎澍夫人徐滨

义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该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有阶级观点，也要有历史主义。1963年《新建设》杂志发表长文，全面批判了历史主义原则及其表现，否定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价值，强调只能以阶级观点为指导。针对这种批评，黎澍请宁可写了《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发表。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使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不能用阶级观点包括或代替历史主义。文中说阶级观点是唯物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是黎澍的意见。是否有当，自可讨论，但强调研究问题包括研究历史，要有辩证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价值，无疑是对的。宁文尽管还是强调了阶级观点，也承认了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但在那个年代，提出历史主义就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很大冲击，自然被视为大逆不道。

在收到关锋、林聿时的批判文章，并予发表以后，我同黎澍商量，可请宁可再写一篇。他很同意，说可以在辩证法方面再展开些，针对关锋文章，多讲些马克思的历史观点。记得还同宁可、胡绳武等谈论过一次。宁可又写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进一步阐明历史主义原则及其运用的意义，同时也强调了阶级观点。在看校样时，我总觉得讲“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过多，而且实在说，我认为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将其说成核心，显然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曲解。如果不纠正这个看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很难坚持的。于是我便将一处改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当然是个原则性改动，但我也忘记告诉黎澍和宁可。待到“文革”时，宁可便为此倒了霉：“你又说是‘核心’，又说是‘之一’，搞的什么鬼?”宁可想不起写过这样的话，只得请质问者到《历史研究》来找我。我虽有印象但也说不具体了。翻阅原稿和校样，果然在二校样上找到我改的字迹，才由我写了证明材料，承担了责任。

“文革”后，我同黎澍谈起此事，他说这样改当然是对的，但只改一处确实造成矛盾，“之一”与“核心”有原则区别。我说在看校样时总觉得这个“核心”不顺，马恩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而社会存在则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不知何时出现阶级观点是“核心”的说法？他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创造”，建国前夕评美国的白皮书时就很强调阶级斗争，认为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本来唯物史观具有丰富的内容，却搞得这样简单化、片面性了。

著文“让青春放出光辉”，提携青年不遗余力

“文革”前，黎澍发表的《让青春放出光辉》的著名论文，影响很大。实际上他在工作中就是努力这样做的。他经常关心青年，帮助青年，鼓励青年认真读书，刻苦钻研，成才成器。同时他又严格要求青年，指出青年的不足，促其进步。

我认识黎澍时也不到30岁。向他请教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代史，并就十月革命影响、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等问题交换意见，得到他很多帮助。他要我负责编《李大钊选集》、《五四运动文选》，既有原则要求，又对编选、题解、注释等提出具体意见。如文选的题解在介绍蔡元培时，原谓民主主义教育家等。他同我谈，蔡任北大校长，主张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且在实践中坚持施行，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教授，开我国大学之新风，影响深远，宜改为自由主义教育家。这对我很有启发。

政研室历史组也多是青年，有几位我也较熟。听他们谈起黎澍关心青年成长的事，特别是他为别人仗义执言的事，令人感动。如反右派时，大家去北大看大字报，徐宗勉看后有些想法，在党支部谈心会上说了出来，结果说徐站在右派立场上为右派辩护，也是右派。黎澍不同意这样处理。他公开提出：“徐宗勉是在党的谈

心会上讲的,即使有不妥也只能是批评帮助,不应定为右派,如果这样,谁还敢讲真话!”

黎澍学识丰富,马列著作熟悉,勇于和善于思考问题,并且愿意把自己考虑的问题和研究心得告诉别人,特别是青年人,让他们写文章。如请蔡美彪写评述农民战争的文章,请王忠写《历史与现实》等,常常提出具体意见,有时把马恩语录卡片都给青年人提供。又如从翰香在《历史研究》发的《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一文,也是黎澍要她写的。其中有关买办是民族资本的来源之一,就是黎澍的意见。原来人们都认为民族资本的来源是地主、官僚、富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黎澍根据他看到的史料分析,认为买办也是个重要来源,对此作了补充。

沈元原是北大学生,因曾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到农村改造三年,摘帽子后在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1962 年初,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把他推荐给黎澍,说这个人不错,有点才华,并拿来他写的《“急就篇”研究》。黎澍珍惜人才,便同刘大年商量后,把沈元调来近代史所。沈元以后这几年除帮助《历史研究》做些校对等事情外,主要是从事研究工作或写东西。《历史研究》连续发表了他几篇有影响的文章。

正是沈元的几篇文章造成很大风波。1962 年发表他的《“急就篇”研究》后,就有人写信反对,说不该发“右派”文章。1963 年发表他的长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人民日报》压缩成《论洪秀全》整版发表,引起更大责难,说吹捧“右派”。不久他看到刘节《怎样研究才能为政治服务》一文后,又写了《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对这样一篇以正面论述为主、思路清楚、评论适当的文章,反复讨论多次,拖了半年多,才确定用“张玉楼”这一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反映相当好。然而,某些人很快知道张玉楼即沈元,便这里反映那里告状,中宣部派人来调查,田家英也给黎澍来电话,说有人联名告到毛主席那里。一时沸沸扬扬,沈元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黎澍受到很大的压力。1964 年初,中宣部发出有关通知,沈元有关历史主义的文章就再未能发表。

后来,黎澍多次与我谈起沈元问题的教训。他说,我们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决不能埋没人才。但有些人不看文章本身,算作者的历史帐,在“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上费心思,做文章,这样的逻辑与心态,真是可怕可悲可叹!

黎澍写《让青春放出光辉》,酝酿较久。听他说,主要是看到我们国家经济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又少,我们不是在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上下功夫,而是在政治斗争、群众运动上作文章。对知识分子总是不信任。好像有知识的人天生是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只能对其改造,再改造。知识者下农村,也不是传播新知识,而是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培养新生力量,这是社会发展进步所要求的。他考虑这些问题,但又无法直写。便决定该文主要是作正面论述,告诉人们中外历史上的许多科学发明、艺术创作和社会变革等,都是年轻的人们奋发努力放出的火花,做出的成绩,对历史进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他列举一系列著名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在青年时代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所作的贡献,指出青年是一切时代最生动的力量。我们时代的成年人特别有责任保护这个力量的生动性,要允许并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和讨论。青年不应该等待,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意气风发,努力向上,让青春放出光辉。这是黎澍对我国青年的满怀热情的期盼。

黎澍这篇文章在 1964 年 3 月 12 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得到相当广泛的好评。但在那“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年月,总有那么些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尽管文中明确提出重要的问题在于有远大志向和正确世界观,却硬说它宣扬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反对政治挂帅等。后又联系到所谓沈元问题,学部和中宣部批评了黎澍,给他很大精神折磨。《让青春放出光辉》作为“毒草”被批判,黎澍这一片对青年充满热情、鼓励和希望的赤诚之心,被诬蔑,被践踏,被摧残。

“文革”在劫难逃，“紧跟”得咎“真包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说他提出历史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历史研究为革命服务，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尹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研究》和黎澍。戚本禹曾将此文校样送黎澍一份，还说有意见可告诉他，态度傲慢。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一般工作人员，我们都不认识。1963年元旦前后，他给《历史研究》寄来《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提出“自述”是李的变节投降书的观点，与罗尔纲等商榷。我看后认为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展开讨论。黎澍同意并要求打印几份送罗尔纲及有关人，也送田家英征求意见。后我曾电话问田家英，他说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开展讨论总是有益的。但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文章压一段时间再发。故拖到第4期。文章发后反映不一，有所争论。但是，戚本禹却由于发表这篇文章而走了红运，被陈伯达看中调到《红旗》。

黎澍看了这篇《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心情激愤、沉重，打电话要我去谈一谈。我看后说这完全是针对《历史研究》和你的，评述农民战争史研究是错误的，讲历史主义是错误的，反对放空炮更是错误的，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大批判，不让讨论了。黎澍说，连续发这几篇文章，看来在酝酿一场大斗争。《武训传》引起大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大批判，这次《海瑞罢官》可能要搞一场大斗争，很难说要出什么事。戚本禹的文章，既无学术性，更无理论可言，只是戴帽子，打棍子，蛮不讲理。他拿来好象是征求意见，实际是警告人。这个人确实不是好东西，他们搞在一起了，我不能理他。

1966年春节及3、5月间，我看过黎澍几次。他心情沉重，思虑颇多。他已看出来头不对，料定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戚本禹这样的人爬上去的很快，摔下来自然也快，凡颠倒黑白、拨弄是非、兴风作浪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也只能是这样。

然而面对汹涌的浪潮，他既不能公开抵制而使《历史研究》夭折，更不愿趋炎附势，深深陷于难解的矛盾之中。在一次长谈中，他既有激愤，又有叹息。他说，社会冲突是人们的各种意向和各种事物相互交错碰撞的结果，这样的冲突还可以分析，如果是人为发动制造的冲突，那就很难预料了。过去还有子陵滩让人们躲避，现在没有任何避风港了。怎么办？不跟不行，跟也难行，为了保存刊物，只有跟着看吧，这也是现实使之然。

黎澍尽管对形势不理解，有看法，有怀疑，但他还是要编辑部组织批判吴晗的稿件，他自己也邀请人写文章，记得有署名伍任年的文章，发在1966年二期。

近代史所图书馆存有一批胡适、吴晗通信，黎澍得知，便从所里找几个人写评注，在《历史研究》发表。本来以为找了颗炮弹，得以表示一下旗帜鲜明，谁知后来却落了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成为黎澍的一大罪案。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3日配合社论《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发表，在二版刊载批判胡、吴通信评注的“假批判，真包庇”长文，标题下加按语说：《历史研究》从1961年来了个新主编，发表一系列大毒草，把这个刊物变成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云云。这是指黎澍无疑。在社论中指责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等等，那也是指黎澍、刘大年。原来那篇文章的炮制者曾派人到近代史所借阅胡适、吴晗通信资料，图书馆人员说按规定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借走。此事刘、黎根本不知道，却被戴上了“霸”与“奸”的罪名。

本来6月3日上午《历史研究》邀些人谈组稿问题，可是清晨听了《人民日报》社论的广播，到的只有几个人，谁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黎澍还呆在那里不动，我说我们也走吧，他不吱声，我又坐下来。他说他实在不应该当这个主编。《历史研究》创刊后发了些好文章，讨论些问题，这是好的。但大批判多，也影响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搞“史学革命”，使刊物很难办下去。主编尹达、副主编刘大年向中宣部推荐他任主编，周扬同他谈，征求意见，他认为办刊物无非是选些好文章，就答应了。哪里想到事情这样复杂，有的人根本不讲道理，霸道得很。今天的社论和那篇批判文章，有什么道理？看来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我说可能这次运动有更大的斗争，我们发的那几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什么“二月提纲”、“阎王殿”，都比我们严重得多。希望他一定要冷静，就是批斗时也要咬着牙听，少说话，更不要发火。他说，他就是爱辩驳，现在当然不行，只有冷静忍耐。他情绪略为平静后，我送他到门口，又说了几句一定要注意身体，吃好睡好的话。我骑自行车回家，心情很沉重。

从6月5日开始即不断批斗黎澍，对那几年的《历史研究》进行彻底清算，实际上谁也没有仔细看，不过是跟着当时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和社论的调子批斗而已。我因是《历史研究》的“总管”，自然要陪斗，也曾戴高帽子、挂黑帮牌子跟在刘、黎后面示众。

深沉思考，
尖锐提出反封建主义问题

大概是1973年，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一种学术刊物，这不好，应该恢复几种。时任国务院科教组长的迟群，不知在哪位“高明”的提示下，捷足先登从高校调来一些历史系教师，于1974年恢复《历史研究》。但为表示与过去划清界限，另请人题写了刊名。1975年恢复教育部，周荣鑫任部长，他知此事后，又将《历史研究》转归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黎澍仍为主编，他又把我要去。

《历史研究》复刊时，还在“文革”之中，刊物实在难办。谈不上学术，也难说是研究。什么批儒评法、反孔斗争、法家路线，什么评《水浒》反对投降派、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什么“继续革命”、“全面专政”、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五花八门。《历史研究》也转载或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黎澍本来讨厌这些东西，但他也没有办法，只有跟着“两报一刊”的指挥棒转。

打倒“四人帮”后，《历史研究》在黎澍领导下，率先在学术界拨乱反正，清算“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罪行和谬论，批判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及梁效、罗思鼎等对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歪曲，呼吁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吴晗、翦伯赞、邓拓等平反，为历史研究的开拓前进而努力。记得在发表一篇要求为吴晗平反的文章时，黎澍曾与我谈起，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听到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像海瑞那样敢言的人而写的。像他这样算是“紧跟”的人，也没能被容忍，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剧。接着，黎澍发表《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深入揭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等诬陷吴晗的卑鄙伎俩，尖锐地指出“四人帮”企图建立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而用尽了各种最恶毒的诡计，迫使所有被认为不听驱使的知识分子落入他们布下的网罗，制造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字狱。吴晗的悲剧就是许多冤狱的序幕。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破坏，是我党历史上的耻辱。

1977年底，我因老伴去世要求回近代史所，黎澍同意。当时我们住的很近，我仍然常去看他。他总是那么忙，既要办好刊物，又要写文章，还要参加一些会议。

黎澍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学者，肯于独立思考。他多次谈过，十年灾难使我们真像是从一场非常难熬的恶梦中醒来，不能不考虑些问题。他写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等文，就是他深入思考的重要认识。记得他当时谈过，中国封建社会很长，小生产基础牢固，那一套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

思想道德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虽然也引入制械练兵之术、民主自由思想，进行过变法、革命，但封建专制思想很少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进行冲击，有力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追求真知，但因当时局势，很快转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曾热情赞扬这个运动，同时指出，那时还只是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统治，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黎澍认为，这个“大工程”可以说一直没有完成。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反封建斗争，而在思想上却未能进行有力的清算或清理。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自主、自由平等思想本来很少，而我们却也来个“兴无灭资”，实则保留了封建的东西。我说是否可以说是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他说是这样，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思想在新形式下的发展。“四人帮”搞的更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中国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黎澍率先提出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并作了充分的论证，曾发生了广泛影响。

虽“离职”心不歇，在多种领域探索不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思想解放，精神焕发，批判“两个凡是”，清算极左思潮，从多方面探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道路。学术界也相当活跃，对许多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和探讨。黎澍当时精神很好，事情很多，还经常考虑和研究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时受到非议，但他并不为其所动。

1979 年大概是黎澍最忙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他就参加理论务虚会议，参加史学规划会议，又与社科院科研局长温济泽一起筹备五四运动 60 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他自己写文章，还帮助周扬组织撰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要我写《陈独秀和〈新青年〉》，着重讲讲民主和科学精神，还要我参加部分审稿工作，会后选编讨论会文集。可能也在这时，院部决定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由黎澍负责，这是令人高兴的。

也是在这时，近代史所决定创办《近代史研究》，由我和钱宏任主编。我曾专门找黎澍讲我们的一些设想，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要办好刊物就需要学术水平高，又要关心现实。一定要坚持“双百”方针，提倡深入研究问题，自由讨论问题，选文章要注意确有研究心得、有新意，不要只是炒冷饭。近代史问题很多，有些问题需要重新探讨，过去只是讲反帝反封建，对现代化问题注意不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我还谈到当时写的《实事求是和历史科学》，批判“四人帮”的歪曲。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具有更广的意义，应该从多方面考察。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任何工作都必须实事求是。然而实事求是又确实很难坚持。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有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而坚持科学态度又须有广泛民主和言论自由，否则只能照章办事。

当年是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院部委托温济泽和黎澍组织一个学术讨论会。黎澍经过仔细考虑，写成《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主题报告。他首先回顾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科学的空前发展和重大成就，同时也指出教条主义、个人迷信，尤其是“四人帮”造成的大破坏，着重总结了这个大破坏的教训。

记得他在写作时曾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可是我们在不少方面恰恰是违反其基本原理的。如哲学只能讲矛盾斗争，不能讲矛盾的统一；只能讲一分为二，不能讲合二为一；只能强调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不能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为“斗争哲学”，把主观能动性发展成唯意志论。政治经济学只能讲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不能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能讲缩小和消灭差别，不能讲承认差别的存在；只能讲政治挂帅，不能讲经济规律，甚至要取消经济规律。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

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统治阶级的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甚至认为只有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文艺批评只能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只能讲典型的阶级性，不能讲典型的个性；只能强调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不能讲作家创作方法的重要意义；只许写理性，不许写真实。他说，所有这类公式，不但否定了对立阶级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否定了历史的基本联系，否定了经济规律、艺术规律和一切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形而上学的公式，显然只能歪曲而决不能反映客观世界的真面目，只能取消科学研究。所以，要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摆脱一切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彻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黎澍还谈到“双百”方针问题。他指出，这个方针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事实上很难说曾被正确贯彻执行过。提出不久就被当作“钓鱼”政策；“四人帮”横行时则干脆被“全面专政”来代替。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因为没有分清或者故意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不同性质。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事实证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文革”中的所谓“全面专政”把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全部剥夺干净，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所以，我们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进行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力和言论自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对科学和文化同对整个国家的进步一样，是十分重要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大家都赞同黎澍的意见，认为他总结的三个教训很好，并希望进一步研究讨论，以推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可是就是这样一篇受到学术界艺术界普遍重视的论文，却引起某些权威人物的反感，说是缺乏学术性。这倒从另一方面说明黎澍是位关怀现实的有思想性和战斗精神的学者。

黎澍还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他不赞成过高评价农民战争，不同意把农民造反笼统称为革命。他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认为对这种萌芽不能估计过高，实际上中国近代工商业很少是由资本主义萌芽转化来的。他经常谈到，应该承认 16—17 世纪以来中国是落后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都落后了，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无论是学船炮工商、制械练兵，或变法维新民主共和，还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进化论、唯物论等等，这些学习和引进都是进步的，有益于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相反，以老大自居，拒绝向外国学习，那是愚蠢的，只能使自己落后。

那几年，黎澍确实在研究一些历史和理论问题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他不盲从权威的独立思考精神，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好评，即使受到某些人的批评和指责，他都不以为然。当然在闲谈中他也曾几次流露一些不快或烦恼。在那几年，我曾几次向他建议，不再当什么总编辑，在有生之年专门搞些研究。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还未等他提出，1982 年就一纸通知让他离职了。他究意是怎样离职的我不清楚，也可能是他年龄已到，但我知道有些比他年龄还大的仍然在职。联系他几次同我谈话时用了“勒令离职”的词，使我想到他一定有什么不快。然而他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离休之后，他仍然在勤奋的思考问题，在科学研究中探索真理。

探求真理，
不跟风、不怕压、不惧权威

1983 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行纪念报告会。黎澍和我都写了文章，参加会议。3 月 7 日上午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周扬作《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因他身体不好，只作了个开场白便由广播员代念讲稿。广播员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会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长时间掌声，周扬站起致谢。下午分组讨论，大

家都说周扬讲得很好，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很重要，也很有启发。但风云突变，大会宣布延长两天，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我虽参加了会议，但对这个变化的情况并不清楚，曾同黎澍谈过。他不无愤慨地说，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实在没有道理。我们违反人道主义的事太多了。如反右派反右倾运动，许多人只是因为讲了些真话，提了些意见，就遭到那样的打击和摧残，算什么？“大跃进”中死了多少人？特别是“文革”中随便打人抄家，侮辱人打死人，或逼人自杀等等。“文革”后出现一个人道主义思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至于异化问题，那也是清楚的。如我们是人民共和国，却不是强调人民的民主，而是强调专政，乃至“全面专政”，是否异化？“文化大革命”是否异化？还有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家长制、贪污腐败等，实际上也是异化。他还谈到，周扬在“文革”前也比较“左”，整过许多人，但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确实在悔悟。他经过深刻的反思或思考，要从理论上讲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与改革联系起来探讨，是很有意义的。紧接着批判人道主义，在理论界、学术界和艺术界来了个所谓“清污”即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参加中宣部召开的一个会议后，曾将一些情况同黎澍谈过，他说，何谓“精神污染”，如何界定，谁能说得清楚？用形象语言来判定政治问题，是否妥当？

黎澍仍未能躲过这一难。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他精神不好。面容憔悴。他说，前些天组织上要他出席座谈和讨论“清污”问题，谈着谈着冲他来了，他就狠狠地回击了他们一通。我问都是什么人，说什么问题？他愤愤地说，有疯子，有瞎子，有秃子，说他批封建主义、教条主义，主张独立思考、自由讨论问题等都不对，是“自由化”，是“精神污染”，还要他正确认识和对待等，谈过两次。他问那些人，批封建主义、反教条主义错在哪里，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讲到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说？自由讨论是“双百”方针规定的，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与人民的权利，谈这些有何错误，犯了何罪？我劝他冷静些，保重身体最要紧。但是说归说，过了些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已经住院了。

大概也是1983年，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1978—1982年）》时，曾同黎澍谈起学习中的一些心得和问题。记得有次谈到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即“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怎样理解？他问我怎么看，我说大概这些国家的制度能互相监督制约，特别是有对政府和领导人的监督制，民主法制比较健全，任何人都不能超于法律之上等。他说，我们过去都把这些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予以排斥，实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要治理国家，就必须建立明确和严格的民主法治，人民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并有法律保障，任何领导都必须受人民的监督和法律制约。

他拿出《邓选》指着其中所说的“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他认为这话讲得很好，对我们的事业关系很大，希望能够认真切实地贯彻施行。

80年代以来，研究文化问题者日渐增多，乃至形成“文化热”，自然也有不同意见。我曾同黎澍谈过两个问题：一是有人认为“左”的思想是从五四时开始的，“文革”中的批孔与五四时“打倒孔家店”一脉相承。黎澍认为这是误解，是形式主义看问题。五四时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促进人们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没有民主科学就不能进步，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左”的教条主义正是背离民主科学的结果，“文革”从头到尾，都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二是关于儒学“现代化”与儒学“化现代”的争论。黎澍认为，儒学当然有优秀的东西，但其核心是尊卑贵贱、三纲伦理，这只能分析批判，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是不能也无法使其现代化的。所谓儒学现代化，只能是儒学化现代，即增加封建主义的影响，那是危险的。所以他总是认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黎澍晚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是他写的一组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论文。80年代初，他就考虑这个问题。曾听他说过，现在流行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科学。马恩都没有说过，他们只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是人人的历史”等，列宁也是这样说的。在《联共布党史》出版后，苏联出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说，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则是我们的发挥。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82年他写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依据马恩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分析论述。因为问题很敏感，经过慎重考虑和修改，直到1984年11月才发表。结果引起很大争论，几个大报和多种刊物都发表文章讨论，赞成、反对、商榷者皆有，某些权威者尤为不快。他又写多篇文章，作进一步阐发。其基本结论是：一、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实际居于奴隶的地位，不是历史的主人；二、人民群众主要是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不是全部历史的创造者；三、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记得他用形象的比喻说过，物质基础好比戏台，没有戏台唱不了戏，在这戏台上人人都在唱戏。物质基础是劳动者创造的，而在一定物质条件下人们都在创造历史。他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以求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黎澍对此作过解释。他认为当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胜利发展之际，提出这样鼓舞人民反法西斯斗志的口号是很有力量的，并谈到他当时就有这样的感受。但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的创造者”，却要复杂得多。人民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而战场指挥者和国家领导人的筹画决策也有关键性作用，如二战中斯大林、毛泽东、以至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的作用就相当突出或明显。毛泽东很强调农民战争的作用，认为只有这种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他也称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等，尽管他们也各有不足，但都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历史研究就是应该探索这历史的奥秘，以为鉴戒。

黎澍长期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经历了严酷的考验。革命胜利之后，他不改初衷，不考虑自己要在新政权中占一个什么位置，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听他说过，到北京后他到新华社工作，范长江同他谈，请他担任一个部门的主任，或是负责资料室工作。他考虑再三，认为到资料室可以多读些书，多看些报刊资料，多了解国内外情况，增长知识，理解历史发展，于是到了资料室。后调中宣部任新闻出版处处长，那时常到《人民日报》值夜班，与邓拓等审改稿件或写社论。又兼党史资料室工作，负责编《中共党史资料》。1955年调政研室，任历史组长，与几个青年搞研究。1961年到近代史所。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努力钻研，思考问题。他重视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尊严，在一些运动中虽多次受到冲击，但决不随波逐流，更不趋炎附势。他主编《历史研究》，敢于向“左”的思想挑战，发动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特别是“文革”后，他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不畏权势，在学术上开拓前进。作为一个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学者，黎澍用他严谨的治学实践，实现对真理执著追求。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不足。他曾说过，“文革”前他写的论文有些就是宣传性的。因此他将1985年出的文集题名为《再思集》。1988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套著名专家学者的自选集丛书，要我推荐作者，我当即提到黎澍。但黎澍编自己的选集时“文革”前的文章仅只收了《让青春放出光辉》一篇。他的严肃的治学态度，敏锐的思考力，言之有物又朴实晓畅的文风，确实文如其人，使读者感到作者亲切和真诚。

（原文较长，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洛　松）

新中国外交是这样开创的

——重读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五封信

● 高　梁

1988 年春，王炳南同志重病，我到医院看望。他拿出周恩来同志生前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交给我看，并向我讲了每封信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背景。他把这些信的影印件交给我，希望我加以整理和注释，有机会时在报刊上发表。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委托你了。"

自 1936 年"西安事变"起，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四十多年间，王炳南同志一直追随周恩来同志，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第一线。周恩来写给他的这几封信，内容涉及到延安时期外交工作的起步，涉及到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建立、外交队伍的成长和新型外交作风的培养。

今年是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又是王炳南同志逝世十周年。我也年逾古稀，特别感到故人嘱托的沉重。按照王炳南同志生前的愿望，根据他介绍的情况，并参照当年有关老同志的回忆，我重读了这几封信，现就我个人的粗浅认识和体会，对其中的五篇作了以下说明和解释。

延安时期的两封信："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达尼同志[1]：

空中飞来你的书信，高兴得很。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家康回，知道这一年的经过，偏劳了你们。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这次送去很多书报，有空时，也可选择一二，送往美印发表。参座报告英文稿，夏南汉神父带出一份，如要不到，可另译送人。有可能包上校已抄好一份送史迪威总部。

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对史诺、史沫特勒、卡尔逊、范宣德、白尔登诸友，望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白特兰在港集中营有消息传出否？

你们出版的英文小册子，望各捡三份，于下次航机带来。这一年的工作报告，则托林老带来为妥。

华莱士来华，闻送了政府一种特效药，名为 Penicillin，你们有法弄到一些吗？因为王稼祥同志急需此药医治也。

其他各事，已见致龚澎信中，不再及。

祝你及安娜好，黎明好，各同志好！

超附笔。

周恩来

八月六日

达尼同志：

你信及剪报收到，其他各件，包上校尚未交来，收到后当电告。

这次带上大批西红柿及西瓜，大概使你们不致再落空（如果上次送孙夫人的亦为美友告享了，则请在这批内分送一些给她为盼！超托）。

治王稼祥的病，需要 penicillin，据《大美晚报》载，已有九万万粒送至中国，请打听下，可否设法弄到一些？

我们欢迎爱金生来。

送上关于叶的报告译稿，请校正后印发。

中文本上次已带交董老。

英文材料，一因此地只有一份底稿；二因外记未走，我们不便先行发表，故俟下次航机再带来。

战报当设法多多广播，以便你们宣传。

你们送来的材料及 O.W.I. 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

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最好将柳无垢调来，帮助你们一时期，然后偕林老来延。望告安娜，谢谢她的通知，下次当函复她。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

祝你好！ 黎明好！

周恩来

八·十四

读着周恩来同志的 1944 年 8 月的这两封亲笔信，我们仿佛看到他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信的身影。

1943 年 7 月，长期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为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从重庆暂时回到延安，但他每天仍关注着国统区形势的发展和南方局的工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经常托人从重庆带信向他汇报工作，这两封信就是周恩来同志给王炳南的回信。王炳南同志曾向我介绍过当时的情景：

那时，抗日战争打得正苦，日军正在国统区的华中、华南战场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日益壮大，抗战实力不断增强。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和欺骗宣传，这一切很难为国内外的人们所知。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英政府，这时已将注意力逐步从欧洲战场转向太平洋战场，他们急需了解和利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军民的实力，很想同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样，我方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争取国际上的广泛了解和支持。

在重庆工作期间，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扩大影响，周恩来同志曾冲破重重障碍，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他把外交、宣传、交友三者结合起来，结交了大批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和军人，或同他们亲切交谈，或介绍他们到延安参观访问，争取到他们的了解和同情。例如：在皖南事变之前，周恩来就向美国进步女记者斯特朗预言这一类悲剧将要发生。他向斯特朗介绍了许多背景情况和国民党的反共部署。他相信斯特朗不久就会用到这些情况。果然，斯特朗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竭力封锁消息，掩盖真相。这时，周恩来让外事组的同志打电报通知斯特朗，告诉她过去所谈的情况已经可以公布。于是，皖南事变在国际上真相大白，国民党受到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英国驻重庆大使克勒克·卡尔听了周恩来介绍的情况，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愿看到中国打内仗；他还为此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后来在他调任回国时，甚至拒绝出席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的告别会，而宁愿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告别。

由于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们在新闻、外交两个方面进行的大量工作，国民党一手遮天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44 年 3 月，先有三名驻重庆的美国记者提出到延安采访的要求，接着又有许多中外记者响应。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一一失败，当年 6 月，一个由 21 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到达了延安。

就在记者团在延安访问的前后，美国政府要求派军事观察组去延安。国民党政府竭力阻挠和拖延。但在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努力下，先由华莱士副总统提出，后经罗斯福总统敦促，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一个由 18 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于 1944 年 8 月 7 日，即周恩来同志写第一封信的次日，到达了延安。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信中所说的“这一关打通了……前途将无限量发展”的含义。在周恩来同志的心目中，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胜利。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解放日报》8 月 15 日发表了社论，指出：由于记者团和观察组的到来，国民党当局再想一手遮天欺骗国内外舆论已经困难了。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 8 月 18 日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更强调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他还在指示中进一步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的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2]

对外局面已经打开，接着就应该把中国共

产党的主张、政策以及敌后根据地的实况更多、更准确、更具体地向全国和世界人民如实介绍。这就需要一批从事对外交往、对外宣传的干部，其中首先需要的是翻译人才。周恩来同志在两封信中都谈到了向南方局送去的各种资料，希望能把它们译出后对外散发；谈到了人手不够，谈到了注意储备人才。这些都表现出周恩来同志的预见性，表现出他推进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深思熟虑。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特别讲究以诚待人，广交朋友，这是他的鲜明风格。在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一问起他在武汉、重庆结交的外国记者、作家和友人，表示对他们的想念和关怀。他叮嘱外事组定要代他回答他们的来信，并且“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他提到的朋友中有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卡尔逊、范宣德等人。这些外国友人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写了许多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和书籍。

早在1936年，当斯诺作为第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根据地时，周恩来同志就结识了他，并为他的采访作了周密的安排。抗战初期，他在武汉又多次同斯诺交往，成为知心朋友。斯诺不仅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业绩，还亲自向罗斯福总统介绍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4年6月，他写了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一文，向美国和世界指出，中国的游击队在反攻日本的战略中具有巨大的潜在重要性，不应被忽略。

卡尔逊是周恩来在武汉结识的一位美国军官。1938年，周恩来介绍他到延安，后来他还去华北敌后根据地参观。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略和战术非常敬佩，从此便热情宣扬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战的力量。为了把他的见闻介绍出去，他宁愿辞去海军军官的职务，写出了两本歌颂敌后游击战争的书。后来，日、美宣战，罗斯福总统借重他研究游击战的专长，召他回到军队并予以重用。在太平洋战争中，卡尔逊使用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与日军作战，解放了许多日军侵占的岛屿。

至于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她不仅写了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日的大量优秀著作，还为抗日军民募集了大批医药物资，介绍了许多外国医生到根据地工作。

信中提到的范宣德是美国国务院中国司司长，当时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任参赞。他为推动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同志还在信中关切地问到一位记者白特兰，即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人。抗战开始时，他发表了对毛主席的重要采访记，写了《华北前线》等名著。后来他去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才被释放。

贝尔登是周恩来在武汉结识的美国进步记者，他写了许多关于抗战的真实报道。解放战争中，他又写了著名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详尽生动地记叙了作者在解放区的经历，把共产党领导农民闹翻身的伟大群众运动描绘得淋漓尽致。

读着这些外国友人的名字，回想着周恩来与他们的友谊，我们仿佛回到了党的外交事业刚刚开始的那些岁月，其中凝聚了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智慧和心血。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由这些具体事件一一积累起来而起步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两封信：培养新型的外交队伍

炳南同志：

你们两次来信及报告，均阅悉。关于外事组的今后工作方针和学习生活的意见，我已大致和尚昆同志谈了，他会告诉你们的。我的主要意见，认为外事组同志应利用目前安静的环境，多做几件对于外事对于自己的基本工作。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二年工夫都要得。对于自己，应准备以半年时间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自己的政治和英文学习。关于国际问题的研讨，你们除一般外，应着重美国及美洲；香港应着重西欧及南洋、印度；哈尔滨应着重东欧及日、韩。为上述基本目的，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

专告，并致

敬礼

周恩来

七·二十九

剑英同志阅转炳南、大年、柏年三同志：

来信及来件都收到。

关于新闻工作，需要变动，已托乔木同志面告参座，待参座来河西时商决。

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爱国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能将解放战争译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好就很好。

研究方面，柏年的两篇提纲，已看过一遍，如能将全文写成更好。付印与否待写好后看，但对于研究问题，无疑是一种好材料。大年关于美国党报告，在思想方法历史看法上尚有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能将报告全文整理一遍再交阅更好。政协及三人会议的谈判材料，由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个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不必再动员大家去研究，徒费时间。如章、陈两同志在整理时有意见提出，作为经验心得，写成笔记或讨论记录，不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专复，即致

敬礼！

子正同志信收到。

周恩来

十一月十日

这是1947年7月和11月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两封信。

在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叶剑英同志领导，杨尚昆同志协助。外事组人员有徐大年、柯柏年、黄华、陈家康、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后来还负责接待美国特使马歇尔、赫尔利等人。工作中“取得了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经验。”[3]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原由重庆迁至南京的南方局外事组的全体人员，包括王炳南、章文晋、吴青、陈浩等同志，一起撤回延安；另外在北平军调执行部的我方外事工作同志，其中有黄华、刘华峰、王朴、王光美等，也撤回延安。以上述三个方面的人员为主，党中央于1947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为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全解放区的外交工作。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党中央已从延安撤出，许多单位渡过黄河转移到山西省。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于战火弥漫中，在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下，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成立的。此外，中央还有一个主要负责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交涉和联络的机构解放区救济总署，主任为董必武，秘书长为伍云甫，它也归中央外事组领导。中央外事组还在香港派有乔冠华、龚澎、张颖等人，在哈尔滨也设有外事机构。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周恩来同志于1947年7月、11月给外事组写这两封信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他正在随同毛主席一起，同进攻的敌人在陕北辗转迂回，指挥着全解放区的战争。可以想象，在这样紧张繁重、戎马倥偬的生活中，周恩来同志还一直关怀着外交事业。他高瞻远瞩，在紧张的形势下仍在筹划新中国外交的未来蓝图。他已经预见到新中国的外交需要一批新型的外交干部，他要求外事组的领导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加强调研工作，加强政治和外文的学习。为了在战争环境中储备和培养这批干部，周恩来同志向外事组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法：

一、三分之一的人员从事日常工作；

二、三分之一的人员参加土改；

三、三分之一的人员从事编译调研工作。

周恩来要求外事干部参加土改，一方面是使干部锻炼自己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是让外事干部熟悉国情，因为不了解国情就根本无法向别人介绍自己，也无法执行政策；同时，外事干部又必须了解和研究自己的工作对象。他要求外事组尽量收集和整理出一些调研材料，他亲自出了些题目，要求外事组、香港、哈尔滨分别承担一些调研任务，指示外事组应着重研究当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美国。他鼓励同志们在调研方面的每个成果。他要求外事组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毛主席、刘少奇以及有关解放战争和解放区政策的著作，向外宣传。

按照周恩来同志信中的指示，外事组立即派出一批同志，由薛子正、王炳南、黄华带队，赴晋绥边区参加了土改。留下的同志努力编译和调研，出了许多成品。据当时任美国科科长的凌青同志回忆，他们已编写了一本《美国手册》，翻译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等。

此外，周恩来同志特别关心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早在延安时，已经选派了一批学员，成立了外国语学校。1946年初，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特别指示南方局通过地下党从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等地选派了八十多个思想进步、掌握外文的大学生，由浦化人、罗清同志带队，送到华北已解放的张家口，先在外语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来参加土改运动。我当时就是其中

的一个学员。我记得，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周恩来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艰苦的斗争，他还特地让王炳南写信给浦化人，强调这批干部不要分散，要把这批干部储备培养起来。在这批干部的基础上，后来又吸收了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由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这批学员多数人在建国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了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首批年轻的基层干部。

为了迎接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建国前后又从全国各地调来一批长期从事外事和统战工作的同志，调入外交部工作。这样，一支包括五湖四海、经过战争锻炼、具有坚定立场和政策水平、年纪和专长层次不同的首批新中国外交队伍，就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

建国初期的一封信：建立新型的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和外交作风

炳南：

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现特函告：今早(上午)六时零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接到后，望即约他们到今晚宴会。罗申、齐赫文已离京，今晚去掉他的座位。

专告。

周恩来

十二月六日四时

这是周恩来1949年底致王炳南的一封信。

新中国的首批外交队伍建立后，周恩来同志首先要求他们必须树立起新型外交政策思想和外交作风。

早在1947年11月，他曾在中央外事组的一个学习计划草案上这样批示："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在学习上，必须从思想整风中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4]

在平、津解放前夕，他在西柏坡同外事组的同志们开了会，并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他部署了进入城市后，我们的外交队伍应以新的政策思想和新的纪律和作风来开辟新的工作。[5]接着，天津解放刚刚几天，周恩来同志又于1949年1月19日为党中央草拟了经毛主席审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新中国的外交"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不承认任何与我无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他在《指示》中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撤销，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在外交工作中，"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指示》还对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在华办的报刊等项，都规定了暂行政策。[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向全体干部作了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评论了国内外的外交传统，提出了把外交学中国化。他说，苏联的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参考。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从西太后到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他强调说："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要有独立的精神。"他还指出，在外交工作中，"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情绪。"外交工作中"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他强调指出：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他说，"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每个外事干部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7]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经常同外交部干部一起研究情况，指导工作，以身作则作出示范。据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老同志回忆，那时，每周他经常用一个或两个半天，至少一个晚上，到外交部来办公，与各司处以上的干部开会，有时还请有关的一般干部参加。他同大家分析形势，研讨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有时他晚上到外交部，一直谈到夜晚两、三点钟，甚至天亮。在驻外使节出国前和回

国述职时，周总理都要接见。他勉励国外工作的同志说，入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他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8]

周恩来同志一向要求干部严谨细致。他曾说，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全局，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国内工作中犯错误，还可以弥补，外交上犯错误，则难以弥补。他对干部极为关心和尊重，但对干部在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负责任则很痛心，总是直率地提出批评，有时还很尖锐。王炳南同志回忆，使他印象最深的，当数在这里发表的周总理给他的这封信。信中谈的虽然只涉及一件迎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的事情，但工作做不好，就会引起无法弥补的误会。于是，周总理在当天黎明四时写此急件通知他。王炳南每当想起周总理对他的言传身教，总是极为感动。

如今重读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五封信，人们仍会受到深深的教益。

注释：

〔1〕达尼是王炳南同志的别名。

〔2〕引语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0、581页和《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一书的第192页。

〔3〕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第80页。

〔4〕引语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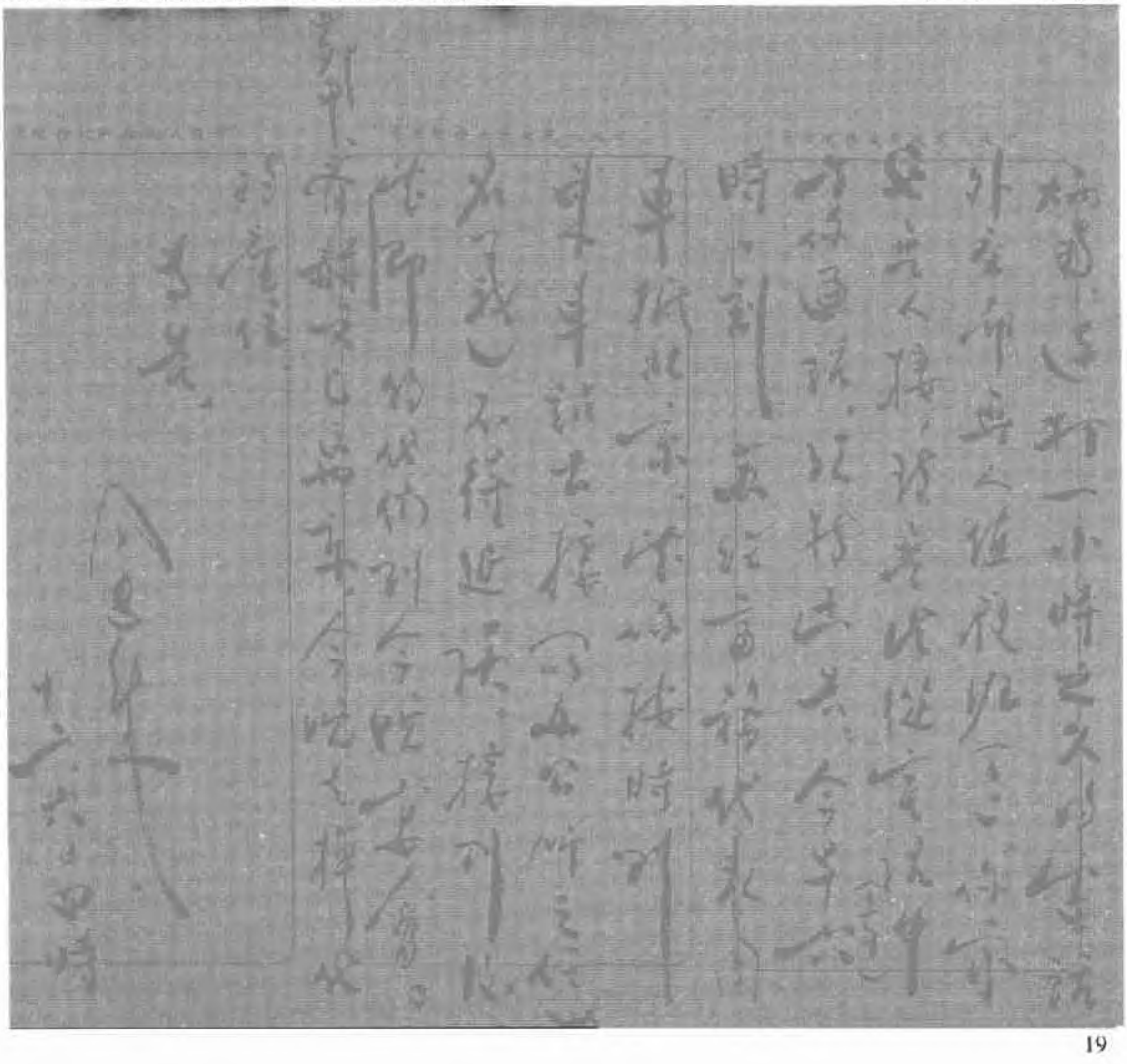
〔5〕据当时听了此讲话的凌青同志回忆。

〔6〕引语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09页。

〔7〕讲话全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页。

〔8〕引自陈浩同志文章《一片公心永鉴青史》，载于《我们的周总理》一书第530—544页。

（责任编辑　吴　思）



蔡元培与群星灿烂的北大教授

● 姚同发

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蔡元培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广纳奇才，开创了北大百年校史中群星灿烂、相得益彰的光彩一页

“五四”前后，北京沙滩红楼荟萃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其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即有二三百之众。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礼贤名士，广纳奇才，为众多著名教授所敬仰、所尊崇。蔡元培与北大教授们，犹如灿烂群星，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成为北大百年校史中光彩的一页，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耐人咀嚼的一段佳话。

要解读北大教授“群星灿烂”的现象，还得从蔡元培改革北大说起。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然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上课铃响时，当差便来“请老爷上课”。一些有钱的学生，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一心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读书毫无兴趣。即使有个别肯读书的，也不过抱着科举时代的观念，把读书当作求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学术研究概不与闻。至于那些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学监及教员，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者，混饭度日者，比比皆是。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犹如一座衙门。这便是1916年以前北大腐败校风之一瞥。

面对着这样的北大，许多友人劝蔡元培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怕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人劝进，认为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极力主张他去，认为这正好在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而他自己也觉得当大学校长不是做官，因此愿意去作一尝试。

蔡元培是1917年1月4日到校任职的。到校第五天，蔡元培即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北大的举措很多，诸如，整顿教师队伍，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实行教授治校与民主管理。他还发起组织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做官等），推动学生设立体育会、技击会、音乐会等团体，以及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化学研究会等会社，推动学生组织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以及创办《新潮》、《国民》杂志等等。然而，最要紧的一条当是蔡元培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

采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略。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略，尤使北大的教师队伍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变化。

其一，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原有中、外教员一律解聘。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向法庭控告，但蔡有合同为凭，法国教员的无理要求遭驳斥。英国教员克德莱（Cartwright）等被解聘后，鼓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亲自到北大谈判，要求续聘，遭蔡拒绝。朱尔典出校后，愤而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闻听，一笑置之，表现了一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大无畏精神。

其二，聘请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任专任教授与兼任讲师。不仅文科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是一流教授，理科学长夏元瑮，数学门主任秦汾，物理学门主任何育杰，化学门主任俞同奎等，也是全国一流人才；还有法科的黄右昌教授，商科的马寅初教授……均为饱学之士，一时之选。在这些教授当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本用新的科学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中国第一本《新闻学》等。不仅专任教授为国内首屈一指，兼任讲师如鲁迅、王宠惠、罗文干、何炳松、王国维、罗振玉等七十余人，也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

其三，教授的年轻化。北大教授，绝大多数都在三十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杨丙辰年仅 27 岁，宋春舫年仅 26 岁，朱家骅年仅 25 岁，最小的是年仅 24 岁的徐宝璜，他既是经济学及新闻学的教授，又是校长室的秘书。蔡先生正是以这批学贯中西、品德高洁、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

其四，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蔡元培聘请教员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只问真才实学，不拘年龄、资望。他既聘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请筹安会的刘师培，复辟派的辜鸿铭；既聘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请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既聘“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也请坚持尊孔复古的陈汉章。正如一位蔡元培研究专家所说，在旧思想旧文化大行其道之时，蔡元培力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争得了一席之地，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新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卫兵和褓姆”。

北大教授一流，北大教授年轻，北大教授得享“百家争鸣”之自由，其源盖出自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鼎力改革的高超方略和敢于冲破世俗不拘一格延聘人才。因此，北大教授们也很仰慕蔡先生。从下面介绍的一些片断，人们亦可体验到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的那种高尚无私、亲密纯洁、没齿难忘的情谊。

陈独秀为上海亚东图书馆筹资，蔡先生差不多天天去前门外旅馆看他，有时去得很早，就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候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向他举荐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对于陈独秀，蔡元培本已有深刻印象，听了汤的举荐，又翻阅了《新青年》，便作出了聘用的决定。当时，陈独秀正为亚东图书馆筹集资金，住在前门外的中西旅馆，他白天四出接洽，晚上看戏，睡得晚起得也晚。蔡先生为聘陈独秀，差不多天天去看他，有时去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拿个凳子来坐在房门口等候便是。陈独秀最初不想受聘，表示仍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先生便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感于蔡先生的诚意，陈独秀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后，改由陈和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等轮流主编，陶孟和、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经常撰稿。蔡先生的演说词及论文也常刊载于该杂志。这时的《新青年》，事实上已成为北大新派教授的同人刊物，成为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阵地。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反封建的闯将，尽人皆知；在处事上，陈为人圭角毕露，言论锋芒逼人，恰好与蔡先生的为人态度相反。但蔡先生并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取人的标准，这不仅从聘用陈为文科学长可以看出，又从其后全力支持陈氏之工作，可以证明。当时

社会上固然视陈独秀为洪水猛兽，北大校内亦有不少人对他有反感，因为他说话往往得罪人，例如在会议上当面给理科学长夏元瑮以难堪，等等。加上他细行不检，更予人以口实。倘若不是蔡先生亲自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一切，陈独秀要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闯将和先锋的作用，必将受到各种掣肘。

据傅斯年回忆：北洋政府曾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主要也是缘于陈独秀。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到环境的黑暗，另外一个谋客也在场，当时蔡先生有这两个谋客，是专门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那个老“谋客”劝蔡先生解除陈独秀先生之职，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才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的一切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陈胡等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余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身为北大一校之长，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的大无畏。

有人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曾产生疑问，以为只是调和折中的办法。其实是不对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陈独秀这些新派教授的思想是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的，本无立锥之地，而“兼容并包”正是使这些新派教授的新思想得以“容”下来，“包”下来。对此陈独秀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非常感慨地说：“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这也是对蔡先生的历史功绩作出的肯定。

胡适说，他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之生涯中度过

约胡适到北大任教，是蔡元培通过陈独秀致函胡适的。陈独秀在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胡适接信后于 1917 年 6 月离开纽约，7 月到上海，9 月抵京就任北大教授。两天后，蔡元培在六味斋为他设宴接风。

胡适进北大时年仅 27 岁，风华正茂，人称“胡博士”，学贯中西，口才又好，在当时文科教授行列里，可谓佼佼者。因此，被蔡引为得力助手。胡适任北大教授时，还被推选为教务长。

当时，胡适所开的课，以讲中国哲学史最为有名。先前讲这门课的教师是人称“两脚书柜”的陈汉章，他讲一年哲学史，只讲了个三皇五帝。改由胡适来教，胡即另起炉灶，先发讲义，按照自己研究的体系，从《诗经》讲起。这样一个变动，引起了北大师生的震惊和议论。当时有的学者说胡适是学术造反，要把他轰走。一位先生则拿着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讥笑地说：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但胡适的另起炉灶，得到了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后来蔡元培在《五十年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做了高度的评价：“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以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辩证法，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前所没有的。”

胡适除讲课外，还忙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进北大第二学年，他又辅导学生创办《新潮》月刊。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汪敬熙、顾颉刚、江绍原、俞平伯、孙伏园等请胡适任该刊顾问，大大增强了该刊的活力。《新潮》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潮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声誉也高，与当时的《新青年》有姊妹刊之称，从而招致北洋政府的反对。那时教育总长傅增湘曾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他设法制止《新潮》的出版。蔡对此置之不理，并回信为《新潮》辩护，使《新潮》继续得以存在。

由于北大新派教授积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引起社会上封建守旧分子极大不满。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往往又首当其冲。

当时反对蔡先生改革北大、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是自称“清室举人”、“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的林琴南，他写信给蔡元培，对北大正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诬称北大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此前，这位举人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过两篇影射小说，对陈、胡等教授极尽笑骂攻击之能事。面对旧势力的挑战，蔡元培不得不站出来，予以迎头痛击。他在看到林琴南此函的当天，立即撰发《致〈公言报〉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对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之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既维护了北大的声誉，又保护了陈、胡等新派教授。

胡适对来自蔡元培的关爱、提携和支持，当然深有体会，他不仅在当时对蔡元培表示了一片敬仰之情，更深深铭记在心。胡适晚年对蔡元培一番评论，读来颇令人感动。他说：“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胡适还言为心声地认为，他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晚年，胡适居住台北，对蔡先生仍十分怀念，每逢“五四”纪念日和蔡先生诞生纪念日，他都要出席，并作讲演。

……辜鸿铭在北大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背后拖着的那根表示效忠清室的长辫子，但他精通英、法、德诸国语文，蔡先生仍请他讲授《英诗》

在北大，作为复辟派代表的辜鸿铭教授，直至民国成立10年后，他背后仍然拖着一根仿佛反抗标志的辫子。

这个与时代进步思潮格格不入的辜鸿铭，辛亥革命发生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宣统皇帝退位后，他慨然脱离公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辜氏公开反对“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宣扬尊孔“大义”。他甚至反对维新派力倡的“不缠足”运动，认定缠足与审美观念、卫生原理相吻合，并且解释说：研究生理学的人，都知道身体上某一部分受到抑制，另一部分必会得到发展；女子应深处闺中，所以脚的发达不发达，是无所谓的。

蔡元培看到的是辜鸿铭之所长，辜鸿铭1857年生于槟榔屿，10岁赴英格兰读书，10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专修英国文学。不久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科文凭，后又在法国巴黎逗留数月。辜在英、德、法十多年，沐浴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打下了深厚扎实的西文功底，他精通英、德、法及希腊文，对英国文学尤有研究。

他曾以极大的热情与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他用英文翻译的《四书》，不受旧传统的注疏家的拘束；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人的牛津运动》，转译成德文后，被哥廷根大学列为哲学系师生的必读之书；他用英文撰写的专论《中国人的精神》，认为中国的文化较西方为高；他在欧战期间把孔子推荐给西方，认为可以把欧洲人从战争的泥潭中拯救出来。

蔡元培请辜鸿铭在北大讲《英诗》，正是展其长才。

幸得蔡元培慧眼识英才，用其所长，使辜鸿铭得以从北大走向世界，才引发后人对这位辫子教授的另眼相看。

刘师培充当清探于先，发起筹安会于后，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蔡先生力排众议，聘其为《中国中古文学史》教授

1917年，蔡元培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刘师培饱读经书，18岁中秀才。次年，又一战而捷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他20岁考进士落榜，在章太炎的影响下，思想顿时大变。1903年夏天，上海发生震动中外的《苏报》案，曾在《苏报》发表文章公开宣布自己决心革命去的刘师培，没有被吓倒，旋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以揭露沙俄侵略中国的形式继续反对媚外卖国的清朝政府。1907年，刚刚24岁的刘师培东渡日本，谒见孙中山，加入同

盟会，并立即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主要作者之一。同年，刘师培成为中国人在海外出版的第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的柱石，频频著文向国人介绍《共产党宣言》、介绍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学说，政治主张之“激进”达于顶峰。

引致蔡元培聘用他为北大教授而需“力排众议”的，是刘师培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后的急剧倒退。众“议”之一：他曾投靠清朝当权大臣端方，成为端方的幕僚，并曾有《上端方书》表明心迹。众“议”之二：江浙革命党人策划起义之时，他向端方告密，充当清探，导致端方通过上海英租界当局破获起义机关。光复会地下领导人王金发盛怒之下，找到刘师培要枪毙他，吓得刘下跪乞命。众“议”之三：投靠袁世凯，先被任命为公府咨议，继又署理参政院参政。在他上任之际，正是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时。在袁世凯的默许下成立的“筹安会”，六名主要发起人中又有刘师培。据说他没有参与实际行动，但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使他又增添了一份耻辱。

众“议”一而再，再而三，当然也让蔡元培左右为难，这才有“力排”之说。细究起来，蔡元培向刘伸出援助之手，已非头一遭。刘师培投入端方幕中时才 26 岁，端方在辛亥革命中被所部官兵杀死，刘师培逃往成都。后来章太炎向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力保他，正是以他年轻误入歧途作为一条理由。章太炎还与蔡元培一同在报上大登广告，“求与刘师培通信”。其实，蔡元培心里也未尝不是“姑念其年轻”，而希望刘能走上正道。但蔡之一片苦心，随即化为泡影。1916 年，袁世凯死后，刘师培再度陷入狼狈境地，被迫遁入天津租界。正当刘师培走投无路之时，蔡元培又伸出援助之手，聘其为北大教授。蔡元培是确确实实深爱其才，刻意要用其国学造诣的。

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由于口吃，又有肺病，课堂讲授效果并不好，但靠编讲义弥补，还是受到学生的欢迎。蔡元培在其为刘师培所撰《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对此亦多所肯定。本来，刘师培对蔡先生的知遇之恩，理应感激不尽，结果却适得其反。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掀起之时，刘师培的所谓“国粹”也受到猛烈冲击，他再次充当反对派的首领，于 1919 年 1 月纠合北大部分师生，创办《国故》月刊，自任总编辑。刘师培的这一举动，受到新派教授的尖锐批评。鲁迅也在致钱玄同函中，称他的刊物为“国粹屁报”。办《国故》是刘师培的最后一搏，最终却敌不过《新潮》，这年 3 月，他致函《公言报》，不得不否认《国故》有意与《新潮》作对。年底，刘师培因肺病去世。

刘师培曾经“激烈”革命过，也曾经“激烈”保皇过，堪称“激烈派第一人”。尤令人注目的是，当他刚刚登上“激烈”的顶峰，却突然转向，其程度之烈、速度之猛，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对于他前后两个时期的完全相反的两种“激烈”，人们至今还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但在他倒霉的时候，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则一直被后人当作是蔡元培实施“兼容并包”方针最果敢、最有魅力、最富激情的大手笔。

梁漱溟说：“我只是在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

曾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1917 年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时，年仅 24 岁。

1916 年冬天，蔡先生从欧洲回国，梁漱溟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正在《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家）。梁漱溟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就读到蔡先生《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蔡先生的大名而没有机会造访。后经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介绍，梁漱溟带着《究元决疑论》去见蔡先生。当他拿出文章时，蔡先生就说他路过上海时已看过了，并表示要请梁到北大教书。不久，蔡先生便约梁去他的校长室，正式提出要梁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年轻的梁漱溟当即说，无论西欧或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而自己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仅仅是对佛学有兴趣而已。教印度哲学，怕不能胜任。蔡先生的回答也很实在：你固然不甚懂印度哲学，是不是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既然谁也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差不多，你就大胆来吧。蔡先生又鼓励说，你不是爱好哲学么，我也爱好哲学，我们还有不少爱

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的朋友，都聚拢在一起，彼此磋商，共同研究，这么好的聚会机会，你怎么可以不来呢？你可以不把自己当做来教人的老师，而当做是来做研究，来学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的心，话说到这份上，他也只有答应下来，才不负蔡先生的一片诚意。

梁漱溟初到北大时，与许多学生的年龄相仿，甚至有的学生还比他大。今天我们知道的著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久、朱谦之等人，当年他们都曾相聚于同一课堂。在北大，梁漱溟先开出印度哲学课，后又开出唯识哲学课，并先后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等书。

从1917年到1924年，梁漱溟在北大前后共七年，中间曾因脑病请辞两次，皆因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任。七年之间，梁漱溟从蔡先生处获益匪浅。论年龄，蔡先生长于梁二十八九岁，梁只算得一个学生。但在书信往来中，蔡先生总称作为"漱溟先生"，梁心中虽不敢承当，但因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亦不敢不自尊。后来一旦离校，梁每次写信，便自称后生晚学了。

蔡先生为什么对一位自学成材的年轻人这么器重，再三挽留呢？倘按学派说来，梁既不属于新派（陈独秀、胡适之等），又不属于旧派（辜鸿铭、刘师培等），那时他也还说不上有多么深厚的学术功底，细究起来，大概还是因为蔡先生具有远见卓识，因而才能不拘一格用人才。一方面，蔡先生认为梁富于研究兴趣，算得一个好学深思的年轻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另一方面，蔡先生对梁所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因此才有一个24岁的年轻人登上北大讲坛，才有蔡先生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

蔡元培对北大的杰出贡献，在于不拘一格地为北大罗致大量有用人才，这已为世所公认。而对蔡元生一直心存感激之情的梁漱溟则说："我只是当时在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培养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际受到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本文承高平叔教授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舒元璋）

蔡元培与北大哲学门师生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蔡元培，第三人为陈独秀，第二人为梁漱溟，第一人为陈汉章，第五人为马叙伦；中排左起第四人为冯友兰

大跃进 广西放了颗大灾星

——一位县委书记的回忆

●王定

公元1985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丰产“大卫星”，说亩产详数是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旧称一斤为十六两），为此，轰动了神州。

1949年末，原思恩县和宜北县合并为环江县。从那时起直到1957年，我在环江任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现在，我应将这幕亲见亲闻的人间闹剧，具书陈述于世，以告慰当年死于这场灾难的亡灵。

环江县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东南部是毛南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居住着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全县95%是山地，田块小，有人说蚂拐（青蛙）一蹦就可以跳过12条田埂，耕牛用不上。农民圈养黄牛、水牛，每年存栏量均在五万头以上，毛南菜牛为广西特产。县内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山区人民敦厚淳朴。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到1954年，全县已发展到572个农业合作社，1956年合并为109个高级社。

山区农户分散，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菜，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县委研究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我是这样发言的：“一个社有的方圆几十里，一个队有十几个弄场，不但管理困难，劳动也不方便。什么都统过来是不恰当的，连地边种点蔬菜、豆角、辣椒都不行，尤其是对家庭副业乱扣‘资本主义’、‘自发户’、‘破坏生产’等帽子。限制的结果怎样呢？生猪比去年同期少了一万多头，养鸭几乎绝种，街上的青菜很少，中药材收购不多，农民连牛藤、犁耙也买不到……”经过大会讨论，县委决定把大社分成小社，由生产队自负盈亏。分散山区可搞包工、包产、包投资到小组、到户，各社可根据自然条件，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多种经营。

环江县在全国也是搞三包到户较早的，所以它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这之后的反“右”斗争中，跟随我一起搞“三包到户，分级经营”的一批干部，包括县委正副书记三人，农村部正副部长二人，区委书记四人均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被冠以极右派和右派头子的“桂冠”，送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半。在其后的18年中，全家又被流放农场，备受凌辱和批斗，几至绝路。

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被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被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出身不好的人被说成是“王定的社会基础”，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三面红旗飘荡神州”，环江县在新县委领导下，掀起“大跃进”高潮，要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用并蔸的方法来创造这一奇迹。县委派出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农业部副部长等一批人马坐镇，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然后再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入田中后，不分昼夜地动员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南门、北

门、地麦、陈茶、良伞、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百多亩水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快成熟的稻禾，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干部日夜看守护理。稻禾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安装上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

我一次被批斗后经过这块田头，不自禁地哼了几句："这样搞怎能增产放出卫星，岂不是劳民伤财?"当晚他们便组织群众对我进行批斗，把我全家九口扫地出门，将我又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判劳动教养三年。子女均不准读书、当兵、当工人，连婚姻都受到限制。

1958年9月初，广西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发函邀请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了检查验收团，成员有自治区、地区党政领导、自治区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技师。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中共环江县委书记威风凛凛地向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地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奉命到场的社员六千多人参观了收割过程。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了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他们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行一圈后，再到县委大院过称。过完秤，他们又重新挑回到未过称的队伍中再重新过秤，如此循环反复，产量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统计人员根据登记数字计算，折合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县委书记的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三天，1958年9月12日，广西第一大报在头版头条用特大号字套红制版报道了环江县创全国水稻丰产的最高纪录，同时登载了"小孩在（稻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等三张照片，随后，9月18日《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环江亩产13万斤的消息。1958年7月25日，《广西日报》在评论中说："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在'反冒进'的歪风邪气笼罩下，环江上空乌云弥漫，鬼怪横行，特别是以前县委书记王定为首的右派集团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实行三包到户，作物下放……农村中资本主义昂首阔步，生产萎靡不振"；"在党的教育下，环江人民粉碎了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的进攻，在思想上插上了红旗。因而生产飞跃前进，今年早稻空前大丰收"；"环江人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政治挂帅是思想解放、革新创造的动力"。

大量的宣传报道，自治区、地区、县都组织了现场参观，络绎不绝的人将小小的县城挤得人山人海。随后越南也派来了代表团到环江参观考察，苏联专家也来询问这一"奇迹"的奥秘。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荣誉也接踵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成了功劳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扛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环江县1958年全年粮食上报总产量是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于是，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可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4、5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群众无粮可交。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总产量下调为2．4亿斤，征购任务也改为0．3156亿斤。他们将包括群众口粮、猪牛牲畜饲料粮在内的集体小仓库的粮食都算入征购数，并明令：谁若擅自开仓，开除党籍、公职。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等地讨饭度日，谋求生路。社员家中无炊烟，公共食堂也长期揭不开锅盖。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事实，稍有良知的人们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的真实情况，结果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进行反复批斗。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回来后向县委反映那里的真实情况，结果莫仁忠被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

环江人民付出的如此大的血的代价和教训，曾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的我常感悲痛，难以自容。

（责任编辑　洛　松）

访陈独秀江津故居拾闻

● 欧远方

1997年10月，我利用参加“陈独秀与中国文化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的机会，访问了陈独秀晚年客居四川江津市时的故居——距江津市区三十多华里的石院墙。

我们一行在江津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张荣华陪同下前往。因为近年到石墙院访问的人日多，当地政府已把公路从江津接通到这里。陈独秀最后三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陈独秀在坐了蒋介石五年牢之后，因抗战爆发出狱后在暂住南京期间，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邀请陈独秀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均为陈独秀一一拒绝。他也拒绝了胡适要他到美国写“自传”的建议。此时他先后寄居傅斯年家、陈钟凡家（陈是北大学生）靠朋友资助度日。后又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乃偕夫人潘兰珍赴武汉。在武汉期间，董必武曾受中央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不同意。陈独秀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做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愁潦倒的漫长道路。

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通过他又认识了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来到江津县，经过一番波折，最后定居于清朝拔贡杨鲁丞家——石墙院。

陈独秀为什么住进石墙院，也是一个巧遇。陈独秀流落重庆期间，偶尔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杨鲁丞所著《皇清经解》抄本，很有兴趣，出钱买下，到江津定居后，一次在茶馆喝茶时和邓燮康提起此书。邓燮康告诉他，杨鲁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覆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邓燮康又告诉陈独秀，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不欣赏他的作品，还批了“乱杂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没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陈独秀应邀答应为之整理，就这样陈独秀住进了石墙院。此时石墙院主人是杨鲁丞后人杨明钦。陈独秀住在大院平房右侧一个小院，四间房子。陈独秀之所以同意住进远离江津、地处山坳的石墙院，除整理杨鲁丞著作外，主要是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便于整理他在狱中就着手著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所谓“小学”，实为文字学，类似《说文解字》。此书完成后，国民党教育部打算出版，但稿件送审时，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退回去了。此时的陈独秀已贫病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笔钱度日，可

他就是拒收这笔稿费。这就是陈独秀的风格。陈独秀还未来得及把这本书最后一个字"抛"字注释完，就去世了。这本书后来有人油印，最终命运不得而知。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此书有独到见解。

陈独秀住在石墙院，虽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来拜访的人仍然很多，小到县长，大到国共两党要员。县长罗宗文和他交往甚多，陈独秀书法好，对书法理论有独到见解，曾送罗宗文一杜诗条幅。罗奉调铜梁县，又送他一副对联："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县长是公开来的，潘兰珍曾对人说过："县长来先生家时，双石场上要打扫街道。"言下之意，比县长大得多的人是秘密来的。张国焘此时处境已经不妙，建议蒋介石派人来争取陈独秀取代自己。蒋介石欣然同意，派戴笠、胡宗南前往，并请陈独秀老友高语罕引见。戴、胡二人前去名为慰问，实为挑拨与中共关系，他们带着新出版的《大公报》、上载康生文章，诬蔑陈独秀是日本间谍，每月领取300元津贴。陈独秀未去成延安，与他不愿认错有关，更与王明、康生对陈的诬蔑造谣有关。

来拜访陈独秀的还有已做了大官的学界名人傅斯年、罗家伦，至于陈的老友高语罕、邓仲纯等安徽老乡，北大同学，江津名流，就更多了。石墙院自从来了陈独秀这个"神秘"人物，一下子出了名。

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党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访问了陈独秀。《成都晚报》吴塘文章，对这次访问有详细记载：

周恩来在朱蕴山陪同下，一走进石墙院，一股凄凉萧索之气向他袭来，不禁一阵心酸。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倚坐在一张木床上……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周恩来走到床边与陈独秀握手，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头一阵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涌上心头。"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希望他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

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贫病交加，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夫人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连柏文蔚(陈的老友，后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了补贴生活，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陈独秀还被小偷光顾过。小偷可能以为那样多名人来拜访他，一定是个富户，谁知除衣物外，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和陈独秀"小学"手稿和印章"独秀山民"。陈独秀始终是在国

今日石墙院

江津康庄陈独秀衣冠冢

民党特务监视下的，当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没有追回，陈独秀非常痛心。当友人前来安慰时，陈独秀幽默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

进入石墙院，张荣华担当导游，一一介绍。整个院落是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约二百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是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的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是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现在则是主人堆放农具和柴草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有玉兰一株，张所长说是陈独秀所植，一株盛开的"炮仗红"和它相倚，倒是有点生气。这个小院，也是青石铺成。

现在，杨家后代杨明钦一家就住在这个小院。张所长请司机开车到附近小学把杨明钦女儿找来，打开房门，我们才进入室内。室内除家具外，作为陈独秀遗物，有三个箱子、一个一米多高的站柜、一张大木床，睹物思人，不禁唏嘘，几经沧桑，能保存下来，也就难得。张所长介绍，拟将此屋住家另觅新居，把此院作为陈独秀陈列馆，供游人参观。

出了后门，见整齐的石墙外面，一丛丛绿竹茂盛地点缀其间，并有一块菜地，这就是陈独秀当年种土豆的地方。

参观完毕，又请来了两位当年曾与陈独秀作邻的老人，一位是93岁的张治林，一位是85岁的妇女吴国兴。张是个佃户，他们一致盛赞陈独秀待人和蔼，见人主动打招呼，常穿布鞋和蓝布长衫，偶尔也和邻居摆摆龙门阵。他们也一致赞扬潘兰珍对陈独秀的照顾，一日三餐皆由潘兰珍亲做，和杨家共用一个厨房。谈话结束时，张治林忽然高声说："我们现在还托陈独秀的福。"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这个村没有大路，为了外地人来参观方便，已把公路修通，上集买卖都方便了。他举这个例子来表达他对陈独秀的怀念和感激。

陈独秀当年是个叱咤风

安葬陈独秀的邓蟾秋

安葬陈独秀的邓燮康

云的人物，坐过五次牢，到处奔波，生活不安定，到老心情又不好，吃饭早一顿晚一顿，热一顿冷一顿，致患有胃病、高血压、心脏病。在重庆、江津期间，多由邓仲纯为他义务诊治（邓是留德医生，在重庆开一家延年医院），其他医生也为他义务治过病，有时则利用民间草方。1942 年 5 月 23 日，曾代表陈独秀参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看望陈独秀（一说来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云和张国焘夫人杨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多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医治无效。陈独秀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谕交待：“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时在一中学任职)，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 5 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在 1942 年 5 月 27 日晚 9 时 40 分。享年 63 岁。当时除夫人潘兰珍、三儿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瑜、侄孙长文等亲属外，尚有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在侧。陈独秀去世后，衣衾、棺木与墓地等均由邓蟾秋、邓燮康赞助，社会各方多有支持，捐赠和赙仪总数为 33750 元，支出 38753.01 元，超支 5000 元，由北大同学会拨付。

陈独秀灵柩于 6 月 1 日下午 1 时 30 分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此地也是邓蟾秋捐赠。出殡之日，陈独秀亲属和双后小学学生百余人随行送葬，从鹤山坪到康庄三十里，两旁站许多人群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下葬时，江津几乎所有政要和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葬礼，墓碑上刻有“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是著名文学家台静农的手笔。同时，江津各界人士在国立江津九中高三礼堂举行陈独秀简朴而肃穆的追悼会，参加者有安徽同乡和本校学生。没有花圈，没有鲜花，没有青松和翠柏，只有陈独秀遗像放置在礼堂主席台桌子上，两边摆着几副纸书的挽联，其中两副：

其一：

纵浪人间四十年

　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

　毁誉宁凭众口传

其二：

伊人去兮　事迹犹存

一生功过　自有评述

55 年过去了，陈独秀一生是非功过应该清楚了。

潘兰珍在友人帮助下，在重庆附近一家私人农场找到一份工作。4 年以后，她又回到上海，从原藉南通老家接回寄养在友人家中的养女小凤共同生活，不幸患了子宫癌，于 1949 年 11 月去世。

抗战胜利后，陈松年亲往四川江津将他父亲灵柩迁回安庆，和他生母高大众合冢，安葬于北郊十里铺。解放后经中央决定为陈独秀竖立墓碑。碑的正面是“陈独秀之墓”，碑的背则镌刻着陈独秀生卒年月，等于是一块“无字碑”，真是“一生功过供人评述”了。

从重庆回到合肥不久，接到张荣华从江津打来电话说：江津市已决定把住在陈独秀的故居的杨家另觅新居，把故居小院辟为陈独秀纪念馆，把陈独秀遗物及有关资料集中陈列，供人参观。康庄的陈独秀墓加以修葺，成为江津市一个旅游点，供人瞻仰和游览。又悉，安庆的陈独秀墓也将重修，开建陈列馆。

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都是“五四”运动打出的大旗，这两面大旗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在内的一批启蒙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共同提倡的，而其中影响最大、号召力最强的当属陈独秀，“五四”运动提出的任务迄今尚未完成。那末，对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历史评价，也应该重新认识，这是符合逻辑的。

（欧远方，原《安徽日报》总编辑、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现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文　思）

作者笔触沉重，凝聚了他几十年的痛苦思索，通过叙述这位“父母官”的不幸，他告诉了我们一部切切不可忘记的历史。

省委书记赵健民三写血书

● 席星嘉

回到故乡

赵健民参加革命后，6 年的地下工作，4 年的抗日战争，3 年的解放战争，都是在自己家乡这块苦难的土地上进行的。1937 年他遭监禁，被党营救出狱之后，日本侵略军已兵临济南城下，他在悲壮声中离开了故土。

1955 年春，他从铁道部副部长调任山东省省长。回到了阔别 17 年的省城济南。这座历经沧桑的名城，有自己蹲过的普利门外的监狱，有自己的北园母校，还有那“四·五”烈士们殉难的地方——济南纬八路刑场。

1931 年 4 月 5 日，在中共山东党史上是一个悲痛的日子。这天凌晨 5 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邓恩铭、刘谦初、卢一之等 22 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 22 位烈士中，有 3 位省委书记同时遇难，其他 19 位烈士，有省委委员、有青岛市委书记、有山东工运、青运的首领人物，还有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郭隆真等。他们是带着满身的累累伤痕，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眷恋，高呼革命口号，昂首走向刑场的！

作为山东人民的儿子，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新任的省委书记、省长，他多么希望能在这无数先烈洒过热血的齐鲁大地上，为家乡父老多办些好事、实事，奉献自己的一切啊！

然而，事与愿违。这位秉性梗直，笑傲刑场，驰骋沙场的汉子，哪里会想到一场政治厄运在等待着他。

赵健民到任之初，按省委分工，兼任监委书记并分管政法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接触的是干部历史积案。当时山东党内政治生活已不正常，党内斗争频繁，前反黎玉，后反向明，每次斗争都处分大批干部。不仅打击面广，处分过重，且多不符合事实。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致使党内关系、上下级之间不融洽，干部互存戒心，遇事谨小慎微，当时有人说：“上床老婆孩，下床袜子鞋，上班不讲话，下班不往来。”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不能广开言路，让干部敢讲真话？对于这个问题，赵健民着实费过一番心思。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赵健民直言不讳地说：“过去山东党内斗争有些过火，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今后党内斗争要注意稳妥，实事求是，强调团结教育，尽量在三五年内避免运动式的大批处分干部，以便扭转某些紧张状态，稳定干部情绪。”这些话很平和，观点明确。但在某些“左派幼稚病”患者听来颇为反感，似有“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之嫌。

赵健民从案卷和材料中发现，不少地方征了过头粮，加上连年有灾，群众惜售，由强征强购而激化了干群矛盾的案件时有发生。当他看到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甚至逼死人等违纪案件时，大为震动，心想：干部作风的好坏，关系到党的形象和党与群众的关系，决不能把强迫命令当成积极性保护起来。

赵健民要求省委对此发通报、发指示，对干部来个约法三章，对违法乱纪者给予严肃处理。对此，有人认为是“小题大作”，并为日后留下了一条祸根。

在此期间，政法部门还时常报

送一些城乡中非正常死亡的材料。调查统计表明，全省每月非正常死亡约八、九百人，多数是自杀。死亡原因：生活困难、年老患病折磨而死者占40%左右；干部强迫命令致死人命者，每月有的十几人，多则40余人，此项合计一年200多人。赵健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该屡屡发生这种非正常死亡。

此外，较严重的是错划阶级成份。有的干部把落后原因完全归咎于地富分子捣乱，而把重划阶级成份当作"紧箍咒"，有的连中农也划成了地主富农，把人民群众当成了阶级敌人。

既在其位，必谋其政。赵健民有一次，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及此事。

没想到，一副热心肠碰上了冷面孔，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对消极的东西那么感兴趣？

1955年10月，赵健民根据5个专区11个乡的调查，提出了一个丧葬改革的方案。就是人死了以后，不要棺材，深埋不坟。据调查推算，全省的坟墓占地约417万亩。每年约减少粮食12亿5000万斤，相当于320万人一年的口粮。而且死亡人数在年年增加，坟墓占地在不断扩大。全省用于棺材的木料就需要20万零4800立方米。于1956年3月，他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了自己的设想，并提出了试点的建议。省委主要负责人回答是："不行！要试点，到你家那个县试去。"

赵健民有一股不计荣辱一干到底的倔劲。1958年5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为中央后补委员的赵健民在会上发言了。主要讲了丧葬改革的问题，会前把自己的发言稿送交省委主要负责人审阅，答复是："你的发言只能作为你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省委。"

"那好吧！我就讲个人的意见。"

赵健民从农村调查说起，谈到千年旧俗、土地、木材的浪费以及丧葬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到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建立新的社会上层建筑的高度。这篇发言全文登在了"人民日报"上。这更引起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恼怒。

动辄得咎

1954年，因"高饶反党阴谋活动"问题，牵扯到原中共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向明问题已于1980年平反。）这场运动株连到省委机关内部和各地市县，又打击了一大片。

向明曾在青岛工作过，重点自然要放在青岛。当时，有人揭发在青岛解放初期，向明（时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王少庸（时任青岛军管会公安部长）"放走了十万反革命"，还允许私商藏匿电台等。这可是个大罪孽、新发现。于是，省委决定成立了向、王专案组，由赵健民负责分管。

向、王一案，还涉及到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若岩等一大批人。华岗，是位学者，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他没有掌握任何确实证据，只是怀疑其有历史问题，就被关押入狱，长达21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平反）。正因为牵扯到一批人，而当时"集团"这个词的使用频率颇高，即定名为"向明、王少庸反党宗派集团"（王少庸后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

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没有发现其勾结敌人进行反革命的事实，也未发现其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就"放走十万反革命"一例来说，经多方查证，真相终于大白。原来，不是"放走"反革命，而是遣送逃亡青岛的各地地主还乡团回乡听候审查处理。

在一次案情分析会上，赵健民也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党的肃反方针是：提高警惕不放过一个反革命，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要根据事实做结论，要对历史负责，不能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

这一席话，触犯了"天条"，说成是"把专案组引导到错误的方向"。

经过又一番深入查证，"反党集团"的事实还是不能成立。赵健民再次犯颜直谏：应先定事实再扣帽子，不能先戴上帽子再去找事实。这下子可撞到了"枪口上"，省委主要负责人批评专案组及其领导者"思想认识界限不清"，审查方法"本末倒置"……

当然，第一书记的话具有极大

抗日战争时期的赵健民

的权威性。接着，就再组织、再发动、再揭发。结果扩大了案情，株连了更多的人。

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奉命去青岛办案，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

“向、王专案组”的部分工作人员，亦受到了批判，甚至戴上了“为反党集团翻案”的帽子。

在这同时，赵健民还为董琰一案进言，遭到了不幸。

董琰，原为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因涉嫌被隔离审查。经过多方侦察查证，没有发现重大问题。赵健民真诚的建议省委主要负责人与董琰谈一次话，尽快解除其隔离。这位仗义执言者又惹来了麻烦：“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搞的过分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56年夏季，中共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在青岛举行。此次会议的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论十大关系》，要求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如果大家齐颂升平，也就相安无事了。然而，在会议进行中间，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话来说：“刮起了一阵妖风。”

所谓“妖风”者，概括起来是两大问题，一是有人批评省委急躁冒进，打了许多废井，劳民伤财；二是说向明问题搞错了，面搞宽了，更不应来那个多余的肃清向明影响的运动。

而作为省委第三书记的赵健民，则因当时未能“挺身而出”，被认识“一言不发，听之任之”，“态度暖昧”。

1956—1957年，对赵健民来说，算得上是个“多事之秋”。在会议上“闷着葫芦不开瓢”不行。但实话实说，坦诚直言也不行。

1956年8月召开了全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赵健民在会上讲话说：“……水利建设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存在形式主义和浪费现象。全省打井146万眼，废品井就有27万眼。有的没有因地制宜，在不该打井的地方打了井。还有的只挖了一人多深的土坑，挑上两担水，除了摆样子、胡弄参观的以外，一点用处也没有。”

在讲到决策失误时，他说：“盲目制造双铧犁和水车。层层分配数字，搞出来又销不出去，白白积压40多万部，光钢材就浪费400多吨，劳民伤财！。”

就是这样一篇例行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来被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夸大了落后面”，是“反冒进”。

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赵健民对在全省颇有影响的民主人士苗海南、王祝震等划右派时持有不同意见，他说：这些人，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不能要求人家句句都是马列主义。苗海南在抗美援朝时曾捐献过一架飞机，这说明他是爱国的，凭这一点就不宜划为右派。由于赵健民力排众议，苗海南保下来了，但对其他人则无能为力。

赵健民眼看反右扩大化在蔓延，自己无力抗拒，但又不愿亲手去冤枉无辜，只好表示沉默。然而又招来了非难和指责，说是“对以副省长王卓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斗争不力，纵容包庇右派”。

按照当时的逻辑，“同情右派就是右派”，再加上“大肆搜罗工作中的缺点”，“有意统计非正常死亡数字”，“显示自己为民请命”，“想打旗子，当赵青天”，“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看那口气和架势，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兴师问罪

继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左”的思潮迅速升温，认为政治思想战线的斗争还不彻底，胜利还不够伟大，必须再来一次“整风补课”。

“整风补课”，就是整那些所谓“思想右倾”者，好独立思考不大盲从者，发表过不合时宜的言论者，特别是同某个领导意见相左而被斥为“反党”者。

赵健民终于坐上“整风补课”的末班车，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职查办。

在山东政坛上，前反黎玉，后反向明，这次反赵健民算是山东第三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了。采取的方式，先是背靠背的揭发，然后再举行大会面对面的斗争。其间，开过多次省委扩大会、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会，厅局长鸣放会，各厅局批判大会，省人代会，党代会……总之，动用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赵健民在省长任期内，作过多次报告和讲话，既然被列为批判重点，那就得翻箱倒柜，把在每次会议上的发言、所作的会议记录，都查了个“底朝天”，旨在从字里行间寻找“险恶用心”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一次批判赵健民的专场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人发言了，他一连提出了几个为什么？为这场大批判定了调子。

“你为什么反冒进积极，搞合作化劲头不大？”“你为什么对肃反斗争不积极，而对错案却十分关心？”“你被地方主义利用，还是利用地方主义？”“反冒进是什么问题？实质上是反对省委，反对中央。”

“你有意识的统计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好像只有你才关心山东人民的疾苦，这是培植个人威信，意在山东打旗子！”

“你赵健民唱的什么对台戏？当资产阶级民主人士骂我们合作化搞糟了，我们就该唱合作社好得很；他们说1956年生产冒进了，我们就该批驳他们，这不是冒进而是跃进；他们说我们肃反有偏差，我们就该肯定肃反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他

们说我们以党代政，我们说就是要独揽大权，党政不分……”那居高临下的霸气咄咄逼人。

在这同时，在省直各机关，在济南、青岛、在泰安、济宁、荷泽、惠民、德州等市、地，也都摆开了战场，抓大大小小的“地方主义分子”，“右倾反党分子”，“右派反党集团”，说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大跃进”、高指标一片声喧之时，赵健民虽身处逆境，仍心怀忧虑。他对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赫然登着“寿张、范县亩产千斤谷子”，“聊城、菏泽争创亩产双千斤专区”的消息，困惑不解，赵健民提出要到聊城地区去看看，省委欣然同意，于是组织省里一些“怀疑派”、“老右倾”去范县、寿张实地参观，意在让他们接受教育。

从冠县到范县，一路上看到听到的事令人惊讶，一亩地下100多斤麦种，连地皮都拱起来了。车到胡洼、马口一带，这里是赵健民打过仗的地方。他先到大食堂参观，看见笼屉里放着一些地瓜头，便问道：“不是亩产千斤吗？怎么还吃这个？”陪同人员回答：“图吃个稀罕。”

1958年10月，大批判的风暴愈刮愈烈。一夜之间，济南珍珠泉大会堂内外贴出了上万张大字报，声讨赵健民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

历史是如此巧合，22年前，即1936年10月，也是在这个地方，赵健民被打得遍体鳞伤，戴着脚镣手铐在韩复榘的法庭上受审，没想到那段历史会在自己人面前重演。

深秋的寒风呼啸而至，落叶如织，霜寒似冰，省城济南的气温骤然变冷。

10月31日，省人代会开幕。11月1日大众日报在“高举共产主义红旗坚决肃清地方主义……”的通栏标题下，报道了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深入揭发发批判赵健民的消息。第二天又报道说：在两天半的大会讨论中报名发言的共有245人。截止11月1日上午，已作批判发言的75人，书面发言170人。1月2日大众日报第二版、第三版上连续刊出了批判文章23篇。这里只举出几则标题的足以看出批判的内容和分量了。

“赵健民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保护人”

“赵健民是树地方主义的旗手”

“赵健民是反冒进的代表”

“必须拔除地方主义的白旗”

风声鹤唳，四面围剿，赵健民处于这场政治风暴的中心。

就在人代会开幕的这天，赵健民面对485名代表作了检讨，违心的承认自己犯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就在这次人代会上，选举了新的省长，但在公布的正副省长名单中没有赵健民的名字。

申辩与罢官

1959年1月24日至2月6日，中央山东省一届三次党代大会在济南举行。

这是继全省人代会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决定赵健民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听取省委第一书记的报告，批判和处理赵健民问题。

党代会之前，赵健民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会议，看到了“省委关于赵健民同志所犯错误向中央的综合报告”，并给了他一次在预备会议上发言的机会。

报告中给赵健民戴了三顶“帽子”，列了六大罪状。这三顶“帽子”是“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六大罪状是根据揭发材料综合而成。总之，问题是够严重的。

这天上午8时30分，赵健民走上庄严的省党代会预备会的讲台。一上来就先声明：我要申辨。有关我的缺点错误的检查留待以后再作，我今天要做的是，按照党章中有关规定，谈谈我的一些意见。

党章规定：“对党忠诚，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允许“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在党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要求亲自参加。”第六、七项还规定：“对党的决议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直至向中央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等。

“——几个月来我很痛苦！感到最大的痛苦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缺乏实事求是。”赵健民说，今天我就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谈谈我对省委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的意见。

赵健民坚持认为，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企图推翻中央和省委关于向明、王少庸问题的结论，为向、王反党集团翻案”，说他“纵容、支持右派集团王卓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说他“自成中心、自成系统，在组织上闹分散主义”等问题，全是无中生有，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他把9个月来的委屈、激愤、忧伤情绪，像打开了闸门似的喷涌而出，整讲了一上午。

时近中午12时，赵健民提出延长时间，要求把话讲完。当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省委常委、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他征得大会主席团的同意后，决定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赵健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逐项申辩，又讲了三个小时。

“请代表们和省委审查我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还将向中央提出申诉。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赵健民在结束时说。

2月5日，中共山东一届三次党代会正式开幕。首先由省委主要负责人作工作报告。他用了大量篇幅批判赵健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

行。"……以赵健民同志为代表的地方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破坏党的统一,企图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他想利用自己是山东人,以过去在山东工作的历史资本,并利用党内一部分落后层——地方主义分子来实现其个人打旗子的卑鄙目的。错误的本质是打地方主义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次日,长篇发言全文登在"大众日报"上,并为此发表了社论。

就在这一天——2月5日,大会通过了"中共山东省一届三次党代会关于赵健民等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撤销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保留省委委员,工资待遇由行政6级降为8级。下放基层锻炼,交由省委继续审查处理。

在通过决议时,赵健民向大会主席团递交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组织服从,思想不通,保留意见。"

就在这份报告中,当场宣布受到党纪处分的共21人(均是地、市委书记以上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这些人有的被定为"右派反党集团",开除党藉,一撸到底;有的被定为"地方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3—5级,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

这场"整风补课"运动,不只是在省级机关和领导层,而是遍及全省各地。各种名目的"反党集团"就有十多个。

1959年仍持续"大跃进"。饥饿、灾荒和死亡的恐怖严重地威胁着齐鲁大地。惠民地区的农民大量外出逃荒。半饥半饱的人全省数以千万计。因为每人每天只吃几大两粮食,普遍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水肿病和肝炎。也许是大自然进行报复,吹得越大的地方,灾荒越大,死人越多。万般无奈,用瓜菜代替粮食,简称"瓜菜代"。

多年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养成了一种本能的适应性,这就是随时准备战斗,不斗人则自己挨斗。白天办公晚上斗,上午办公下午斗,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

每次运动总要伤害一批人,也总会给党留下一批遗留问题,往往一年运动,十年、廿年未了,使不少同志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有资料表明,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山东全省共有50多万名党员、干部和工人、农民、教师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处分(包括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等)的党员有92303人,占全省党员总数的6.3%,其中仅开除党藉的就有37216人。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属于中央管理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地、市委书记及厅局级干部)7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19%;属于省委管理的(县处级)393人,占同级党员数的20.8%;属于地市委管理的(科级)2484人,占同级党员数的18.1%。

在"整风补课"和"反右倾"斗争中,共处分省委委员、后补委员17人,其中被开除党藉的7人,省委常委13人整掉了6人,省委书记6位书记整掉4人。这是建国以来,山东第二次高层领导的政治震荡。

至此,言路堵塞了,"万马齐喑"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一言堂"形成了,不同声音听不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些冤假错案都先后得取了平反和改正,当发现这些人确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且是有用之材时,人已满鬓霜白,已到垂暮之年。有许多人已撒手人寰了。

赵健民还算幸运,在他身处逆境的日子,竟还有许多能够与他说句知心话的人。令他终生难忘的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早在转战冀鲁豫时期,杨是赵的上级首长。来山东后同是省委常委。杨得志将军了解赵的过去,深知他的为人。一天,悄悄约赵到家里吃饭,鼓励他正确对待批评,并说:"那天党代会上你讲得倒很痛快,我却为你捏一把汗,知道不?大家一举手你的党藉就完啦!"

1958年大跃进刮起的阵阵狂风(史称五风),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导致了全省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连续三年饥荒,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据不精确统计,三年中全省仅饿死和外出逃荒达300多万人。

1960年10月,中央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撤销其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山东。

耐人寻味的是,整人的人后来也挨了整。这位原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并且被专案组专了政,受尽了人间折磨。但为什么自认为最革命的人却又挨了别人的"整"呢?这正是极"左"思潮的恶果,也正是那个年代悲剧之所在。

又一次冤狱

1962年,赵健民枯木逢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49年赵健民曾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参加了解放云南之役,对地情、民情还比较熟悉。此次重回故地,心情十分平静。但不久,又陷入了一场政治灾难之中。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全国各地一样,红卫兵开始冲击云南省委,工厂停产,交通中断。赵健民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经常受到揪斗和游街示众。

面对此种混乱情况,赵健民忧心如焚,急不可耐地决定赴京面陈一切。

1967年3月的一天晚上,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赵健民坦率地谈了他对"文革"胡乱揪斗干

部、群众武斗、各地工作陷于瘫痪的一些看法。

康生半闭着眼睛，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来了一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赵健民回答："不就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赵的回答显然不满意。"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还谈到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61 人叛徒案。他得意的说："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

1 个多小时的接见，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还给康生留下了个"表情阴沉"、"语言缓慢"的不良印象。

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到处武斗成风。新年刚过不久，赵健民就奉召赴京。

1 月 21 日凌晨，赵健民匆匆赶来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

不大一会，康生在谢富治陪同下步入会场。康生坐定后便阴沉着生硬地叫了一声："赵健民！"

"有。"赵健民站起身来，点了点头。

"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健民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使劲摇了摇头。

"赵健民，你为什么不回答？"谢富治在一旁帮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问题嘛！"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赵健民答道，"现在云南形势很乱，我正要向中央汇报呢！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这样下去……"

康生立即喝斥："你放毒！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健民不假思索地坦然答道："我是 1936 年 9 月被捕的。"

"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没有自首过。"

"你还在欺骗我们，你是叛徒。"

猛然间一股被侮辱的悲愤之火在赵健民心中升腾："我就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捕的。康老，请问，说我是叛徒有什么根据？"

"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叛徒。凭我革命 40 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叛徒。"康生表情更冷酷。

"康老，你可要实事求是啊！凭敏感？哪有这个标准?!"赵健民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中顶撞了这位中央大员。

康生忽地站起来："你疯狂得狠，你这个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

赵健民面对康生的栽脏陷害毫不屈服："说我是混进党内的叛徒，还有什么搞乱边疆的行动计划，这决不是事实。搞乱边疆的确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将来历史会证明的。我保留意见，请求中央审查。"

康生把桌子一拍："不用你请求，一定要审查。我接触过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像你这样疯狂的还是不多的，你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心里明白，什么样的下场在等着你。"话到此处随即又挤出一句："那好，你就保留吧，但要立刻写出要求审查的字据来。"

赵健民向全场打量一下，几个带枪的武装人员早已守候在那里准备抓人了。他心里明白，写与不写命运都操在他们手里，倒不如趁此机会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接过递过来的纸笔，愤然疾书：

我在被捕期间，用生命保卫了党的利益，特向党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请中央审查。赵健民

1968 年 1 月 21 日夜

康生当场宣布："现在决定，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接着谢富治向他身后站着的人一摆手，两个武装人员走上前来，把赵健民反剪双手，连推带搡地拖下楼去。

在长城脚下的秦城监狱，赵健民被单独关进一间鸟笼子式的 9 号囚室，穿上 9 号囚衣，从此时起，他的名字也就变成了"9"号了。

1970 年 1 月 18 日，康生又一纸令下，赵健民被戴上背手铐，送上飞机。

飞机像一叶孤舟，飘向南方。

下飞机时，帮派们用一条长围巾把他的头脸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再用大衣捂住头，不准他说话，要他装成传染病患者。

汽车装载着赵健民，故意在市区东拐西拐地转了几圈，最后拉到距昆明 50 多公里的一座监狱。

赵健民被揭去蒙头的围巾和大衣，定睛一看："这不是第三监狱吗？"专案组的人惊讶不已："你怎么知道？""我来过这里。"是的，当年修建这座监狱时，从勘察、定点到设计、造价，都是由他签字批准的，而今，坐他自己兴建的监狱，无异于"作茧自缚"。

在云南第三监狱，赵健民蹲了半年多竟无人问讯。无书读，无纸笔，连腰带也被抽去了。他一天又一天的面徒四壁，一阵又一阵的陷入沉思……

身陷囹圄的赵健民哪里知道，就在此时，一个由"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帮派势力编造的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反革命匪帮——滇西挺进纵队"这两个政治大假案，正在扩大案情，迫害着成千上万的无辜。他们把这两个"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赵健民，再上挂下联，

使数以10万计的干部、党员和群众遭受残酷批斗和无情打击。先后使14000多名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打伤致残38500多人，并株连了无数的家属子女及其亲友。

赵健民哪里知道，就在此时，他的夫人杨瑞波——一个工厂的工艺科副科长，只因为她是赵健民的老婆，也被关进了“牛棚”，整日整夜的被批斗，罚跪罚站，挂牌子游街，“坐喷气式”。

赵健民哪里知道，他的大儿子被打成“赵氏小爬虫”被批斗，挂牌子，关押，最后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二儿子为避免批斗时抓头发，他把头发剃光，结果揪着耳朵拉上台去。十多岁的三儿子和七八岁的小女儿也被歧视、虐待。

血染的忠诚

在云南第三监狱，赵健民为了表示自己强烈的抗议与要求，考虑再三别无选择，只好写血书。1970年8月23日，赵健民趁上厕所之机，在扫帚上折下一根小竹棒，带回牢房，然后用指甲劈成竹签，刺破胳膊，一次血不够用，他加重刺了两次，把血书写在手纸上。内容是：

1. 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尽快查清；2. 我要纸笔给中央、省委写报告；3. 准许把家中的马列书、历史书拿来阅读；4. 准与家人见面。

血书转递上去了，促成专案组正副组长的“光临”。但他们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审讯，不让讲话，不让说事实真相，不让作辩解。在审讯过程中，专案组长还多次让看守再紧背手铐。回到牢房，看守把手铐一打到底，钢刃卡到骨头里，赵健民疼痛难忍。

审讯过后，折磨得更残酷了。在第三监狱的40多天里，赵健民戴了34天的背手铐，曾一连4天不给水喝。为此，赵健民用一颗小钉子在墙上记录了那次“审讯”：

审讯不准我申辩
只问片面严上严
说明事实也不准
催签威压难鸣冤
钢铐紧箍骨肉里
道道血沟不堪言
我争真理信心大
主因太阳明高悬
……
有罪立即判我罪
无罪放我出牢监
……

全诗长达42行。是一篇血的控诉。

春去夏至，转眼秋尽冬初。但第一次血书要求的事项一项也未答复。为此，赵健民又用钉子刺破口腔写了“为四请再写血书……”血书刚开了个头，就被看守发现。看守一面按铃呼人，一面喝令停写。写血书未成，赵健民采用绝食来抗争。

1974年6月，赵健民决定再写血书与这抗争。但他心下思忖：刺破胳膊或口腔血都不够用，想来想去，只有刺破鼻腔才可满足需要。这天下午，赵健民趁看守打盹之时，猛刺鼻腔，滴滴鲜血流入口缸，足有二指多深。他用木棒缠上布条，蘸着鲜血也搅拌着辛酸与悲愤，在旧报纸上写了两张大字血书：

血书是写给云南省委并报毛主席、党中央的，大意是：

我被密审密押已7年，调查研究百几十遍，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若要按照党的实事求是办，完全可以很快作出结论。然而明明具备条件不予解决，那我就考虑去海格特请马克思给我作结论了。最后署名是：中共党员赵健民。

这似乎是一封绝命书。在关押赵健民期间，光外调就化去40多万元，连叛徒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1975年9月30日，赵健民接到解除关押释放出狱的通知。但仍给他约法三章：一、不准他单人外出；二不准接触外人；三、不准和外面通信。

被释放出狱，赵健民没有笑，他8年没有笑过，已经不会笑了。

赵健民出狱的第二天，当他得知在“划线站队”中因赵健民“叛徒、特务案”被株连十数万人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时，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却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场。

1978年2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赵健民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云南省委发出在当时流行的模式通知，向全省军民公开申明：

“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凡“强加于赵健民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恢复名誉。”

至此，这一政治冤案以及所牵连的人宣告彻底平反了。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赵健民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作为中顾委委员，他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进行调查研究；为协助中央选拔、调整省级领导班子，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他对党内某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深痛恶绝。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一个重要会议，在发言中他痛切的说：我们有些干部如同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很令人痛心！为什么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个问题很值得沉思。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能打倒我们，但如果让腐败滋长，搞不好会自己打倒自己。

如今，赵健民凡是有益社会，有益于两个文明建设的事，他都积极参与，经常不顾80多岁的高龄往返于津浦、京昆沿线各省市之间，继续发挥着他的光和热……

（席星嘉：74岁，1940年参加工作，离休前任山东省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黄公略的最后岁月

●毛祖棠

1930年2月的江南，正是淫雨连绵、乍暖还寒时节，几十名红军及特委代表，风尘仆仆地赶到富水河畔一个名叫陂头的村庄。这里是赣西南特委的所在地。

从2月7日到9日，他们在此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联席会，史称“二七”陂头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出任前委书记。前委委员由毛泽东、朱德、方志敏、曾山、彭德怀、黄公略、陈毅等17人组成，彭德怀、黄公略二人另被指定为候补常委。黄公略在这里认识了毛泽东。

这个有着上千人口的村庄煞是热闹了一阵，当地剧团在永慕堂前举行军民联欢，毛泽东、贺子珍夫妇被邀上台有板有眼地唱了一支兴国山歌，刚上任红六军军长的黄公略，拉得一手好二胡，也出场亮相。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行动口号，让黄公略感觉耳目一新。黄公略更关心的是红六军的前途问题。因为在会上，有人提出撤销新成立的红六军，以维持原来的游击状态。黄公略当场就跟几个人争了起来，最后，还是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做了一番说服工作，红六军建制才得以保存下来。

红六军是由原来的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和永新、宁冈、莲花几县部分赤卫队组成，人枪各有二千。成立之初，黄公略从五军带过来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43名骨干，以及干部训练大队原班人马。尽管如此，六军暴露出的问题还是让黄公略感到棘手。

2月23日，红六军一、三纵队配合红四军攻打驰援吉安的敌唐云山旅。阵前，黄公略亲眼目睹这样的事：一名由赤卫队员转来的新战士，射击时竟把子弹倒装进枪膛里；新缴获来的“哈希克斯”轻机枪，竟无一人会使用；除此以外，长期游击战遗留下来的盲动习气、“山头主义”等也十分严重，影响了队伍的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

黄公略与政委陈毅交换意见，决定搞一次整顿。

整饬后的红六军发展很快，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不到半年的时间，人口迅速增至400万人，赤卫队、少先队员达到七十五万余人。还在这里相继发展了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五军。7月上旬，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闻报喜讯，兴奋异常，禁不住在马背上赋词寄怀：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同在7月，红六军更名为红三军，然后经万载进入湖南省界，远离苏区奉命去攻打长沙。当时，黄公略是力主退兵的。殊料，红三军团的部分湘藉官兵，此时不愿离开乡土、东渡赣江去打仗。黄公略从大局出发，主动来到他们中间，苦口婆心，晓以利害，做了大量细致的动员工作。

是年底，方面军刚刚退回到根据地内部，接着又发生了“富田事件”。

一天，黄公略在驻地发现一条大幅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黄公略感到事态严重连夜骑马赶60里山路，来到东山坎红三军团了解情况。他找到彭德怀、朱德后三人统一了意见，联名公开发表了以下的宣言：

“诱敌深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

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毛泽东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右倾等于无的放矢。

“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

12 月 25 日，红一方面军在小布村召开反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誓师大会，次晨就进入山区设伏，准备迎击前来进犯的敌人。

“进剿”军前敌总指挥兼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气焰嚣张，声称“吾与共军誓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并宣布“打到东固去，发财归自己。”俟近东固，见山头上人头攒动，误把先期抵达的公秉藩师当成红军，一阵狂袭，从早上打到中午雾散，才知是自家人先干上了。

挨了打的公秉藩认为张辉瓒妒嫉他先占东固抢了头功，一气之下，率部折回富田“休整”去了。

29 日晚，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决定先打张辉瓒。但在决定由谁来打主力的任务时，一度出现分歧。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说：“我看公略同志比较合适。”

红三军于 30 日拂晓抢占了正面高地——黄竹岭。黄公略指挥部队抢修工事，不多时，就见敌先头搜索着抵近。

敌人已进入射程，黄公略高喊一声“打”！ 霎时，漫山遍野枪声大作。张辉瓒的十八军很有战斗力，尽管遭到红军的突然袭击，阵脚未乱，迅速组织部队向红军阵地冲击。

战斗到午后，张辉瓒又驱动两个团向正面高地上的红七师实施猛攻，战斗一度进入白热化。

下午 3 时，红十二军向敌侧后迂回，红三军团各部也相继从北面山上冲了下来，敌军全线崩溃。

红三军攻到敌师部跟前时，张的警卫营长，原是黄公略在湘军时的一名部下，他早把全营集合好，等黄公略一到，号兵吹响了礼号，一营人举枪肃立，营长毕恭毕敬地走上前报告，然后将缴出的枪整整齐齐摆好。连营长随身佩挂的蒋介石授予的“杀身成仁”刀也一并缴了。

是役，张辉瓒两个旅九千余人竟无一漏网。打扫战场时，又捕获躲进荆丛、一身伙夫打扮的狼狈的张辉瓒。

时隔三月，红一方面军又在东固一带伏敌长达 25 天之久。三万将士荫蔽在不足 40 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给养成了大问题。时间一长，部队情绪躁动。黄公略一面做好红三军各级指挥员的思想工作，一面和大伙一块拔竹笋、捞鱼虾、摸螺蛳。将士们精神振行起来，坚决执行了总部的作战总图。

黄 公 略

5 月 15 日，侦悉屯驻富田方向的敌人已倾巢出动。是夜，毛泽东同黄公略敲开乡苏维埃土地委员老洪的家门，打听有无通向前沿的捷径。老洪告诉他们，过了三采有一条小路，向北可通山坑、观音岩、将军峁。

毛泽东当即指示黄公略：抢先占领将军峁、观音岩，是夺取这次战斗胜利的关键！ 黄公略立即率部改抄小路，夜行军进到将军峁。翌日午后，敌二十八师懵懵懂懂进入我包围圈。敛威屏息的红三军来了个猛虎掏心，横扫敌阵，直打得敌人抛枪丢盔。敌师长公秉藩也被赤卫队俘获，后佯称营部书记，领了二块银元得以逃脱。

毛泽东那首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诗词，对此次战役作过形象描述：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飞将军自重霄入”，这个“飞将军”就是指的黄公略。

1931 年春天的湖南《民国日报》上曾刊书一则假消息：黄公略既已将母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其悔过情殷，投诚心切！ 在此之前，何键

就已将黄公略的母亲、妻子一行拘至长沙。

显然,这是敌人施展的离间计。

其时,报上又透露,蒋介石已委任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还委任黄公略的兄长黄枚庄为参议,让黄枚庄带着蒋介石、黄汉湘的亲笔信及1500元银洋往苏区招抚。

黄枚庄一行二人刚进入苏区,就被带到了红三军团指挥部。军团长彭德怀出面接洽。一面虚以应酬,一面电告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候示。毛泽东立即指示:这个问题由公略同志自己处理。

其时黄公略率领红三军正在宜黄、南丰等地筹款筹粮,接到前委及毛泽东的电报,知道自己的大哥充当了蒋介石的说客,怒不可遏。“通”地擂响了桌子,对身边的陈奇涵参谋长说:

“蒋介石、何键这些蠢才,要拉拢我那是痴心妄想,永远办不到!”

话毕,黄公略不顾母亲妻子尚在敌人手中,立即拟了给前委电稿:

“……*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采取了分裂红军的可耻阴谋。我黄公略坚信革命必定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我义无反顾,与黄枚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枚庄处以死刑,将黄的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

接到回电,彭德怀立刻对黄枚庄进行审讯并录下了口供,接着让保卫部长砍下黄枚庄的头,装进一个煤油桶,并给蒋介石附了一封信:“蒋贼弃国,罪当刀剐”,“枚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之……”让同来的人捎了回去。

不久,红三军全体指战员和当地数千群众在宁都青塘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前几天,蒋介石派黄军长哥哥来诱降,黄军长毫不动摇,大义灭亲,把他的反革命哥哥杀了。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我们的事业有这样的同志为之奋斗,还能不成功吗?”

从8月7日始,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正式打响了。黄公略率红三军配合兄弟部队首战于莲塘,次战于良村,与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分别展开了激战,两战皆捷,歼灭了敌人两个旅,俘虏敌人三千五百余人。紧接着,红军乘胜东进,红三军佯攻龙岗,其余主力则急行军三天,出其不意地奇袭黄陂之敌,仅46分钟就解决了敌毛炳文第八师的大部。

9月6日,黄公略侦悉敌人已开始逃窜,决定主动出击,于次日一早率部赶到老营盘,咬住蒋鼎文第九师先头旅及第二十六旅一阵猛袭,取得了聚歼敌一个整旅的胜利。

几乎与些同时,总部也已作出决定,准备集中红三军、红四军、红三军团三大主力围歼高兴圩敌人。但由于各部在运动中失去联络,未能及时调上红三军,结果造成高兴圩之战打成对峙,不但未达目的,反让敌人得以逃逸。

战斗结束当天,毛泽东说:“此役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败仗!”一席话让黄公略震动很大。

15日拂晓,红军再次抢占东固附近的方石岭,截住逃向吉安的敌蒋鼎文部及韩德勤五十四师,激战至上午9时,俘敌五千余,缴获各种枪支四千五百余支,为反“围剿”的最后胜利添写了光彩的一笔。

来不及歇息的红军战士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一支支队伍正向端金方向开拔。当队伍行进到东固六渡凹时,突然,三架敌机从山后窜了出来,像一头疯狂的鹫鹰,恶狠狠地向红军扑来。

六渡凹是东固南端的一块谷地,四处布满了红土、浅溪,只有几处草坡,而且树木稀落,不足以成为屏障。几千人的部队,在敌机一阵狂扫下,战士立即倒了一片。

坡上的黄公略突然冲下山坡,边跑边喊:“荫蔽,荫蔽!”迎面截住一挺机枪和两名战士,三人蹲在一棵樟树下实施对空射击。

参谋长陈奇涵回忆道:“本来,黄军长是不会出事的,他甩开警卫员跑到下面指挥,一下子成了敌机的目标。一架意大利达格佛斯式飞机向他俯冲,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

经过紧急包扎后,黄公略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靠在陈奇涵身上,断断续续地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虽然粉碎了,但决不能骄傲轻敌。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争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稍停,又吃力地吐出最后一句话:“就把我埋在东固,我爱这里的山和水……”一代将星就此献出了33岁年轻的生命。

那天傍晚,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华美的冠盖。只有几排枪声送行,黄公略的遗体由战士起抬出发,另几具伪装用的副棺也同时四向而去。几处墓冢被掩藏在深山大坑中,墓地上不立碑石,平常得像似几堆土丘。战士们说,这样能保护自己的军长!

翌日,几万名红军将士和苏区群众齐集在兴国莲塘,满怀悲痛地悼念黄公略烈士。场中央悬挂的一副挽联格外醒目:

广州暴动不死,
平江暴动不死,
而今竟牺牲,
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
游击战争有功,
毕生而奋勇,
好教后世继君来。

挽联出自毛泽东之手,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追掉大会。

（责任编辑　仲　文）

萧克、张爱萍在“蟠桃”相会

● 东方鹤

元宵节。深圳迎宾馆的蟠桃别墅里，萧克和张爱萍两位老将军在这里热情聚会。

两天前，张爱萍来到深圳，得知萧克两天后也将住进桃园，与他比邻而居，不胜欣喜。头天一大早，他就连连问萧老是几点的车。当萧老于9时许来到“蟠桃”后，张老就急着要前往看望。

刚刚进入别墅的萧老，一听说张老就住在旁边，也十分高兴，连连询问张老的情况。工作人员正向他介绍，张老偕同夫人李又兰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来拜访萧老了。

92岁高龄的萧老步履蹒跚，急急走出室外迎接。他乡遇故知，两位将军的大手紧紧相握，相互久久凝视着，彼此由衷地问候。

两位儒将都是原中顾委常委。离休前，萧老长期担任全军最高学府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职务，张老则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萧老倾几十年心血浇铸而成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曾获国家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张老记述革命一生的诗词、书法、摄影合集《神剑之歌》，一版再版。

一番寒暄后，连坐一天两夜的火车的萧老却不觉疲劳，兴致勃勃地指着张老，缓缓地对大家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

张老接着说：“那是在中央苏区。”

萧老说：“是第三次反‘围剿’之前。”

张老说：“我们住在江西的沙村。”指着萧老，“当时他是师长，亲自拿机枪打飞机。”

萧老说：“他是少共万泰县委书记。而今已经60多年了。”

张老说：“67年了。”

67年，沧海桑田，万物巨变。两位老将军的友谊未变，赤心未变。人们赞叹着，倾听着。

张老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略略提高了声音说：

“刚才讲的事情，发生在1931年7月，萧老任红军江西省军区独立第五师师长。一天，他到我们驻地泰和县沙村来作反“围剿”的报告。报告会是在树林里举行的，大家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嗡嗡……敌机飞来了！大家即分散荫蔽。我们的萧师长从战士手里拿过一挺机枪，就往山上跑，对准空中的飞贼就打……”

“打下来了吗？”一位同志问。

张老说：“敌机吓得一溜烟逃命去了。”

顿时，别墅里响起一片笑声。人们怀着崇敬的目光，望着两位老人，称赞他俩谈笑间灰飞烟灭的大将气派。

思绪还在炮火中徜徉的张老，以平静而亲切的语气对大家说：“事后，我打了一两‘油’，记述了这件事情。”

“闲情自得好打油”，是张老在长期革命战斗中形

成的习惯。在大家的要求下，张老当即背诵了这首诗：

东方晓，
动员列队反‘围剿’。
准备好，
军民奋起，
苏区必保。

敌机低袭狂呼啸，
师长亲举机枪扫。
争分秒，
登山高射，
飞贼逃跑。

声音洪亮，激情洋溢，全场为之振奋，萧老激动地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好，好！”

张老说：“当时乃至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没给萧老看，直到萧老 90 大寿时，我才书写了这首‘打油’，送给了他。”

萧老像自语又像对大家说：“我们是在一个小地方认识的……”连着说了两遍。

张老的夫人李又兰接着说道：“你们又在大地方相聚了，并在大战场上缔结了革命友谊。”

激动中，萧老缓缓地说：“他是我的好兄弟，我们永远站在一起。”说着，便挪动脚步，向张老靠拢。

正坐着的张老，也忙站了起来，并把手杖甩到了一边，向萧老靠近的同时，大声说，站在一起，永远站在一起！

两位世纪老人肩并肩、手挽手站在一起。仿佛经历了无数战火的两座巍峨的大山，紧紧地靠在一起。

一直为现场气氛所感动的接待处长陈新兰，感慨地建议：“两位老将军‘蟠桃’相会，多么富有诗意呀！张老，您写一首诗吧！”

张老说：“这首诗，由萧老来写。”

萧老说：“还是由你来写。”

其实，这首诗两位将军都正在写，而且已经写出来了。不是吗？我们在将军元宵“蟠桃”会上，已经深深沉醉在这首诗中了，并饱享了人间蟠桃的甜美。

张爱萍老将军即兴作“打油诗”一首：

六十七载情谊长，
“蟠桃”相会喜洋洋。
香港回归庆雪耻，
征程携手意气扬。

项英的辉煌与失落

皖南事变之后，在中共党史上，项英成了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时值他百年诞辰，作者觅其革命生涯的一些焦点时刻，向世人较客观地评说他的是非功过。

●曹 英

一

项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项德隆。1898 年 5 月，生于武昌，父亲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

项英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去世、家境恶化而辍学，12 岁就开始了学徒生活。项英由于有小学文化程度，待人又热诚，在纺织厂两千多名工人中很快便成了活动积极分子。

当时，中共主要精力集中于产业工人最为密集的铁路、矿山、海员、纺织诸行业中做工运发动，并从中发现优秀分子作为党的中坚力量。

武汉铁路工人集中于京汉铁路段的江岸区，由于 1921 年 8 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京汉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期望效法，一大代表武汉区委书记包惠僧抓住这个时机，决定首先组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工会）武汉分部的核心分支机构。

正巧，从《劳动周刊》上得知包惠僧这一想法的项英给包写信，说自己非常希望能参加工会工作，包惠僧喜出望外，两人约见后，包惠僧从项英身上发现了工人革命活动家需要的素质：有思想，有抱负，热情，大胆，纯洁，于是包惠僧就把项英作为武汉党组织工运活动的理想人选加以培养，12 月，包惠僧委任项英为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筹备处文书，负责俱乐部的筹建工作。这一年，项英 24 岁。

江岸工人俱乐部在武汉是最大的工人组织，项英参与筹组时，京汉铁路工人在武汉分为多个帮口，尤以湖北帮、福建帮、江南帮势力最大，例如当时的武汉工运领袖杨德甫、周天元、林祥谦、黄桂荣均是各帮口的“龙头老大”。项英经过协调与游说，将他们全部吸收入俱乐部筹备处，还化解了各帮口头头之间的矛盾。

包惠僧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说：

项德隆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丢掉了自己的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们认为这样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他能说会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及关系搞得很好。

项德隆在名义上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

1922 年 4 月，包惠僧介绍项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入党仅三个月的项英，就成了中共“二大”12 名代表之一，但项英真正成为闻名全国的工运领袖，是他协助张国焘领导那场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的缘起是京汉铁路 16 个工会组织要求联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那是 1923 年的 2 月 1 日，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会的代表如期赶到郑州市中心的普乐园戏院，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出的军警包围了会场，时为总工会筹委会总干事的项英，在交涉无效后，率先冲进会场，表现出极强的大无畏精神，在现场的包惠僧事隔三年后撰文回忆说：

江岸工会总干事项德隆同志，领率数千工人，冲过了吴佩孚大军的警戒线，从枪林刀山之中走过

去，启了会场的封条，工友群众及各处工人代表鱼贯而入者达五六千人……

总工会在敌人刺刀下成立，选举武汉工联主席杨德甫为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

随后，总工会举行全路工人大罢工，号召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顿时1200公里的铁路线陷入瘫痪。斗争重心转移到武汉后，项英作为首席工人代表，率三名工人与湖北当局进行谈判，立场十分坚定，2月7日下午的大屠杀中，项英迅速脱离现场，躲开了敌人的捕杀。

在中共三大上，项英与王荷波、朱少连作为工人代表进入中共中央九人执委会，项英从此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这一时期，项英在上海、武汉组织工运，到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项英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

1927年元旦，广东国民政府临时首都迁至武汉，市民举行庆祝大会，3日，英租界当局对讲演学生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十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一·三惨案”。

这时，湖北省总工会由向忠发任委员长，副委员长是李立三，刘少奇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就是项英。

5日在总工会四大领袖的策动下，组织30万人为“一·三”惨案死难者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包围租界巡捕房，要求武汉政府收回英租界，经过多次交涉，3月15日，汉口英租界终被收回，紧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领导武汉工运的四大领袖名满全国。

三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严重失败的血雨腥风时刻，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基列布若野别墅召开的，118名代表（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来往路费全由苏

1939年，项英、叶挺与周恩来在云岭

共支付，会议的议程由共产国际书记、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布哈林亲自制定。会议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对中共中央，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进行了大改组，一批被认为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与陈独秀右倾路线有牵连的知识分子干部与领袖被清洗，大量补充了工人出身的“新型血液”。

最后，会议选出14人组成的政治局，正式与候被补委员各7人，在正式委员中，向忠发、苏兆征、项英三位工人代表均以高额票数当选，三人均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更是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另两位常委是周恩来与蔡和森。

项英自莫斯科归国后，分工主管职工运动和妇委的工作，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工运的第一号领袖（苏兆征已病逝）。不久，蔡和森在顺直省委犯“左倾”错误，被向忠发免去常委职务，由李立三继任。

由此，“李立三路线”开始了它的“鼎盛”时期，项英被任命为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省总暴动，并肩负李立三、向忠发寄予厚望的“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的重任，并策划、组织了几次城市暴动，结果无功告终。

在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项英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其工作有变动，决定由他进入中央苏区，即毛泽东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组建苏区中央局。

项英于1930年11月只身一人前往苏区，据项英在1938年6月写的《自传》说：

三中全会后，“中央派我到江西苏区去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苏维埃中央，首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我为主席，并代理党的中央局书记。于是，于1930年11月入苏区，到12月底经福建苏区到江西，与朱、毛会合。这时，正是红军取得冲破第一次‘围剿’，获得大胜利，将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活捉。从此，我放弃了多年来的工会工作和白区秘密斗争，开始学习军事和苏维埃政府工作。

项英在苏区的四年间，主要职务就是代周恩来担任中央苏区局书记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职务，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到职不久，就在对待

六届六中全会与会者：左起，第一排：贾拓夫、高岗、谭政、朱德、张文彬、曾山、黎玉、刘少奇、博古、萧克、项英、谢觉哉；第二排：程子华、关向应、彭德怀、徐特立、成仿吾、潘汉年、徐海东、杨尚昆、萧劲光、罗瑞卿、李维汉、朱理治；第三排：李富春、郭述申、孟庆树、高文华、邓小平、彭真、王明、王稼祥、周恩来、冯文彬、滕代远、李昌；第四排：曹轶欧、柯庆施、康生、罗荣桓、吴玉章、林伯渠、贺龙、张闻天、陈云、刘子久、林彪、张浩、毛泽东

"富田事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分歧。

"富田事变"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要大肆清洗所谓"AB团"分子，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地方、军队负责人。

当时四万人不足的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主持下抓捕4400多个AB团分子。初来乍到的项英，认为是"乱打乱杀"、"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引起的不幸"肃反"事件。

但是王明中央却仍然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毛泽东亦坚持认为用敌我矛盾处理是正确的。并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组成中央代表团，于1931年4月到达中央苏区，参加中央局领导工作。项英坚持做内部矛盾处理，并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孤掌难鸣。接着，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迅速扩大，有的地区的地方干部90%以上被处决，连同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前后杀戮了近10万人。在红军中造成了一片红色恐怖。

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是被作为中革军委代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义来担负全面领导工作的，他被任命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期间，或许是由于环境严酷等原因，项英也"左"了起来，处决了上千名"反革命"。连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季振同、黄仲岳都遭到秘密处决。

到1937年10月，历尽苦难的项英、陈毅等与中央取得联系，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回到中央身边。

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组建成新四军，以北伐名将，时在海外流浪十年的叶挺为军长，项英作为副军长兼政委实际主持全面工作。1938年4月，分散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共10300人、6200余支枪集中在皖南地区。

1938年9月，项英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解决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毛泽东政治领导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项英被选为1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新四军主要活动区域分江北、江南两部分。江北主要是八路军主力黄克诚部、陈毅所部，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则活动于苏南与皖南。

项英和叶挺相处，两人关系极不融洽，主要责任在于项英以党的领导者自居，独断专行，叶挺几次出走，经周恩来说服两人的感情才趋于缓和。

194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收到项英转来的陈毅、粟裕来电，述说了三年多来新四军发展的主要问题，说：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这也是新四军领导人一直努力争取的主张。但目前新四军"弱点是兵力不足、饷不够，皖南、苏南分开则力弱，合则

可以开展局面。苏南地区是解决人、枪、款的良好地区，皖南因处于国共、日本、伪军的战略枢纽地区……因此，陈毅、粟裕建议：目前因新四军力量有限，应先放充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

项英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熟悉南方山区地形和社情，认为新四军坚持皖南是有条件的，目前国共还不至于严重到立刻兵戎相见，威胁到新四军的生死存亡。中共中央一度相当坚决地主张新四军主力转移江北或苏南，使八路军、新四军连成一片，扩大华北根据地，暂时放弃江南几块根据地，以保存新四军主力，所以在复电项英时，中央提出："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1940 年 8 月 16 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在会上作重点发言，说：目前国内总的趋势，东方存在中日妥协的可能……我们党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现在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是拖的局面。周主张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点步，以便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

12 月 1 日，中央书记处则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提出 12 项谈判条件，其中第一项就是"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第三条则是"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唯有渡河南下"，态度十分坚决。

12 月 22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说：蒋现在对外取外柔内刚的做法，我们应针锋相对，也宜外柔内刚，"可不能在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北移"。但为争取中间分子，分化顽方，可将工作布置时间延长两月，仍采取"佳电"办法，说皖南新四军已动，江南军队的北移有种种困难，拟请求延缓移动日期。关于行动方向，周恩来建议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加紧向顾祝同要枪要粮，以便渡江；顽方将政治和军事分开，我们要把政治进攻和军事行动合在一起解决。

12 月 25 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在谈判中，蒋介石态度"非常诚恳"，称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次日，周恩来在向中央报告这次会面时说，蒋介石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

周的估计与毛泽东想法是不谋而合，25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说：国民党目前不过是大吹小打，在全国进行反共有困难。他在这天致电周恩来时，对新四军北撤问题指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以拖为宜，拖到（1941 年）1 月底再说。

中共中央对待新四军军部北移问题总的态度与精神，与项英犹豫、观望的行动方针也是不谋而合，酿成这个大悲剧，项英和中共中央都负有严重的责任。

1941 年 1 月 9 日凌晨，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已英勇奋战三天三夜，此时项英惊慌失措，竟不顾全军指战员安危，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突然"不辞而别"，带几个警卫员独自突围，使得叶挺军长及新四军军委会委员饶漱石等极为震惊，立即报告了中央，说他们"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向不明"。

敌人用五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新四军所处泾县一小块地区，尽管项英等人东奔西突，仍无法脱围，一天之后又转回到军部，与叶挺、饶漱石重新会面，并向中央做了沉痛检讨，听候处分，但此时新四军一切工作已归叶、饶全权指挥，项英已被撤职。

三天之后，七千余新四军指战员的热血洒向皖南的山岗，年仅 43 岁的项英在蜜蜂洞被叛徒枪杀。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本刊启事

为了方便读者，凡延误订阅或在当地邮局订阅不便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 4. 80 元。补购或预订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本刊先仅有 1997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4 元，简装每套 49 元）及少量 1996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2 元，简装每套 49 元）。创刊至 1995 年历年合订本早已告罄，欲补单刊者，请来函说明所缺期号，若有存书当即寄去。以上均免收邮寄费。

另，本刊自 1994 年—1997 年每年出《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 至 4 期均有存书，每册加邮费 9 元。

本社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 2452 或 6403. 1144 转 2004

任弼时来到我们红二、六军团

● 杨秀山

红二军团在湘鄂西曾创建了东西长五百里、南北二百里、人口近三百万的红色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三大苏区之一。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中央代表来湘鄂西有恃无恐地彻底推行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军不断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又在清除"AB 团""改组派"的肃反运动中取消了政治工作，最终导致了湘鄂西苏区的彻底失败。贺龙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面红旗子"。正在这个时刻，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来到黔东同红三军会合。他们也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下，被迫离开湘赣苏区的。

1934 年 10 月 26 日，红二、六军团在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我见到任弼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主席。任弼时中等身材，很瘦，但很精神。唇上蓄有小胡子，戴一副近视眼镜。他首先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发来的贺电，然后报告了当前的形势和两军任务。他给红三军很多鼓励，并号召两军团指战员紧紧团结在一起，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大量地消灭敌人，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也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

红三军此时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弼时奉中央命令，担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成为红二、六军团的领导核心。从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部队的扩大、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都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中革军委曾电令两军团分开行动，并命令六军团去松桃、乾城、凤凰地区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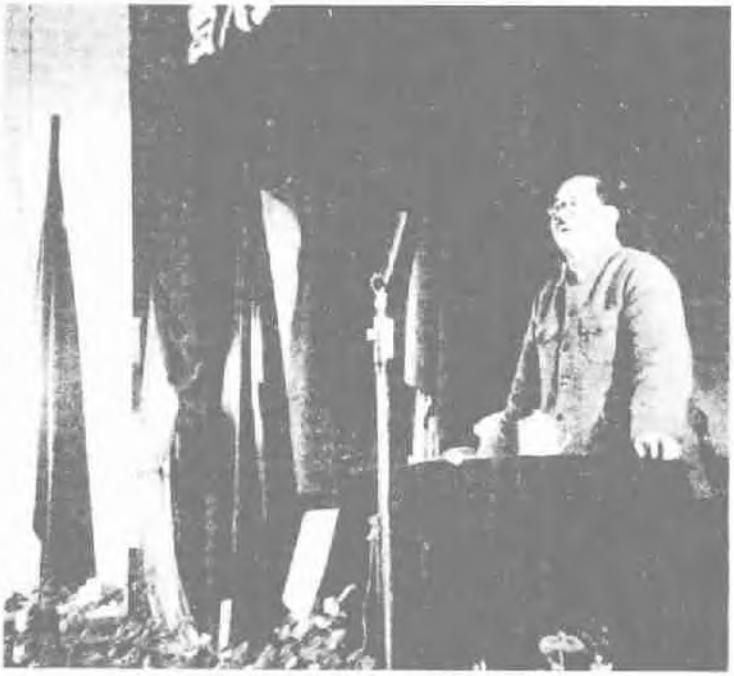
任弼时和两军团首长在南腰界开会，建议六军团不宜去乾城、凤凰地区，两个军团集中去湘西北创建根据地。

这个建议是对湘鄂川黔的地理、社会情况和敌我形势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尽管中革军委 10 月 28 日给任弼时等的电报指示，仍坚持："二、六军团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但任弼时和红二、六军团首长仍向军委表示："暂集中行动，以便开展新 （紧接下页）

的更利于两个军团将来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牵制敌人，支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任弼时和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定向湘西北发起功势，于 1934 年 11 月 7 日占领湘西要地永顺城。

湘西北敌军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指挥四个旅十一个团万余人，分路向永顺进攻，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予以歼灭。



1949 年 4 月，任弼时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上作报告

任弼时和红二、六军团首长进行仔细分析，认为敌人数量比我们多，装备好，有保甲制度作政治基础。我军虽然只有七千七百余人，但指战员作战勇敢，战斗经验丰富，并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同情。因此，决心消灭这股敌人。这是初战，不打则已，一打必胜。打赢了，就脱离困境，开展一个新的局面。所以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打法是：主动撤出永顺城，选择极为有利的地形，相机歼灭敌人。

11 月 13 日，我军按计划撤出永顺城。为了向敌人示弱，有意将永顺城边一座桥梁烧掉。

果然，敌人误认为红军怯战，立即倾巢而出，尾随追击。我军且战且退，为了培养敌人更大的骄气，我后卫部队故意丢弃几支枪和米袋、草鞋等物资，装出慌乱撤退的模样，诱骗敌军上钩。

这时，敌人连续追击均未遇到抵抗骄气上升，误以为红军不堪一击，更是紧追不舍。

最后我军选中了以龙家寨为中心的一块平谷地。该谷地南北长 15 里，东西最宽处 4 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谷地两侧，茂密的树木绵延，便于荫蔽多路出击，是一个难得的伏击战场。

16 日下午 4 时左右，敌人两个旅进入伏击圈，并在此宿营。傍晚，敌旅参谋长龚仁杰带一个连到路右山上搜索，进到六军团埋伏阵地前。该军突然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到河沟里，将敌旅参谋长活捉。与此同时，我军迅速组织出击，仅用两个多小时，即将敌先头两个旅大部歼灭。入夜，我军星夜兼程，猛追百余里，重新占领永顺城。

龙家寨一战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建立并出现新的局面。新建立了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任弼时兼省委书记。

（杨秀山：中将，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后勤学院院长，中顾委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刘　文）

张经武将军之死

● 单 超

1967 年 12 月的一天，张经武突然被一夥军人挟迫上车，送到北京卫戍区二师设在交通干校的一座临时监守所里。一个军官来到他跟前凶狠地说："从今天起，你的代号是 56。你要老实交待以下问题：一、军事政变具体计划，你们打算如何反对毛主席，怎样篡党夺权？二、你参与支持'516'的罪行；三、你们准备首先把哪些政治局委员搞下台？三天之后交卷，否则，专案组决不客气！"说罢，关上房门走了，给他留下一片恐怖和凄怆……

张经武打量小屋，一张单人床，一把木椅，椅子上放着一支铅笔、一叠白纸。门窗紧闭，玻璃上一层报纸隔断了阳光。偶尔走廊上传来轻微的踢踏声，那是哨兵在游动。交卷？交什么卷？我一生干了些什么，毛主席最清楚，很多重要任务是他亲自交办的，是直接向他请示、汇报的；特别是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和毛主席办公厅主任那些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和田家英等同志列席了不少军委会议，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是受到他赞扬的……

张经武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以床当桌给专案组写了一份答卷：

我于 1906 年出生在湖南酃县一个农民家庭，在湖南第三师范结识伍云甫、曾希吾、张际春等有志青年，开始接受新思想。1926 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湖北警备军连长、副营长。1930 年，投奔鄂西贺龙部队。1931 年起在中央苏区做军事工作。1933 年秋，任军委直属第三师师长；1934 年春，任广昌基地司令部司令员；1943 年夏，任军委第三局副局长；9 月，任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12 月，任军委纵队参谋长；1935 年 7 月任军委第二科科长；1936 年 8 月，任华北抗日民族统战工作红军代表；1937 年 6 月，任中央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 年 10 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1942 年 6 月，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司令；1942 年 10 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长；1946 年 2 月，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参谋长；1947 年 8 月，任西北军区参谋长；1949 年 6 月，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49 年 11 月，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1950 年 9 月，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张经武还着力地记叙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历程：

1951 年 5 月，张经武奉命参加和平解放西藏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后，毛主席动员他去亚东劝说达赖返藏，他经香港、印度赶到亚东时，达赖正处于是否去印度的彷徨中。张经武和几位随员在敌特活动猖狂的亚东处之泰然，终于说服达赖下定回拉萨的决心。

张经武任务已完成，毛泽东考虑西藏工作重要，又让他留下来。西藏反动上层密谋武装驱汉，赶走共产党。1952 年 1 月 13 日，司曹（代理摄政王）鲁康娃从日喀则调炮兵团到拉萨，并煽动藏兵和不明真相的喇嘛包围了张经武的驻地，在叛乱分子的刀光剑影中，张经武来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说服他下命令解散伪人民会议，撤了鲁康娃、洛桑扎希的职，使十七条协议得以继续执行。1954 年夏，张经武陪同达赖赴京参加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随后，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他又被任命为主任，主管军事工作……

西藏平叛后，1960 年 10 月，他出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2 年 8 月，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1965 年调回北京，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对他的"罪状"他无从谈起，也不写只字。

三天之内，这封信改改写写，腾清了已是第四天早上，他刚吃下一个窝窝头，门忽然被打开，一个军官走进来："交待写出来了吗？"张经武拿起一叠写满字的纸，摇了几下。那军官看完后勃然大怒："这是什么交待？简直是功劳簿！你是要我们给你评功摆好吗?!"张经武说："我只求你们转给毛主席……"

军官冲着张经武大吼："把他关起来！"两名军人进得房间架着张经武就走，张经武两手一分，推开上来拽他胳膊的军人，怒斥道："你们凭什么逮我关我?! 奉谁的命令？"军官声嘶力竭："给你两天时间再做交待，治不服你我不是人！"说着，朝张经武就是一脚。张经武真想大声抗议，却被人捂住了嘴巴。

不让他声张，是因清理阶级队伍时查明："五一六"是某学校产生的一个造反组织，以打倒包括周总

理在内的众多老革命为目的。可这个组织很快就消失了。张经武因曾表示支持过某院校的一个叫东方红的组织，就被认定为“5.16”的黑后台。

两天是很短的，但此时此地的张经武觉得比两年还长！两天之内，他很少睡觉，也很少吃东西。他一直在思索：逼我交待什么军事政变具体计划，显然把我和贺老总联系在一起，张经武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更加坐卧不安了。

他参加红军，最初就是投奔贺龙部队，曾和贺龙有过工作关系。“文革”一来，凡是贺的部下如许光达大将等高级将领，都因所谓的“二月兵变”给抓起来了，有人顶不住刑讯，乱招乱咬一些人。自己很可能就给“咬”住了。

张经武于极端烦躁不安之中继续给毛主席写信，只有向他老人家解释才能得到开脱。每隔几天，专案组提审他一次，他每次都要求专案组给他转信。一段时间后，不知为什么专案组很少提审他了。他的性情却变得暴躁起来，发疯般地踢打门窗，摔椅子，砸木门。专案组把木椅收走，也再不给纸笔。他绝望了，头往墙上撞，弄得血流满面。卫兵叫来专案组人员，升高了电灯，并用铁丝罩包上灯泡，把暖气片也包了起来，搜走他身上所有金属用品。

张经武脑袋撞墙后，伤很重，专案组派一名军医给他治疗。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的军医被严格命令：只能治疗，不准说话。在苦难中又度过了一年，一天，张经武又被带进了审讯室。专案组那个军官大模大样问他：“56号，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政变计划我们已经掌握，你何苦顽固不化。凭你过去的功劳，坦白会有好处的。”

“既然你们都知道，还问我干什么，枪毙得了！”

那军官暴怒：“给你留条生路！”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生路吧。”张经武冷冷一笑，“你们的末日快到了！”

那军官气极败坏地抬手朝着张经武打去，张经武一招架，他哎哟一声，忙从身后墙边抓起一根木棍抡向张经武，张经武用右臂挡棍，“咯喳”一声，木棍断了，张经武的手臂也断了。那军官见状，连忙命人把张经武架回牢房。

张经武被面朝下扔在床上，醒来后觉得撕心般地疼痛，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用脚踢得床板“咚咚”响，希望医生快些来。医生来了，张经武被送到积水潭医院。医生看到姓名栏里“56”的字样，问押送的军官，病人是否有姓？那位军官只好添个张字，变成“张56”。医生给伤臂上了夹板，嘱咐一周后复查和注意事项。然后，张经武又押解回到他那间小牢房。

回到小黑屋，张经武思绪很乱，倍加思念亲人。妻子儿女现在何方，是否平安？

他哪里知道，妻子杨岗于1968年12月26日被统战部造反派抓走，一个审讯她的女头头提审时劈脸就是三巴掌，一个月后转押秦城监狱。时令正是严冬季节，审讯得不到口供，就用凉水浇透杨岗全身，半夜，让杨空身穿湿棉衣，押到牢房外空旷场地上转圈，有时营造假枪毙的恐怖氛围。杨岗的伙食很差，还吃不饱。晚上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白天常常被抓着头发去审讯。等她在秦城被关押七年放出来时，丈夫已去世三年多。长期的折磨致使杨岗精神分裂，至今一直未愈。

张经武在对毛泽东的一线希望中日夜煎熬，他却因对抗，无数次挨打受凌辱。胳臂虽然好了，肋骨却被踢断几根。他的身体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医生为他输液，他虽不再反对，血管因枯萎已扎不进针头，维持生命的葡萄糖水无法注入。1971年10月21日，他吐了最后一口气，经历了1000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永远地去了。他嘴唇半张、眼睛半闭，似乎在盼望毛泽东对他的理解……

张经武究竟怎么死的，院长、医生都说不清。他女儿张华岗接到的通知是：“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971年10月27日去世。”

在杨岗和子女的呼吁下，1979年8月27日，党中央为张经武、徐冰、吴溉之、伍云甫、邹大鹏等五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会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胡耀邦为五人致悼词。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一九六〇年，张经武将军与藏胞一起亲切谈话

常荫槐

常荫槐之子谈常荫槐

● 晓　觉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纽约结识了常林彝先生。常老是民国风云人物常荫槐的四子。

常荫槐的名字连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近些年国内影视中出镜的常荫槐贬多于褒。历史上的常荫槐却是位有功之臣。常荫槐做过张作霖的军警执法处处长，南京政府的黑龙省省长，最突出的政绩是任京奉铁路局长与中央军政府交通部长期间，兴办了东北铁路。当时东北全境铁路均把持在日本"满铁"手里。常荫槐主张自建铁路，用以抵制日本的经济掠夺与军事侵略，他积极筹备资金，先修建了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继而完成了大通铁路与四洮(四平——洮南)铁路在通辽站的接轨工程，这条由中国自己建造的，与南满铁路平行的路线出现在东北大平原上，使北满货物可以不经过日本人把持的"满铁"便能直下京奉线……

常荫槐共有六子：溥彝、俊彝、桐彝、林彝、伍彝、琴彝。感恩节那天笔者登门拜访了常林彝先生。

常林彝年近八旬，精神矍铄，语调朗朗。常夫人欧阳筱苏，是中国80年代电视上镜率最高的《少儿英语讲座》的主讲教授。常荫槐遇难后，家属迁住北京。1937年常林彝留学美国，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采矿，抗战胜利后回国，解放后任职冶金设计院，参与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采矿手册》，1989年底移居美国。

欧阳筱苏女士曾任教于辽宁大学，早年留学美国，其父欧阳格为国民党元老，在著名的中山舰事件中，他率先指挥炮舰冲出珠江口，为此获得孙中山褒奖；此后奉命创办中国第一所海军官校，校长为蒋介石，欧阳格任教务长，后因派系斗争被蒋介石处死。

常老告诉我："那是1929年元月12日的清晨，我们兄弟三人忽然被人急促地推醒，催我们赶快逃命，溥彝爬梯上墙，看到后门外黑压压的来了一群人把我们家包围了……这时父亲的好友翟文选把我们接到他家暂避，等到中午回到家，父亲已闭上眼睛安静地躺在床上……在给父亲净身擦洗伤口时，我才发现父亲身上有七处枪伤！那致命的一枪是由脑后射入，由头顶盖穿出……那年我才九岁，这一记忆是深刻的。

父亲出生于1889年，祖籍山东寿光，家境贫寒被迫逃荒关东。

父亲遇难时年仅41岁，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的母亲，长辈、父亲的同僚、友人，及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才向我们弟兄详尽地讲述了父亲……

"……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年轻貌美，最为大帅所宠爱，其母王氏飞扬跋扈，王母家中的厨子也横行人群。一日，王家厨子登上京奉路客车，不但无票，还要强踞头等包厢，时逢常荫槐搭乘此车出差，车站人工作人员向常报告此事，常荫槐亲去查问，该厨子自以为有寿夫人做后台，拒不补票，常荫槐好言相劝，厨子仍是傲然，常荫槐下令执法人员将厨子推下车去，厨子在站台上破口大骂，常荫槐遂令执法队将他按倒朝屁股上猛打数十棍，厨子回到沈阳向寿夫人诉苦，寿夫人当即报告张作霖，张作霖听罢便哈哈大笑，说'常荫槐这小子真他妈有种！我正要这黑老包！'常荫槐因祸得福屡屡升迁，竟擢升到北京军政府的交通部长。1928年5月，日本代表逼迫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路'承造合同'，张作霖被逼无奈，表示可以签字，常荫槐坚持拒绝，张作霖无奈，只好让赵镇以司长代理常的交通部长与日本签订了四条铁路的承造合同'……

"张作霖死了，张学良继位，作为张大帅的老臣，常荫槐扶持张学良依然如故。大有遗孤托孤的味道。因此也平添了几分傲慢。张学良这年已有27岁，在常看来还是一个毛孩子，张学良乳名叫'小六子'，尊称'六爷'。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人们一般不敢这么叫了，但常荫槐还改不了口。1928年，奉军撤出北京时，常荫槐把京奉路上

所有的机车、客餐货车都拖到了关外，时任京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要求张学良放回车辆，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常荫槐拒不执行；张学良想查铁路的账目，也被常荫槐拒绝，特别是常荫槐写信给蒋介石，报告了张学良的劣迹，说'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日只知打毒针，跳舞，不务正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我即可。'杨督办即杨宇霆。这封信被带信的吕荣寰打开看后，直接转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深记在心，便自然想起郭松龄的反叛。日本人已早知张和常的矛盾，又参与其中推波逐澜。当时常荫槐任黑龙江省省长，为边防安全，扩建山林警备队，需购置2万件武器，负责兵工督办的杨宇霆下令兵工厂加班加点……日本特务便从中大作文章，炮制了一份又一份假情报，送至张学良的手里，在这些假情报里，常荫槐与杨宇霆被说成图谋不轨，意在篡权，以至编造出皇姑屯炸车案'乃是杨宇霆、常荫槐密谋推翻张作霖之所为'。这使张学良的戒心愈加深重。

"1929年1月11日下午，常荫槐与杨宇霆同到帅府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处，常荫槐出任督办。两人没有给张学良更多的思考时间，自以为这是个举手之劳的事，而张学良觉得他们是来"逼宫"了，强作镇静，并留两人与他一道用餐。饭毕，常荫槐与杨宇霆来到帅府老虎厅会议室等待与张学良继续议事，刚坐定，警务处长高纪毅、侍卫副官谭海便率六名卫士夺门而入，当即将常荫槐与杨宇霆击杀于座席上……"

笔者在曾任张学良秘书处长刘鸣九的回忆文章里，见到他引用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谈处决杨、常的前因：这样做是逼出来的，张学良曾千方百计与杨、常搞好关系，但是收效甚微，张学良从前方回家时，小两口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杨督办公馆去联络感情，以至张学良让于凤至与杨宇霆的三姨太结拜干姐妹，为此还亲自动手给于凤至写了兰谱，但是杨宇霆不同意，他说行辈不对，这不是自居前辈，把张学良夫妇当作小孩子吗？结果只收了一部分礼物，将兰谱和大部分礼物退了回来，于凤至的结论是："看看，杨公馆的门槛有多么高哇！"处决杨、常的罪名，见之于"杨、常伏法之判决书"，其中甚至有"与共产党党魁×××等勾结，预定本年三月间中央开代表大会，南北同时发动(政变)"一条，更是望风扑影。张学良杀完杨、常后，心里是不安的，他做了三件事，一不追究余党，二不株连九族，三各拨一万元给杨、常二家做丧事用。张学良又在常荫槐的挽联上表达了自己的心痕：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张学良在挽联中用"悲蔡叔"、"罪淮阴"(韩信)两个典故，表明常荫槐被杀是他误听流言所致，同时也表明他处死常荫槐是为了大帅一手缔造的东北这块江山。

常老从书架上抽出《周恩来选集》打开来塞到我的手里："您看，周恩来是怎么说的——"

第31页上记述："奉张内部有新旧之争，新派自杨、常死后势力大衰，张学良对于旧派已不能如意支配，旧派则忠顺于日本帝国主义。"

"您看，周恩来没说，新派杨、常忠于日本帝国主义吧！您再看，第378页，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对'杨、常死后'加的注释——"

"他们(杨、常)是张作霖的重要部属。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29年1月11日枪杀了杨、常。"

常老语重心的说："这事，历史已有定论，又有中共领袖人物的评论，以至事件的发动者也有发言——三者完全一致。说句心里话，张学良与常家有杀父之仇，冲着这个人，我们不会谅解他，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爱国者的后代，面对历史，我们对这位皈依基督的老人，可以说上一句，主，理解你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常林彝、欧阳筱苏夫妇和他们的孙辈们

四千日本战友在四野

● 唐义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各分兵一部进军东北，先后解放了南满、东满、西满、北满部分地区，同时也接管了日本侨民、日伪机构和日本战俘。对于东北的日本人，除必须审查的战犯、战俘外，其余人员按规定要分批分期遣送回国。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成立了遣送日本人办事处，李立三任处长，着手遣返日本人的工作。1946年4至5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后，数以千计的伤员急需收治，加之当时西满鼠疫蔓延，急需大批医务技术人员。

于是，在当时拟遣送的日籍医务人员中，有一些或出于对医治伤病的职业责任感，或出于个人生活前途的考虑，便留了下来。加上水电、机械、财会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先后约有四千人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为此东总政治部及时发出了正确对待日籍人员的指示：日本侨民不同于日本战俘，日本医务人员不同于日军军官，日本职工不同于日本战犯，政治上要一视同仁，业务上要尊重知识、尊重技术，生活上待遇同等。随着这些指示的传达和贯彻，日籍战友在和中国同志共同工作、学习、生活中得到了实际感受。日籍医生渡边因病在北安逝世，部队为他举行追悼会；日籍司机新里和日籍会计松江结婚，部队领导为他们安排了新房，并向他们祝贺。

为了做好日籍人员的工作，民主联军领导还决定，在日籍人员比较集中的医疗系统设立民族科，各后方医院设立民族干事；民族干事由日本人中的积极分子担任。他们组织日籍人员学汉语，编印日文小报，教唱歌曲，开展文娱活动，为在日籍人员中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日籍人员，和中国战友一起，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中南六省作战，他们随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留下了许多动人事迹。

军医随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斗中，由于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不少伤员生命垂危，急需输血。随野见此情景，焦急地喊着："抽我的血，我是O型。"辽沈决战不到两个月，随野为这个战役的伤员先后献出1040毫升鲜血。医院领导为了照顾随野，特意买老母鸡给随野补养身体，但他把熬好的鸡汤又分给了伤员。伤员为此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说："日本人中不止有侵略我们的鬼子兵，也有用心血帮助我们翻身求解放的真诚朋友。"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中，七纵队第三所主治医师山田守，为了抢救伤员，经常用大剂量小苏打粉，控制自己的胃疼，昼夜奋战在手术台上。经过他精心治疗，挽救了不少重伤员的生命，使许多伤员免去残废。山田守这种认真负责精神，为群众所拥戴，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立一次大功，三次小功。

1946年3月在通化宣告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就有日本籍航空技术人员的无私奉献。曾任日本空军大队长的林弥一郎带领留用的日籍人员协助中国同志积极搜集日本遗弃东北的飞机器材、油料，赶修飞机，为建立东北航空学校作准备。经过努力，共搜集各型飞机百余架，其中三四十架经过修理尚可使用。航校成立后，林弥一郎任该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建国之初，长谷川正来到北京

曾在四野工作的医生山田守

曾在四野任事务长的元木和男

航校，担任培养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的主任教官。女飞行员们至今对他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记忆犹新。

参加第四野战军的约四千名日本战友，究竟有多少人立功受奖，已无据可考，但据四野后勤卫生部部长孙仪之回忆：“从东北到南下的几年解放战争中，日本籍医护人员先后立功受奖的约占日本战友总数的80%。”四野第十三兵团卫生部，1950年3月在广西南宁庆功大会，表彰自南下以来的功臣模范。其中日本战友为313名。在重点宣扬的三位功臣中有两人是日本战友，即老医生今川博士和模范护士中岛。

第四野战军在颁发胜利纪念章时，也给部队中所有日籍人员发了东北解放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和中南解放纪念章，参加渡海作战的，还颁发了解放海南岛纪念章，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根据有关国际关系规定，决定在华的日籍人员，分期分批返回日本。这年的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是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很多。”对于即将返回日本的战友，党、政府和军队都十分关怀，给每人发放了物资和旅途费、生活安家费等，帮助解决他们的各种实际困难。临分手时，部队热烈欢送，临别依依，感慨万千，护士们屋敏夫饱含热泪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了八年人生旅程，这是我唯一值得自豪的，也是我青春年华最美好、最难忘的时期。”许多日本战友高高地举起双手，不断地高呼：再见吧，中国战友！

回到日本以后，几乎每一个日本战友都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他们不得不进行求生存的斗争。日本的企事业单位，由于政治上的偏见，都不愿接受来自中国的归国者，认为他们被雇用后，会宣传共产主义，组织社团，举行罢工。有的为了谋得一分职务，不得不隐瞒自己归国者身分，但一经对方发觉，立即解雇。直至1972年，中国两国开始了帮交正常化，两国政府、两国人民频繁交往后，他们的情况才好转起来。

四野的日籍人员回到日本的后，都非常怀念中国，希望日中不再战，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曾在四野某军工作过的日本战友组成了“回想四野会”；曾在原第二十九后方医院工作过的日籍医务人员组成了“长白会”；曾在第七后方医院工作过的组成了“洛阳战友会”；曾参与人民解放军航校建设的日本航空人员组成了“航空校友会'；曾在九江第一七一医院工作过的组成了“九江战友会”等等。这些社团每年聚会一次，他们戴上解放东北、解放华北、解放中南的纪念章，一起忆往事，谈中国，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然后包饺子，扭东北大秧歌，情景十分感人。

日本文部省提出要在教科书中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这些言论和举动，激起了原四野日本籍老兵的极大愤慨。他们拍案而起，秉笔直书，严厉谴责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侵华历史的罪恶行为。

日本战友离开中国已有几十年，现在大多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离开中国愈久，“回娘家”、“看亲人”的念头愈浓。1986年，原四野第二十九后方医院的53名日本战友组团访华，他们个个胸前都佩带着当年颁发的各种纪念章，手里还拿着战争年代用过的搪瓷缸子，一下飞机见到来迎接的老战友，久别重逢，兴奋的握手、拥抱，歌声、笑声、欢呼声融成一片。1992年，正当樱花盛开时节，原在四野某军工作过的15名日本战友，从东瀛飞到了古都西安，他们受到原四野那支老部队官兵的夹道欢迎，见到部队整结的营房，精良的装备，严整的军容，过硬的技术，个个兴奋不已。

返回日本的战友，许多人成了日中友协的骨干或积极分子。原四野第二十九后方医院事务长元木和男，现为德岛中日友协理事，以他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撰写出版了《漫行中国》一书。他还从事援助中国留学生活动，帮助中国留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原在四野某后方医院工作的日本战友熊野晃，积极开展为中国学校免费送书活动，已送31万册，受到了中国学校有关人士的赞扬。在中国曾任医院外科主任医师的安达仁次郎，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治愈一千多名伤员。他回国后一直为日中友好奔走呼号，1981年安达仁病危临终前，把全家人叫到面前，要求把中国解放战争中发给他的纪念章全戴在胸前，然后嘱咐说“要继续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　常　青）

曾在四野任会计的中村义光

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俞平伯

● 舒 云

在曹雪芹辞世200年后的公元20世纪50年代，一部研究《红楼梦》的书，竟成了引发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大批判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两个大学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震动了学术界。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引发了批判胡适。

毛泽东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多年的研究成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人们却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小书，却与文怀沙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北平和平解放，文怀沙回到北平，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工作，同时又在许多学校兼课，继续教书生涯。有一天，俞平伯来找他，很有点为难地开口借钱。俞的父亲去世，作为儿子应该让老人早入土为安，可口袋里却空空如也，心急如焚的俞平伯想到了文怀沙。要说文怀沙和俞平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一辈。俞平伯的父亲俞阶青是前清的探花，清朝大学问家俞樾的后代。俞樾有个学生，就是替中华民国命名的章太炎。章太炎有很多学生，包括鲁迅。多年以前，文怀沙在苏州时听过章太炎的课，就因为这层关系，年长的俞平伯和他相识相交又很尊敬他。这次俞平伯走投无路找上门，是因为他知道，那时留用的教授每月最少也有一百多元工资，文怀沙是政府干部，再加上兼课，从他那里借点钱度过燃眉之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文怀沙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是供给制，一月只有几块钱做零花用。俞平伯想了想说，你没有钱，你不是认识上海棠棣书店的老板吗？你从王耳那里借点钱可以吧。说到王耳，文怀沙笑了，俞平伯不知道文怀沙就是王耳。上海棠棣书店是鲁迅的关系，解放前文怀沙曾化名王耳，在这家私人书店当编辑，解放初政府干部在私营书店兼职是违反纪律的，因为文怀沙生活困难，也就让他继续搞“地下工作”。为什么化名王耳，文怀沙说，用假名对有些不能用的稿子就有个缓冲余地，不容易得罪人。他不好向俞平伯细说这段历史，只是答应可以帮助他从上海棠棣书店借一笔钱。很快文怀沙给俞平伯弄来了200万元，那是旧币，相当于改币后的人民币200块钱。俞平伯这才把丧事顺利办下来。借的钱怎么还？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文怀沙找俞平伯，俞平伯没有钱。文怀沙说，把你的稿子拿出来，不就有了钱了吗？文怀沙正以王耳的名义在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丛刊》，试用新观点来整理中国古典文学。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有些年头了，有点名气，只要他拿个书稿来就可以预支200元稿费。俞平伯说，哎呀，我刚写的那些《红楼梦》研究文章加起来也不到两万字，怎么印书？文怀沙说，你以前不是出过一本《红楼梦辨》的书吗？拿出来加一起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同意了。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23年出版时，只印了500本，如今早已踪迹全无，俞平伯手中仅剩下一本，纸都发黄了。这本书是俞平伯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平伯陆续整理出来，共3卷70篇，1923年4月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因为种种原因，近30年这书未再版。为了还债，俞平伯把旧书三卷拆开，用

红钢笔在书页上修修补补，有的删除，有的增改，并为上中两卷，其下卷大都是零碎的旧作，3卷共得16篇，13万多字。送到棠棣书店，老板一看，乱七八糟，对文怀沙说，你要负责啊，这样的书在当年都卖不动，现在再印，能有销路吗？在文怀沙的坚持下，《红楼梦辨》改名《红楼梦研究》，以一种新的姿态问世了。1952年9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书名由文怀沙用毛笔楷书。俞平伯特地要文怀沙写序，文怀沙说我写个跋吧。于是，俞平伯自己写了个序，他在序中说，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鼓励，近年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没想到销路很好，一版就印了3000本。批判以后禁版，更成了奇书。随后，俞平伯又写了《红楼梦简论》一文。

棠棣出版社的书印出来，俞平伯颇受广大读者注意。不仅经济上有了丰厚的收入，政治上也走了运。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说你们怎么搞的？俞平伯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嘛。意思是你们怎么对俞平伯不重视，这样，把俞平伯补选为人大代表。

红学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红楼梦新证》。此前他在燕京大学孙楷第的门下读研究生，孙楷第是文怀沙的朋友，周汝昌就请文怀沙帮助他。于是，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出版。周汝昌的书里大段引用胡适的话，周汝昌两耳不闻窗外事，光埋头做学问，不管政治行情，文怀沙以中国古典文学丛刊主编王耳的名义，做了大量的删改工作，尽量避免书中提到胡适，不得不提到时，删去胡适先生如何如何，写成妄人胡适。以后文怀沙说对不起周汝昌，但在那个时期不打这个马虎眼过不了出版关。

山东大学两个大学生李希凡和蓝翎看到了周汝昌的书和王耳序，写文章批判俞平伯，把《红楼梦新证》的观点作靶子，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有些观点和王耳的序以及文怀沙跋不谋而合。两个大学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写出后，在北京的《文艺报》碰了壁，只好写信给山东大学的教师，在学校的《文史哲》刊物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其主要观点是，批判俞平伯把暴露封建制度罪恶的伟大古典现实主义作品，贬低为“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怨而不怒”，从而否定了作品的伟大社会意义和杰出的艺术价值。结论是俞平伯采取的研究方法未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烦琐的考证和探索方法将人们引向不可知论，他的思想根源是重复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所表现过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滥调。山东大学校刊寄给山东籍的中央首长，人手一份。康生和江青都看到了，江青把这篇到处发不出来的文章向毛泽东汇报。要《人民日报》转载，又被拒绝，后在《文艺报》上登了出来。毛泽东说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作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全国各地都动了起来，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领导和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最古典文学名著，而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以及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文怀沙的《红楼梦研究》跋也被毛泽东点了名，说文怀沙党性哪里去了？文怀沙有党性，什么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幸好《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头到尾都没有揪出文怀沙，只是让文怀沙写检讨，所有的罪名都堆到俞平伯身上。俞平伯吓坏了，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文怀沙看俞平伯“全军覆没”，认为俞平伯揭露出来《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别人写的，在《红楼梦》的辨伪存真方面还是做出了贡献，就好心拉了他一把，除了自己写检讨，还替俞平伯写检讨。到了“文革”，文怀沙终于成了俞平伯向党进攻的同伙，他被抄家，作为漏网右派和漏网胡风分子被关起来，与世隔绝十年。前些年，端木蕻良还对文怀沙说，“文革”关十年太便宜了你，应该先枪毙，后充军。俩人哈哈大笑，他们终于看到了《红楼梦》研究进入了正常的学术轨道。

（责任编辑　刘　文）

肖华为曾思玉作媒

● 刘永路

上将肖华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曾思玉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思玉随八路军挺进山东，出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转眼到了 1940 年，肖华调来当了鲁西军区政委，肖华是个乐观、开朗、热情的人，见曾思玉年届三十尚未婚配，便想当一把月老："喂，老曾，有目标了吗？"

曾思玉嘀嘀一笑："莫急嘛，抗战胜利了再找也不迟呀！"

肖华有些气恼："老表啊，对象就在你身边，都不知道去找！"

曾思玉一脸迷惑。

肖华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又一本正经地问："老曾，你对鲁西'一枝花'印象如何？"

肖华说的"一枝花"，指的是中共鲁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兼鲁西妇救会副会长洪林。当时，这位年方十九、识文断字、风华正茂的女性，自然众人瞩目，可是，她却是枝"刺玫瑰"，洪林曾正颜厉色地向追求者们宣布："你们谁也甭想打我的歪主意，本人是独身主义者！"

曾思玉听说肖华要给他介绍洪林，吓得连连摆手："不成不成，你可千万不要去惹乎她！"

见曾思玉一副紧张的样子，肖华不禁朗声大笑："你就瞧我的好了，这事我准给你办成！"

秋天，杨勇司令员和肖华政委赴山东分局汇报工作，正巧与出席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一百多名鲁西地方干部同路而行，洪林也在其中。

洪林骑着一匹她打仗时缴获的战马，与肖华并行。一路上，肖华多次谈起曾思玉，开始，转弯抹角，闪烁其辞，后来，干脆问起洪林对老曾的印象如何？

洪林越听越不对劲，终于明白肖政委在保媒拉纤呢！她冷下脸来："肖政委，您知道我是不嫁人的，退一万步说，就是嫁人我也不嫁给当兵的！"

"这是为什么呢？"

"当兵的野蛮，对女人粗鲁！"洪林直言不讳。原来，洪林的外祖父是老军务出身，官至团长，年轻时没能善待妻子，年老时他常常为此而内疚。他疼爱外孙女，怕她遭受她外祖母同样的命运，所以，从小就给她灌输一个思想：嫁人不嫁当兵的。

肖华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

子弟兵，一点都不野蛮。”肖华又谈起曾思玉，“这个同志有文化，是做政治工作的，性格纯朴敦厚，和你们地方干部没啥两样。”

洪林笑了，她和曾思玉有过接触，留下点印象：“他好像是江西人，口音怪怪的，说话我听不懂。”洪林找到了一条推辞的理由，“肖政委，你总不能让我和一个语言不通的人生活在一起吧！”

“语言不通是因为接触少嘛。”肖华说，“江西人和山东人谁没有口音哪？接触常了，就听习惯了嘛！”

肖华和洪林同行了半个多月，洪林架不住肖华反复做工作，心终于活了，临分手时，洪林答应“可以考虑考虑。”

“好，我等着你的回话。”肖华走了，一回去就向曾思玉报喜。

可是，等了两个多月，没见洪林回音。

一天，鲁西军区和鲁西区委召开军地干部联席会议，肖华有意安排曾思玉挨着洪林坐。洪林使用的是一支自制的简易钢笔，写着写着就没水了。肖华给曾思玉丢了个眼色，曾思玉会意，他忙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派克钢笔，递给洪林，“这是我打仗缴获的，你拿去用吧！”曾思玉这支笔送得非常适时，洪林不好不接，可接下后，心里又有些后悔。

散会了，曾思玉满心欢喜，正想和洪林说几句热乎话，不料，洪林把笔还到他的手上，不亢不卑地说了声“谢谢”，扭身走了。

曾思玉拿着笔怔在那里，肖华走过去，拍拍他的肩道：“老曾啊，不要恢心，咱们再想一招。”肖华灵机一动，“哎，你不是会刻字吗？何不把她的名字刻在笔上，看她要不要！”

“赠洪林同志”五个宋体字被曾思玉工工整整地刻在派克笔上，可是，笔怎么个送法，万一人家不肯收下，岂不难堪？还是肖华有办法：“给段君毅，请他代转。”

段君毅是鲁西区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是洪林的老领导。段君毅出面做工作，洪林很痛快地把笔收下了。笔虽然收下了，可对曾思玉这个人呢，洪林说，“还是考虑考虑。”

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段君毅说话了：“洪林啊，你和曾思玉同志的事，我看考虑得可以了吧！”

这一回，她顺从了，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喃喃地说：“老领导，我听你的。”

“好啊！”段君毅高兴地一拍大腿，“我看事不宜迟，喜事儿咱们今晚就办！”

这一天是1940年12月31日，晚上，在鲁西行署救亡室里，由证婚人段君毅掏钱，买来两斤花生米，为曾思玉和洪林举行了一个非常简朴的婚礼。令人遗憾的是，大媒人肖华正在南边作战，没能出席这个他一直盼望的婚礼。

第二天，是1941年元旦，天一放亮，曾思玉就告别新娘率部南下。当晚，鲁西行署举行元旦会餐，段君毅才当众宣布，洪林已与曾思玉结婚，并提议：“大家为新娘新郎的新婚之喜，干杯！”

曾思玉少时读过几年孔孟之书，战争岁月一直未中断写日记，几十年来，已经积累了六大箱子。洪林曾经当过山东省档案馆副馆长，她凭着丰厚的经验，把各种资料进行编纂整理，提供给丈夫。曾思玉夫妇退休到大连后，每日笔耕不辍，十几年来，已写了九十多万字的回忆文章，并出版了《八年抗战》和《烽火岁月》两本书，现在正写他就任葛州坝第一任指挥长的经历，介绍了毛主席关心葛州坝工程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责任编辑　仲　文）

曾思玉、洪林夫妇近照

名将之后陈方安生

● 吴跃农

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祖籍安徽寿县瓦阜镇，1940年出生于上海，第二年，她在襁袍中就去了香港。

她到香港，是因为祖父方振武的关系。方振武早年是北伐军营长，曾随黄兴到日本，回国后又紧随孙中山先生麾下，进军江、浙、皖，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1924年任张宗昌部师长，1926年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五军军长，1929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33年，与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抗击日军侵略，收复多处失地，深得众望。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桂林参加抗战工作，因为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合拍。遭到蒋介石的忌恨，1941年，被迫举家迁往香港。到香港后，方振武依然为抗日奔波不息，组织了海外“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方振武准备回大陆抗战，遭蒋介石特务暗杀，不幸遇难。

陈方安生处自小就与祖父祖母生活，有着极严格的家教，“去饮食，教诲之”，只要学习成绩不理想，就不给饭吃，陈方安生在这样的教诲之下，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且聪颖多艺，8岁学钢琴，悟性极高，12岁时，获香港音乐大赛初级组冠军，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品学兼优，一直是奖学金获得者。

陈方安生1962年于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就开始了从政生涯，迄今已有36年历史，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工作她都经历过，有着扎实丰厚的从政经验。

1962年，港英政府辅政局招聘女政务官，她前往应试，考中香港政务官，先后在布政司署、渔农处任助理秘书、行政助理，成为香港首位女政务官。1979年，任社会福利署副署长，成为全港最高薪女性公务员；1987年，任职经济司，负责管理香港财政经济工作，成为首位女司级官员；1993年11月，升任布政司，成为此职的首任华人，也是首任女布政司，负责香港18万公务员和香港政府行政事务，1994年7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陈方安生为香港署理总督，代理总督离港时期的一切职权。在香港18万公务员中，陈方安生享有很高威信。

1996年年底，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水落石出。当选后的董建华，从繁忙的各类活动中抽出身来，专门约请陈方安生到他的别墅会谈，这引起了香港舆论界的高度兴趣。那天，董建华早早就等在了他的位于深水湾香岛道的别墅“香岛小筑”，当陈方安生从她的官邸驱车抵达之时，董建华已在门口迎接。随后，两人即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早餐会议”。两人的会谈是“全封闭”性质的，没有第三者旁听，因为事涉香港回归后高层公务员去留的敏感性话题，当两个小时后，他俩笑容满面的并肩走出来，董建华对记者说，刚才的会谈中，陈方安生已经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将继续留任九七后的特区政府，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繁荣稳定作出共同的努力。”

陈方安生表示，她与董建华是老朋友了，特别重要的是两人对香港前途有共同的目标，因此，董建华邀请她留任香港特区政府，将肯定能够合作愉快。

这次会谈，两人除了对公务员问题达成共识外，还探讨了香港的民生问题。

现在的港府机构由布政司署和各政府部门组成，陈方安生为布政司，负责领导政府行政部门的日常政务，是仅次于行政长官的香港“二把手”。

陈方安生心中有着清晰的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图景，她在一次演讲中是这样描绘的：“我们将会实现‘一国两制’，过渡期的忧郁和不明朗将会成为过去；我们会继续拥有一支最优秀的公务员队伍，而政府的管治也继续会以行政为主导，会继续对香港独有的生活方式作出重大贡献”。

按照香港的习俗，姑娘出嫁后就在本姓前加上夫家的姓。陈方安生的丈夫叫陈棣荣，也是陈方安生的高一届校友、学长。陈方安生入学那年，两人在学校排练莎士比亚话剧中相遇，开始了感情之旅，陈棣荣现任香港加德石油公司的行政董事，同时还担任香港辅警指挥官，三十多年来，陈方安生一路擢升，成为香港 18 万公务员之首，陈棣荣默默撑持着。他们有一双儿女，现都已成家。

陈方安生的母亲方召麟，是国画造诣颇深的画家，与何香凝、张大千等著名画家都有交往。尽管她在六十年代就定居英国，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从未淡薄，多次回国观光，1980 年她回国游长江三峡，曾到南京会见刘海粟、程十发等；1981 年，中国文化部、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她在北京美术馆举办了书画展，1984 年，为庆祝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她专门创作了《和平颂》；陈方安生没有到过上海，听母讲上海的变化，她很兴奋，并表示，等香港回归后，她一定要先去上海，沪港两地要多交流现代化建设经验；陈方安生的叔父方心让，是香港享有盛名的骨科专家，还曾同时在香港立法局、行政局任议员，任其达 16 年这久，是国际康复会的创始人之一，1984 年担任该会会长，曾回国访问，他除了以组织名义捐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自己还捐资建立了山东养马岛康复中心，为了迎接香港回归，1987 年，他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合资兴建了三十层的港澳中心大厦，1993 年。他又捐资家乡建立“振武人才培训中心”。

尽管陈方安生自小在香港长大，但她对自己的“根”——祖籍地安徽寿县瓦阜镇还是印刻心中的。1993 年秋，她与方家亲戚 18 人前往安徽寿县瓦阜镇，参加安徽省政府建立的方振武将军陵墓的揭幕仪式，她在祖父的墓前献上鲜花，深深三鞠躬，她仔细阅读花岗岩纪念碑文，参观了祖父的故居和事迹陈列介绍，陈方安生深为祖父的爱国情操感动，她说：“祖父热爱祖国，意志十分坚定，自己要学习祖父的爱国和亲民。”1995 年 8 月，安徽省政府出资拍摄的六集电视剧《方振武传奇》，首映式在安徽省政协礼堂举行，陈方安生一行 14 人包机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首映式，陈方安生看到，当年祖居“旺”园经政府收回已修葺一新，她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好靓”。乡亲为她放起鞭炮，欢迎家乡的后代，陈方安生激动地说：“祖父的为人，对我教育很大，爱国爱家，正是我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的地方。”此行，陈方安生向安徽省政府转交了母亲方召麟赠送了山水国画，希望家乡建设日新月异，希望香港“顺风顺水、平稳过渡”。

故乡的云，飘动在陈方安生心头，她表示 1998 年将“回乡祭祖省亲”。

（责任编辑　仲　文）

陈方安生和叔父方心让向方振武将军陵墓献花篮

斯特朗沉痛反“文革”

● 武际良

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1946年夏至1947年春访问了延安，毛泽东向她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她迅速向世界传播了这一名言，因而，得到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胡宗南进攻延安，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块圣地，辗转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刚住下，苏联的克格勃机关就以“间谍和损害苏联利益”的嫌疑，将她逮捕并驱除出境。她回到美国后，多次申请来中国都被美国当局拒绝，直到1958年6月，她才拿到出国护照和签证。这年她已72岁了。当她到达北京，柱着双拐蹒跚地走下飞机时，正好迎来新中国诞生九周年。10月1日，她应邀到天安门观礼，在城楼上会见了她昔日的老朋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从此，她决定定居中国，住进了“和平大院”，那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前去看望她，兴奋地对她说：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年底可达90%。斯特朗担心地问：你们是怎样使农民参加人民公社的？在俄国……结果引起大灾难！陆定一又告诉她，农业合作化已给公社化打下了基础，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她始终怀疑当时中国农业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用公社形式组织起来会有高的效率，对于“放开肚皮吃饭”，更是不敢苟同。

1959年春，西藏上层集团叛乱平息后，斯特朗来到西藏，人们用担架抬着她走访，1960年，她发表了《西藏农奴站起来了》一书。

1962年，斯特朗办起了《中国通讯》，向美国公民介绍中国，据她的秘书回忆说：办好《中国通讯》对已年逾古稀的人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她要四处采访，与工农兵接触，还要推敲。有时，一篇书要改动十余次，甚至半夜起身，坐到打字机旁……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用专机把斯特朗接到上海，在锦江饭店为她隆重举办80寿辰的活动。晚上，周恩来又专门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这使斯特朗在中国的人生之旅达到了高峰。

1966年，中国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斯特朗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赖，她在《中国通讯》中，用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她向国外的读者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检阅接见来京大串连的百万“红卫兵”，斯特朗和其他一些在京的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几个“红卫兵”代表跑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些年轻幼稚的“红卫兵’认出了白发苍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老太太，就是当年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笑谈纸老虎的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时，一下子围了上来，不由分说，把“红卫兵”袖章戴在了她的胳臂上，并请斯特朗给他们作指示。斯特朗说：你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既要集中力量打击真正的敌人，同时也要慎重对待犯了错误的人们，要允许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但是，到了秋天，斯特朗对“文革”的态度谨慎了，她给美国女友埃米莉的信中写道：“隆隆鼓声，铿锵钹声，以及震天动地的前进步伐使我几周来一直睡不好觉了。”斯特朗看到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批斗老师，她称这是运动中“最具有混乱性的特点”，看到“和平大院”里的花匠师不再修整花园，盛开的鲜花凋零了，她怅然若失。当有人对她说，毛主席认为养花丧志，她生气地说：“果真如此！那么毛主席要吸烟，我可不打算吸烟。”她满怀怒火地写了一封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领导人廖承志，没有回音。接着，她又给其他的中国朋友写信，表示她对这场运动的忧虑。中国朋友只是劝慰她说，“新生的婴儿总会有幼稚举动，你不能因此就把她扔掉”。斯特朗写了一篇批评“文革”的长文，准备寄给《卫报》，并征求几位中国朋友的意见，他们都不赞成在国外发表这篇文章，她只好作罢。

斯特朗日夜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文革”运动，从她的老朋友陆定一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到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一批老共产党员、老干部——她在延安时的老相

识，被打倒，更加使她坐卧不宁了。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当刘少奇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消息传来时，斯特朗写道："昨晚我一直呆坐到大约凌晨一点钟。我在书桌前稳坐不动，除了思考着其他问题以外，还想到我在中国再也没有安全感了，想到我那么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奇妙感受……已为混乱不安的感觉所代替……"

斯特朗回忆起1946年在延安时，使她了解了中国的革命是如何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从一次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的。斯特朗在延安写出了《毛泽东思想》一文，于1947年2月发表在美国《亚美》杂志上……

想到这些往事，斯特朗又写道："我扪心自问，是什么引导我来访问中国的？是毛吗？我自问自答：又是又不是。至少可以肯定的说，绝不单纯是毛一个人。那时，这里没有任何单独的角色。就某些谈话来说，那是毛引导的。但是陆、刘两人，向我阐明了毛的思想。而今，他俩都被打下去了。引导过我的是毛，毛那时不是作为神仙，而是作为一群献身人民的著名能人所公认的起义首领和人民领袖。所有这些人是光辉灿烂的群星，我赞颂他们。而现在呢？如果毛要清除掉这些人，代之以林彪和红卫兵，我就感到首先是毛本身变了色。也许那会是更革命的，但是我不认为那样做就能增强革命的信心。只有当毛受到从朱德到周恩来那样一群杰出人物支持时，我才感受到革命的信心。"

对于大搞个人崇拜，斯特朗秉笔直书说："从人们熟知的毛的一切言行来看，他是赞成不同意见互相争鸣的。但是，中国现在逐渐把他神化了……这种崇拜狂会把我看成持异端的异教徒，因此使我心绪不宁，甚至失去了安全感。"

随着"文革"大动乱的越演越烈，已是耄耋之年的斯特朗，精神越来越不痛快，她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68年10月末，斯特朗写出新的遗嘱。她把自己在巴哈马的存款分赠给美国的进步民众团体和基督教"牧师基金"组织，用于争取公民权利的活动。她的不动产赠送给教会。在加拿大的存款，用于支持美国和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

1969年1月，斯特朗去南方过冬时，她期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她的自传。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为斯特朗签名留念

6月份，斯特朗的一个侄孙约翰·斯特朗，要到东南亚旅游，打算到中国来访问，看望她这个久别的老姑母。斯特朗为约翰获准访华，连续申请达5个月之久，而有关部门却一直不予答复，气得斯特朗说，"中国人都有一种我们西方人不能理解或不大喜爱的习惯，他们从来不说不办"，还说，"中国一贯被认为是善于区分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的，我属于美国人民，我的侄辈也是，我打算始终这样。"11月2日，她被唐明照告知，约翰不能获准访华了。斯特朗大为生气。她打算到金边去会见侄子，然后返回美国。她写信给唐明照说："这是因为我不愿意留在像今日中国这样难以捉摸的国度里。它拒绝承认我的任何美国亲属和朋友，而我想在去世前能看到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不像主席那样年轻，也不像他那么乐观。我并不指望活着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末日。因此，我最好能回美国贡献出我还有的微薄力量，在那美帝还起作用的唯一一块土地上，从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点滴斗争……如果我能活得更长，我很可能乐意重返中国。但是，更长的寿命看来是不可能了，返美后也未必乐意再返回今天的中国。"

斯特朗的侄孙约翰在国外拍电报给她，希望能在柬埔寨会见。1969年12月，斯特朗写信给周恩来说："请原谅我纯粹为私事而侵占您的时间。以往我曾多次麻烦您帮助我解决个人处境问题。而今，我不晓得我还能找其他什么人。"但周恩来未能作出答复。

1970年来临时，斯特朗的病情迅速恶化。她吃不下饭，严重失眠，既拒绝吃药，又拒绝住医院。到了3月，连呼吸也吃力了，她被送进协和医院（当时被改名"反帝医院"）治疗。许多中外朋友来看望她，劝她进食和静脉注射营养剂，她拒绝了。她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说话都

困难了，医生劝她不要同探望者说话，她就生气。她的老朋友马海德博士也告诫她不要多讲话。她说："我不打算让'医生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周恩来来到斯特朗的床前，轻柔地握住她那枯枝般的手，对她进行亲切的问候，然后耐心地劝导她吃饭、服药。并轻声说，"安娜，你要按照大夫们的嘱咐去做。"斯特朗看着周恩来那温和的脸，点了点头。周恩来又俯下身，微笑着对她说，"为了我们，为了全世界，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周恩来这段话，是重复了 23 年前，在延安将撤退时，动员斯特朗离开延安，回到美国去的那些话。

周恩来离开病房后，立即到医院的接待室会见一直等在那里的柯弗兰。柯弗兰是斯特朗在中国结识的朋友，她一直十分信赖他。周恩来问他是否知道斯特朗的侄孙约翰现在何处，并指示唐明照说："请他马上到北京来。"唐明照和柯弗兰立即发出电报请约翰速飞香港与中国旅行社联系飞北京。

周恩来探视后，斯特朗遵从医嘱接受治疗和进食，尽管她吃一点东西需要一个多小时。她精神好了一些，对柯弗兰夫妇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像过去多年那样。她催促柯弗兰把最近的国内外消息告诉她，她惦念着《中国通讯》第 70 期的撰写出版。

1970 年 3 月 29 日下午 7 时，斯特朗的病情突变。她令人惊讶地一鼓劲儿从病床上坐了起来，缓慢而坚定地环视病房四周的医护人员，用十分清晰的英语说了一句："这可能吗?"然后就瘫倒在床上，不一会儿，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们全力抢救，并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报告。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工作，他要求医生们尽一切可能挽救斯特朗的生命，等待她的侄孙到来。深夜 11 点钟，医生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说，经诊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去世了。这一天正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她的一个朋友说，虽然，斯特朗远离故乡，背弃了她的基督教家庭，但她在这一天去世，却是出奇的得体。　　（责任编辑　刘家驹）

1960 年，周恩来、邓颖超和斯特朗在海南岛

本刊举行
特邀编委、在京部分作者座谈会

本刊于 2 月 27 日在文采阁举行特邀编委、在京部分作者座谈会，与会者五十余人。会议由副社长方实主持，社长杜导正简要介绍了本刊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及今年的设想安排，并对到会的同志及未能到会的特邀编委、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与会的同志积极发言，对本刊给予热情肯定，也对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把刊物办得更好提出了很多中肯意见和宝贵建议。

参加会议的同志有（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守和、于光远、马仲廉、马仲扬、王强华、王俊彦、王戎笙、王景山、尹骐、方徨、申春、刘恪山、刘家驹、许人俊、宋文茂、何标、李庄、李普、李犁、李之琏、李耐因、陈英茨、苏双碧、吴思、吴象、张沛、张西洛、张黎群、杨克现、杨肇林、武际良、郑惠、周而复、贺茂芝、柯华、胡士弘、姚远方、洪炉、郝爱存、赵友慈、钱听涛、秦川、徐孔、凌云、曾彦修、谢景星、薛京、舒云、舒元璋、鲁谆、温济泽、廖盖隆、戴煌、魏久明

（本刊讯）

爱国华侨陈志昆传奇

● 张　彦

早在1894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了旨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最早的革命团体"复兴中国会社"，简称"兴中会"。这个革命组织，得到了夏威夷华侨的积极支持。那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华侨代代相传，今年业已86岁高龄的陈志昆先生，依然保持着这种爱国传统。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鲜为人知。我与他相识已近半个世纪，未听他透露过半句。不久前，我和老伴有幸应邀在他的檀香山寓所作客，与他夫妇俩朝夕相处，回顾人世沧桑，这位无限钟情于祖国的海外游子终于开口了。

早年，陈志昆的父亲来到夏威夷的白人种植园，干了三年苦力后，开始自己种地过日子，成了家，有了孩子。尽管生活依然贫困，他们省吃俭用供养陈志昆读完了大学。

青年时期的陈志昆，经常跑到檀香山的国民党党部，去看那里升起的"青天白日"旗帜，去读反映国内情况的报刊。那里展出的革命烈士被砍头的照片，激起他胸中的怒火。以后，他参加了进步报纸《自由新报》的工作，自己订阅了《新青年》杂志，更加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形势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夏威夷大学，他积极地投入了中国学生的支援祖国活动，并一度担任过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九一八"事变之后，陈志昆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变化：已经在国民政府担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回檀香山探亲时，看见自己内弟陈志昆朝气蓬勃，年轻而有大志，提出要带他去南京给他当英文秘书。陈志昆欣然同意。

由于孙科在当时政府里的特殊地位，也由于陈志昆与孙科的特殊关系，陈志昆在南京就成了"天之娇子"。他住在孙科家里，跟随孙左右，处理其文件，因而结识了不少院长、部长、省长、军长等大大小小人物。他还曾在训练总监部军官外国语学校教过英语，因而接触了许多年轻的热血军人。几年下来，陈志昆更成熟了，他目击了国民党官场上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的种种丑恶事实，他亲耳听到军官们对于蒋介石一心反共不愿抗日的强烈不满。当他向孙科暴露自己的失望情绪时，孙科流露出某些同感。据陈志昆回忆，孙科曾经这样对他说过："我们以革命起家，为的是推翻一个腐败的政权，建立一个革命的政权。没想到，如今我们却成了一场新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孙科这里所说的"新革命"，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他感到，孙科看得比较远，但他无力扭转历史。

卢沟桥一声炮响，孙科决定让陈志昆护送他的两个儿子到美国读书和避难。从此他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他入了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在这里，围绕他的是正在美国蓬勃展开的各种进步思潮。美国人民十分同情被侵略的中国人民。陈志昆结识了许多进步朋友，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他读了毛

陈志昆 1940 年去陕北三五九旅途中

陈志昆夫妇 1997 年在檀香山寓所

泽东的《论持久战》，吃惊地发现这个共产党人竟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了如指掌，而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这就使他对于延安、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柏克莱大学，中国青年沙志培写信给周恩来，介绍了陈志昆，并提出他想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仗的愿望。不久，周恩来给沙志培回信，表示热烈欢迎陈志昆回国参加抗战。还说，像他这样的人回去参加八路军，意义重大。但是，他担心，让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青年去过八路军的艰苦生活，不知他是否吃得消。

周恩来的这封信，改变了陈志昆的人生道路，使他的爱国赤诚得到了升华。他写信给孙科，十分坦率地表达了他想去延安的愿望。出乎意外，孙科回信赞赏道："没有想到，一个在檀香山的青年能有这样的志气！我希望我的两个儿子以您为榜样。"后来，当他踏上去延安之路时，孙科给予了物质上的帮助，还安排了沿途的照顾。

1939 年 8 月来到延安的陈志昆，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和他有过多次谈话，并请他共进过晚餐。他们的谈话，从孙科、孙中山谈到国共第一次和第二次合作，谈到蒋介石和今天的战局。毛没有骂蒋介石一句，也没有蔑视国民党的任何个人，而只是作客观、冷静的分析。陈志昆后来说："蒋给我的印象是一座坚硬的石头，头脑僵化，十分严肃，让人生畏。而毛却非常可亲，谈话轻松愉快，却又十分冷静，看问题总是比人高一筹、深一层。"

其实，陈志昆到延安后最早见到的领导人是周恩来。那一次正赶上周恩来乘马时右臂受伤，准备去莫斯科治疗，没有时间长谈。他们之间真正详细的交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周从苏联回来以后。谈话是在周的窑洞里，那天还有另一个领导人洛甫(即张闻天)在座，还有美国大夫马海德在为周的受伤手臂做按摩。陈志昆回忆道："在那一次的谈话中，我又一次提出上前线参加战斗的要求，他明确地对我说：'你要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那么现在就不是上前线去杀几个日本鬼子，而是回重庆去告诉孙科这些人你的所见所闻，看看他们怎么反应，促进大家共同把抗战进行到底。'这个答复太突然了，事过好久，我才逐渐体会到这个伟大人物的深思熟虑。"

经过辗转旅程以后，陈志昆回到战时的陪都重庆，他的突然归来连孙科也感到吃惊，别人当然更是猜测纷纭。陈志昆在与部分立法委员谈话中，如实地向他们介绍了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孙科警告陈志昆："不要再到处说延安了，人家的眼睛已经在监视你了！"当陈向他提出要再去陕北时，孙科断然拒绝，说："你最好别去了，否则蒋介石会怀疑你是我派去的代表。"

一天，孙科让陈志昆和他一起与三位特殊的客人共进午餐。一位是 1927 年来华的新西兰进步人士路易·艾黎，另两位是刘广培和梁希纯，他们都是搞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前者是顾问，后者是负责人。当时已形成运动的"工合"，是在抗战开始以后不久由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和艾黎发起组织的，其目的是在非敌占区建立这样的合作社以支援抗战。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宋庆龄和中共的支持，孙科认为，这正是最适合陈志昆的一个工作。果然，艾黎和刘与陈一见如故，立刻欢迎他参加"工合"一起干。从此，陈志昆进入了一个新的特殊战场。他奔走于西南、华南一带的城镇，帮助组织和推动"工合"运动。每到重庆，他必去中共代表团办事处见周恩来。

在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亡台湾的时候，孙科去美国了。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陈志昆重返夏威夷，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诞生后不久，他就举家来到了北京，根据他的特长，他被分配到外交出版社，担任向全世界推广发行对外介绍新中国的外文书刊的工作。从此，陈志昆终于实现了他的宿愿，献身于独立自主的中国。

1961 年，陈志昆移居香港。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为了推动中美贸易发展，他在香港成立了友结公司，协助美国大公司到中国投资和转让技术。

1987 年，陈志昆回到檀香山定居，一直为促进中美友好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1997 年，他难忘三件事：

一、3 月 9 日，中国海军访美抵达夏威夷，他在参观中感慨地说："这样现代化的军舰，中国人造、中国人开，华侨看了，开心，放心！"

二、7 月 1 日前，陈志昆携带全家来到香港，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过程。

三、10 月 26 日，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抵达夏威夷，江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他感到了强大的祖国使他挺直腰杆，扬眉吐气。

（责任编辑　仲　文）

真假天堂梦

● 靳树鹏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重播了长影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这部电影曾鼓舞人们满腔热情地去建设新生活。在欢庆的画面中出现了一副大字对联："人民公社架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这部影片是1958年三面红旗时代拍成的，编剧也好，导演也好，都不能挣脱那个"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头脑发热的时代氛围，但影片中并没有亩产多少万斤放高产卫星以及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等等极为荒唐的事情。剧作家马烽也没有作这样的媚时语，保持了他的创作良知。但影片的意境近似"六亿神州尽舜尧"了。在当时中国广大的贫困农村里，农民有多少生活上的苦难和精神上的苦闷呢？这些都不能怪艺术家"忽略"不计，当时许多人的头脑都在发热，正在做某种程度的天堂梦。

这使我想起髫龄时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反映苏联集体农庄类似天堂般的生活。扮演女主人公的苏联著名女演员拉迪尼娜，1952年曾来我国访问，访问之暇从中国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大堆床单、枕套等轻工业品，我国陪同她的人有些不理解。其实这没有什么难理解的。虽然苏联在1937年就宣布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但他们市场轻工业品的供应还不如刚建国三年的中国，他们的"幸福的生活"确确实实不怎么幸福。

天堂或天国，中国通常称为大同者，是人类一直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追求这个理想的，都是一些有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的先贤们。我国古代《礼记·礼运篇》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他所规划的大同世界中，是无国家，无家族的超然社会，甚至把人从生到死的各阶段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社会规划的理想境界是实现共产主义，其重要标志是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拟定的比较精确的定义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人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还有一个哲学表述，即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

这些先贤们都是怀着拯救人类的最美好情怀向往着这个理想境界的。但是，追求这种理想是一回事，把它在现实政治中实施并具体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我看来，没有理想的人群是可悲的，有理想的人群才是可尊敬的，尽管有时候这个理想在彼岸。毛泽东1958年8月视察河北徐水，觉得共产主义不是很遥远了。他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11月，他老人家读完《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后，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山东范县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划分六大项若干小项，从工农林渔、畜牧业到科学、文教、卫生、福利等等一应俱全，核心是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老人家说"是一首诗"，是因原件每部分规划结束时都有一段押韵的文字，其中一段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现在看来范县的"共产主义"是荒诞可笑的事，苏联当年就多次推出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表。在中国的领导人中也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头脑发热，另一位中央领导人也说过：完全可以设想，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单是领导人，普通百姓也头脑发热，贫苦的农民也容易产生空想。当然也有清醒的人，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到徐水一看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

赫鲁晓夫一直到晚年还把资本主义看成地狱，可他到了晚年也有所反思："我们为什么要为人民创造了好的生活，然后用七道大锁把边界锁起来呢？""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有时候我们苏联自己的公民讥笑说：'你们是在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是吗？'"是啊，天堂在未来会实现的，但它得一步一步走，急了不行，如果用强力去推行，那好事便变成坏事。前苏联吃了这个亏，中国也吃了这个亏。教训很深很深啊！（责任编辑　仲　文）

当代茶圣吴觉农

● 胡士弘

他为茶的祖国正名

吴觉农先生是我的乡契、年伯。我的老家与他家仅一街之隔。他家的“大夫第”台门对着我家的“进士第”台门，有一条小小的河绕过，可谓是“一衣带水”。

那是一个景色秀丽的浙东山城。那个山城出过《易经》的作者、道家创始人的魏伯阳和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那个山城古代属于会稽，现在叫做上虞市。

每年春天，满街飘散着茶叶的芳香。石板街两旁的茶栈里堆满了胀鼓鼓的布袋，那里面全是绿珍珠似的新茶。

从小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吴觉农，从这里走进了浙江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

1919年，吴觉农在农校毕业，掉棹东渡，去日本专门研究茶学了。

在日本静岗农业水产省茶叶试验场，吴觉农翻阅着一摞洋装书。

“茶的原产地在印度而非中国”，英国植物学家勃莱克写道。

“中国茶是印度亚萨种的变种。”这是另一个英国人勃朗所著《茶》一书中说的。

《日本大词典》也这么写着：“茶的自生地在东印度。”

再翻叶卜生的《茶》，日本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都无一例外地附和着勃莱克的观点。

一股无名的怒火从他胸中燃起：“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者，莫过于连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

吴觉农漏夜奋笔，写出的《茶树原产地考》。文章以事实说明，茶树原产于中国，驳斥了外国某些欺人之谈。

他还搜集并研究了世界各国茶业的情况和华茶之所以每况愈下的原因。

他痛切的认识到，除了因中国茶业因循守旧外，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以印茶取代华茶，是华茶失去国际市场的最大原因。

他的著作被毛泽东选为农民讲习所的培训教材

吴觉农认为，茶与丝一样，是中国在世人面前引以自豪的两大国宝，也是振兴中国农业的两大法宝。

他觉得，中国有种茶叶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失败者，是“在科学发展强烈的世界中不思改进，只依恃着自然的一点天惠而自命不凡”。

吴觉农对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识到华茶的衰落，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农民解放的问题，他写道：“如果创导农业，而不谋农民生活的健全；研究科学，而不为大多数的人民谋福利，尊物轻人，倒置本末，则农工愈发达，而农人工人的奴隶化也越进步了！”

在日本，吴觉农写了《中国农民问题》和《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两篇文章，发表于很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继而后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农民》、《美国农民团的政治运动》、《庚子赔款与中国农民》等一系列文章。

吴觉农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用社会主义现代新农业的观点，对我国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土地问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状况、农业科技与农民教育问题，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对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推进农民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与推动作用。

正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很赞赏这篇文章。他特地将这篇文章与吴觉农的另一篇《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编入培训教材。

1922年底，吴觉农学成回国，他报国无门，只好漂泊到上海，以卖文为生。

在上海，吴觉农以很大的精力投身于中华农学会的工作，并先后担任司库、总干事等职。

这期间，吴觉农还负责主编《中国农学会报》、《中华农学会通讯》等刊物，后又应上海新学会社的邀请，主编《新农业》季刊。

吴觉农在《新农业》的《发刊旨趣》上，呼喊青年学子到农村去。他说："要救中国，非研究农学、改造农村不可！"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以广州为中心闹得轰轰烈烈。

吴觉农寄希望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他便倡议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到广州去开。

吴觉农一到广州，便去拜会了毛泽东，并特地邀请毛泽东到年会上讲话。

广州年会召开一年后，即1927年的3月，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的同时，吴觉农也发表了《农民运动的意义与方针》一文。此文从现代科学技术与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的高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深刻而又科学地论述了农民运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性质与目的，以及如何达到运动目的等问题，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读来仍不失为一篇有现实意义的论著。

他与胡愈之等联名谴责"四·一二"政变

1927年4月12日，上海闸北

1952年吴觉农（右1）和茅盾（中）梅汝傲到维也纳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虹口一带，两百余名纠察队员，被蒋介石的军队打死打伤，凄厉的枪声仍不绝于耳，又不知打死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耳闻目睹反动派的暴行，吴觉农的内心无比悲愤。

吴觉农找到了小老乡胡愈之。还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他们两人便共同办起了一张用毛笔抄写的报纸。

"五四"开始，胡愈之便不断著文宣传科学与民主，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

1927年，吴觉农与胡愈之联合章锡琛、夏丏尊共同发起创办了开明书店。

满腔的悲愤燃烧着他们全身的热血。回到三德里吴寓，两人便再也压抑不住激愤之情。胡愈之便文不加点的奋笔疾书起来。

信是写给国民党"三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

信中写道："4月13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武器。群众行至鸿兴路口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前，卫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之群众瞄准扫射，历时约十五六分钟，""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

又说："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今乃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吾人始料所不及"。"革命可以不讲，目睹此率兽食人惨剧，则万难苟安默然"。

信是混和着血与泪写的。写得情挚意切，义正词严。

吴觉农和胡愈之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又连夜找知识界知名人士郑振铎、周予同、章锡琛等。他们也都深表赞同，在信上签了名。

周恩来看到了这封信，称誉此举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壮举"，并说，它足证"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

这封抗议信，作为中国革命的珍贵文物，现仍珍藏于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为拯救茶农，他首创茶叶统制

1931年初，应著名农学家邹秉文的邀请，担任了国民政府中央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技正兼茶叶处处长。

吴觉农不遗余力地勤奋工作着。他努力说服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把茶叶出口检验工作变成改进茶叶产制、提高华茶品质、扩大出口的契机。他组织茶叶专家到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等主要产茶区进行深入调查。他撰写出十三万言的《中国茶叶复兴计划》。为推广实施这一计划，他向各方奔走呼号，在茶叶主产省设立茶叶改良场，推行科学栽制，进行技术指导。

吴觉农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建立起了茶叶改良试验场。这些茶叶试验场都由他自己兼任场长，手把手地传授技术。为培养茶叶技术人才，他还创设了一批茶叶专科学校和培训班。后来茶叶改良试验场又扩展到了湘、鄂、闽、川、黔、粤等省。

吴觉农辛勤播下了科学的种子，因没有发展科学的气候结不出科学之果。虽然华茶的产量与品质有所回升，但出口茶叶及其生产者厄运仍在加深。

于是，他详细调查了茶叶产销中的各个环节。发现主宰中国出口茶叶命运的，是外国商人（洋行）和他们的代理人（洋行买办）。参与掠夺茶叶剩余价值的还有茶厂主和出口中间商（茶栈），以及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

为改变这一残酷的现实，吴觉农一方面再著文，深刻揭露茶农的悲惨生活与洋行、茶栈的重重盘剥和垄断操纵。另一方面，1933年到1935年间，他先后赴印度、锡兰、印尼、日本、英国和苏联等国作实地调查，以寻求打开华茶的销路。归国后，吴觉农提出了成立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与施行茶叶统购统销的倡议。

1936年4月1日，一块“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的牌子，在安徽省安庆市挂了出来。决定实行红茶统一运销。

吴觉农的这一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危及了垄断茶叶运销的上海茶栈赖以生存的独占数十年的生财之道。于是，上海市洋庄茶商以同业公会名义，发表了全体茶栈停兑汇票的含有威胁恐吓性的“痛切宣言”。接着，上海总商会和一些政要名流也联合通电，支持洋庄茶栈，历数红茶统制“摧残商业”、“政府与民争利”等等罪状。

统一运销刚刚起步便夭折了。吴觉农愤然在《中国农村》刊物上以《反帝反封建的半幕剧》为题，著文指出：

“红茶统制具备着相当反帝反封建的意义，然而，这个统制的基础先天根本脆弱。结果是茶叶反受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与代表封建残余的茶栈的统制，贫困的茶农因之而被统制于死地。反帝反封建的主角茶农被压在舞台之下，这剧演不到半幕便匆匆地收场了。”

活生生的事实，使吴觉农对社会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单纯从经济结构上来改变压榨茶农的残酷现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真正使茶农翻身，只有彻底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

他以茶易军火，支持抗日战争而竭尽心力

“九·一八”事变后，吴觉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一面捉笔为刀，撰写《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等书，揭露日寇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一面积极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工作。他为营救沈钧儒等抗日七君子而操劳，又为救国会成员孙晓村、曹孟君解除拘押而奔波。

当日寇的炮火向黄浦江、苏州河袭来时，他辞去了实业部茶叶检理处长和上海商品检验局技正茶叶出口检验处长的职务，带领薛暮桥和薛的爱人罗琼、王寅先以及一批茶人来到浙东四明山三界，开展救亡工作，并号召各地茶人来三界集合待命。

吴觉农一到三界，就与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打算利用这里山峦起伏、背山面海的有利地形，团结当地爱国人士和农民，以及从上海撤回乡的工人、学生，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不久，日寇占领杭州，敌我在钱塘江两岸隔江对峙，浙东形势也紧张起来。吴觉农计划组织民众在浙东打游击的设想，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

在一个落叶潇潇的秋日，吴觉农告别了爱妻陈宣昭和四个从三岁到十岁的子女，带领一批茶人，转辗到武汉，去寻求更重要的救亡工作。

在武汉，吴觉农做了一件对抗日卓有贡献的大事。

当时，苏联为支援我国抗日，答应供给一批军火。但中方却付不出钱。研究结果，决定以茶易军火。中方便派了吴觉农，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与苏方谈判。

吴觉农熟悉茶叶出口业务，又专门去苏联调查过苏联的茶叶销售市场。再加上他的口才又很好，双方只用了半天时间，便达成了以货易货的中苏贸易协定。

为了统一购销，在吴觉农的建议下，颁布了《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此时，吴觉农除了贸易委员会专员的名义，还担任了中国茶叶公司副总经理，香港富华贸

1980年欢迎台湾大学校长范寿康回国。

自左至右：胡愈之、叶圣陶、范寿康、邓颖超、吴觉农、杨静仁

易公司茶叶出口业务总负责人等职。

吴觉农日夜奔波于重庆、香港和全国各主要产茶区之间。公路盘山，弯急路险，经常发生翻车事故。吴觉农多次历险履难，在贵阳附近，因汽车翻入山谷，而九死一生。

尽管举步维艰，但吴觉农的工作终于取得很大成绩。从1938年起，茶叶收购量大增。这年，仅浙皖两省，便增加了十万箱以上，打破了历史最高记录。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各海运口岸被敌人封锁，茶叶出口受阻，茶农的生计又发生了困顿。

吴觉农非常着急。适时地提出了以茶养茶的主张。他希望政府贷款，推行更新茶林的运动，以保护茶园和补偿茶农因出口受阻而带来的损失。但国民党当局根本无人理睬，他的主张等于缘木求鱼。

值得欣慰的是，这期间他关于"茶业人才养成"的呼吁，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不但主持和指导创办了四川省立高等茶叶学校、安徽省茶务讲习所以及各省众多的训练班，还于1939年，在复旦大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学校的茶叶科系，并自兼主任和教授。

目前我国有近万名高级茶业技术人员，他们大都是吴觉农直接或间接培养起来的。特别是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

回重庆后，他经常与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陈翰笙、屈武等交往，参加了他们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的政治空气日益恶化。对于像吴觉农这样的一位"异端"，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当局疑忌。孔祥熙就曾公开对人说："吴觉农是异党分子，不能重用。"

吴觉农听后一笑置之，说："老孔也太抬举我了。做共产党员哪有那么容易!"

不久，国民党真的对他采取了行动。一天，特务头子徐恩曾以宴请为名，对吴觉农进行了"规劝"。

之后，贸易委员会给了他一笔款子让他远走高飞，带了一批茶人，在碧水丹山的武夷山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多学科的茶叶研究基地，以便选育良种进行推广。

在白色恐怖下，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2年的一天，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的经济学家吴大昆突然被传唤，他被告知说："你的叔叔来保释你了。"

吴大昆愣住了。相见之下，才知这叔叔不是别人，而是他所敬重的吴觉农先生。

吴觉农将吴大昆领出监狱后，又介绍吴大昆到设在建阳的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吴大昆的教学生涯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腥风血雨的革命低潮时期，吴觉农在上海的家，成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庇护所。

吴觉农的夫人陈宣昭女士，也是日本留学生。她是一位蚕桑专家。起初她在杭州蚕桑研究所工作，每次回上海，总见到窄小的居室里，坐满了宾朋。晚上，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卧室让给朋友，他们则在楼下搭地铺安身。

吴觉农、陈宣昭夫妇

蔡叔厚是曾被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认为应得到列宁勋章的革命者，1931 年到 1935 年间，中共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吴觉农的家也成了蔡叔厚的隐蔽地。

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夏衍，他家户口簿上填的户主名字，长期写的是吴觉农夫人陈宣昭的名字。

吴觉农与夏衍，早在杭州读书时，便是要好的同学。后来两人又一起留学日本。夏衍在日本学的是机械。夏回国后，他本来想去教书，吴觉农觉得可惜，便劝说他道："你的文笔很好，我把你介绍给夏丏尊。你就写写文章，搞搞翻译吧。"

从此，夏衍就踏上了文学之路。《我与"茶圣"》的回忆文章中，说他与吴觉农是相交相知逾六十年的老友。

1932 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党组织破坏殆尽。这时，刘鼎（当时叫阚尊民，建国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和爱人吴先清刚从苏联回到上海，因找不到党组织，流落街头，正巧，吴先清在街头遇见陈宣昭。她们是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

就这样，刘鼎和吴先清便在吴觉农家里住了下来。

在吴觉农的帮助下，刘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党决定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吴觉农为了刘鼎的安全，亲自送他上火车，直到火车开动后，吴觉农才放心地离开车站。

吴先清因怀有身孕，没有与刘鼎同去中央苏区，她留了下来。她在吴觉农家生下孩子，一直住到 1934 年，才又去了苏联。

1934 年，吴觉农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唯一公开刊物。在此期间，《中国农村》在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方面，起了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

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策反汤恩伯

抗日战争胜利后，初回上海的吴觉农居无定处。这时，他在日本结识的汤恩伯是京沪杭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得悉他没有地方住，便对他说："你要什么房子，你自己挑好了。"

当时日伪遗留的房产很多，又有汤总司令的一句话，什么样的好房子还不是随他挑！

然而，吴觉农独独看中了四川北路山阴路底大陆新村的两间极普通的三层楼房（九号和十号），用重金将它们买了下来。

这房子对吴觉农来说却是极其珍贵的。因为这里正是当年鲁迅住过的地方。吴觉农与鲁迅曾有过不少交往。他把这两间房子买下来，是为了有朝一日将它们作为对鲁迅的永久纪念地。解放后，吴觉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将这两间房子无偿地献给了国家，成了今天万人瞻仰的上海鲁迅纪念馆。

在这里，吴觉农担任了中共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董事长，他就是通过这里，不断向解放区提供着经济信息。

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合众企业公司"。他便通过这个公司，积极购运解放区所急需的物资。

解放战争后期，上海环境更加恶化。就在此时，吴觉农协助许多进步人士向海外转移。

国民党的统治频临瓦解前夕，吴觉农积极营救了共产党人张锡昌、陈四维等出狱，又设法保护著名人士马寅初、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使他们免遭国民党的劫持。吴觉农还亲自陪著名农学家梁希（建国后首任林业部长）到杭州，躲避在吴觉农办的之江茶业公司里，逃过了国民党的迫害。

梁希曾为此写了一首诗赠吴觉农：

以身殉道一身轻，
与君同仇倍有情；
起看星河含曙意，
愿抛鲜血荐黎明。

当解放战争的炮火逼近上海的时候，为防止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遭受战火的毁灭性的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希望吴觉农利用他与汤恩伯老同学的关系，争取汤恩伯仿效傅作义的"北平方式"，举行和平起义。吴觉农欣然应命。

吴觉农不但自己与汤恩伯是同学，两人私交极深，而且他的夫人陈宣昭是汤恩伯夫人王竞白的同乡兼同学，两人同赴日本学蚕桑，彼

此交谊非同一般。

两人考虑，还是先由陈宣昭出面，向王竞白探探口气。

不料，王竞白听后，紧蹙眉头直摇头："老汤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弄不好他会翻脸的。你们不怕掉脑袋吗?"

陈宣昭将王竞白的态度与意见告诉给吴觉农。吴觉农想了想，慨然说道：

"为了争取减少牺牲，平安保全上海，拼上脑袋一试也是值得的。"

不一日，吴觉农便亲自找汤恩伯，与他密谈，晓以国家民族大义，说服他学习傅作义将军，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弃暗投明，保全上海，为民族造福，为新中国立功。

几经交谈，汤恩伯倒是没有翻脸，只是顾虑很大，内心很矛盾，显得忧心忡忡。客观上，此时蒋介石正亲临上海，并已在汤恩伯周围密布了特务坐探，使他身不由己。

汤恩伯对吴觉农说："我杀共产党太多了，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又问，"你吴觉农到底与共产党有多大的关系？你能保证我的身家性命吗?"

吴觉农虽苦口婆心，导之以中共的政策，汤恩伯还是不信，也就只好作罢。

随后，汤恩伯为了自己保命，供出了他的恩师陈仪劝他起义的信。陈仪后来被蒋介石逮往台湾杀害。

老而弥坚，年过九秩仍不忘振兴华茶

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吴觉农不禁激动得流下了滚滚热泪。

一部由吴觉农主编的长达六十余万字的《茶叶全书》，作为对新中国的献礼，已于迎接解放的日子里编印出版，以此为新中国培养茶叶人才作理论准备。

新中国给年过半百的吴觉农带来了二度青春。他应周恩来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并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任副秘书长、常委)。他不失时机地主持召开了全国茶叶产销会议，研究制定了新中国的茶叶发展政策与方针，部署建立了各级茶叶产制运销机构。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吴觉农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

建国初期，国内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吴觉农运用对国内外产销情况也如指掌的优势，和长期研究与实践积累的可贵经验，应付裕如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并亲自深入各地指导。可以说，社会主义新中国茶叶事业的每一成就，都倾注着吴觉农的智慧与大量的心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觉农已届八十高龄，但他仍壮心不已，他积极摸情况，听汇报，研究茶叶发展前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

70年代后期，茶叶产不够销。正在生病住医院的吴觉农知道后，很是着急。就在病榻旁，他与有关人员研究，提出要对西南茶区的大叶种红碎茶加强宣传和提倡。当得知红碎茶出口亏损大时，他还亲自找有关部门商谈，倡议茶叶出口免税。

1978年11月，吴觉农写了《关于发展云南、广西、广东以及海南岛等地区红细茶生产前景》的报告，送交国务院。

这时，他虽已年届髦耋，但仍亲往海南岛视察。他鼓励当地茶场多产大叶种红碎茶，以扩大出口，并建议他们搞几十万亩胶茶间作地。回京后，他又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有关茶叶成本、价格和免税三点建议。

80年代初，吴觉农向中央领导写信，报告广西左右江地区生产的红碎茶品质很好，将来能超过印度、斯里兰卡的产品。中央领导接受了他的意见，指示应加快发展。吴觉农还建议成立中国茶叶出口公司，归外贸部门领导，以利出口。

在吴觉农的积极建议下，我国出口茶叶，从1984年起，就连续超过历史最高记录，达到十五万五千吨以上，实现了吴觉农毕生为之奋斗的"重振华茶雄风"的夙望。

晚年的吴老，善眉慈目，精神矍铄，身子骨很硬朗。我有时去看望他。他说不完的话题，便是一个"茶"字。他自己也终日扶着一把陶壶，谈话时，时不时地呷上一口茶。

在饮茶问题上，吴师母陈宣昭女士与他志同道合。吴师母虽然满头银丝，但风度清雅，耳聪目明，不像是一个苍桑老人。她的长寿秘诀，也是由于长年饮红茶牛奶。

直到临终前，吴老仍念念不忘振兴华茶事业。他在同我谈及华茶发展的前景时，说："如果更多的茶叶出口基地建成，将会大大增加茶叶的外销量，便能使华茶遍销全球，使我国真正成为茶叶的巨人!"说着他开怀地笑起来。

吴觉农虽于1989年10月28日，以九二高龄谢世。但他在茶科学和茶文化上树起的丰碑，将是不朽的。现在，全国各地茶人每年都开展"吴觉农研究"的学术活动。

座落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中国茶叶博物馆里，专门辟有"吴觉农展室"，并塑有他的铜像，以介绍吴觉农的丰功伟绩，以便后人永远纪念吴觉农这位中国现代的"茶圣"，激励人们热爱祖国的茶文化，发展祖国的茶科学。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李铎与《孙子兵法》碑拓

● 任永忠

1997年，《李铎书〈孙子兵法〉碑拓全集》出版，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及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出席了首发式。

李铎是中国军事博物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六千多字的《孙子兵法》，被李铎的如椽大笔，书写在158张长140厘米、宽70厘米的宣纸上，然后刻碑拓片。从篇首观看到篇尾，要走半里路长。这部把兵法与书法融为一体、相映生辉的作品，让人流连在变化莫测的古代军阵之中。

年逾八旬的书协名誉主席启功先生观看了长卷拓片，十分高兴，欣然赋诗：

猿臂伸来录异书，淋漓点画古藤粗。
鸿都门下中郎笔，视此毫情逊不如。
六千文字百余石，信手镌来若等闲。
纵使庞涓逃树下，也难擎此重如山。

李铎，字青槐，193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

1949年，家乡解放，他考上了中南军政大学，李铎入伍后，参加了护路、剿匪和解放南澳岛的战斗，后来被选送到河南信阳步兵学校学习三年。其间，不管是打仗、工作或上学，他都利用空余时间练字。

1959年，他被选调到军事博物馆担任解说员。良好的环境，使他练字的劲头越来越足。

当时，西单有家旧书店，他就利用休息时间步行去翻看字帖，从那些荟萃精华的字帖中，默记下笔锋。白天的空闲，他用手指醮墨水在办公桌上练，天长日久，桌面漆皮被磨掉，印出一大块黑痕；晚上，他到洗漱间的磁砖上练。下雪天，他就到露天雪地上用大笤帚练。他还发明一种临摹方法，就是把凳子翻过来，凳脚上放块玻璃，下面放盏灯，将字帖放在玻璃上用灯光一照，把字清楚地勾下来。

李铎临帖先学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王羲之、王献之，后临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旁及郑板桥、何子贞，广征博采，兼收并蓄，以魏隶入行，独创出古拙、苍劲、雍容大度又舒展流畅的风格。

60年代，他还仿郭沫若体。一次，他临写郭老书毛泽东诗词27首的册页，送到郭老那里，郭老看过笑着说："哟，还真后继有人哩！"

1977年，李铎被请到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作了书法表演。名声大震，约字如潮。

80年代中期，李铎第一本字贴《李铎书前后出师表》出版。欧阳中石给予很高评价，在为其撰文时写道："我仔细琢磨了他的字；有了《石门铭》的开拓，有了《瘗鹤铭》的洒脱，有了《争座位》的雄强，有了《松风阁》的驰张；其用墨，浓厚枯滞；其用笔，老练凝涩；整幅作品气息畅贯，结章天然如铸。"

李铎钟情于《孙子兵法》，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缘由。

那是80年代后期，他出访日本。

他漫游异国的土地，发现一个奇特现象，许多公园都竖着写有"风林火山"四个大字的标牌。

他问日方陪同人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李铎与作者在一起

“呵，这是你们国家的大军事家的名言！”

“我国大军事家……”李铎常年在军事博物馆工作，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也知道不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句话呀？他纳闷了。

对方见李铎真的不明白，就详细讲述这句话的来历。

他说：“相传很久以前，日本本土发生战争，派了很多将领去征战，都大败而归。后来，派了一位懂中国《孙子兵法》的将军去，他按其兵书中“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谋略指挥队伍，结果打了大胜仗。后来，人们为了记着这位大将军和《孙子兵法》中的这段话，缩写成‘风林火山’，制成标牌竖立在各大公园，让人人皆知，代代相传。”

听到这里，李铎陷入深思。

他非常清楚，《孙子兵法》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声誉，它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成书早两千多年。唐初传入日本，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明代又传入欧洲各国。

李铎想，这部世界名著的军事思想，已运用到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孙子兵法》发源地的我国，并不是尽人皆知的。

李铎决定将这部流传两千年，字字珠玑、光耀千秋的兵家宝典用书法形式记载下来，让艺术与战术、书法与兵法珠联璧合。

1990年李铎书《孙子兵法新校字帖》出版，日本友人将书赠与日本天皇、皇族及军政要员。字帖长逾百米的原稿，被日本收藏。

1990年，河南洛阳鸲苑碑林，一再提出把《孙子兵法》刻成长碑。几经商议，李铎决定重新书写，交付其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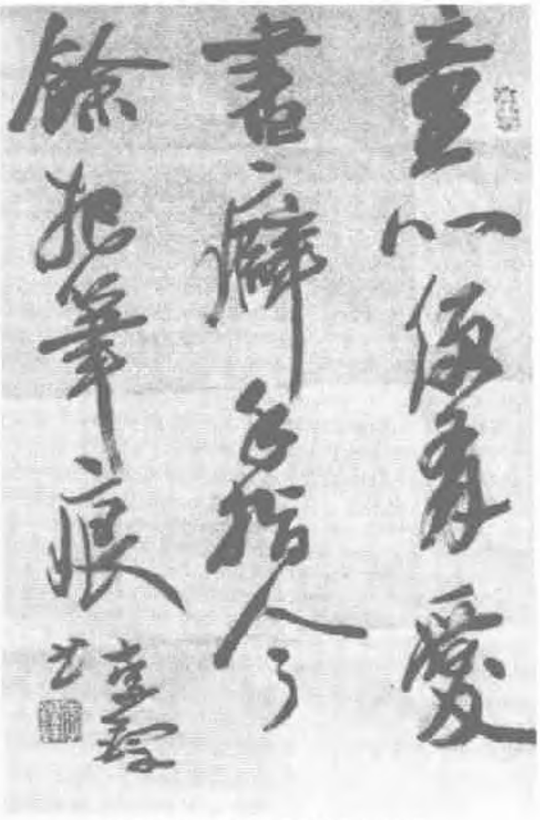
由于社会上流传版本存在差异，李铎选择了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为母本，同时再选几个不同朝代版本，动员全家，一字一句地进行校订。然后他反复研究研读，深探内涵。

最后，李铎闭门谢客，日夜运笔。妻子李长华默契配合，用尺子压着原稿一字一句地念，他一字一句地写。写完一句校一句，前后历时八个月，1994年3月终于完成了书写工作。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共用宣纸158张，接起来有220余米长。全书6000多字，书写1000多行，风格一致，浑然天成。

接着，河南碑刻专家张弘先生全家上阵，费时数月将李铎书《孙子兵法》碑刻完成。

1997年8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李铎书〈孙子兵法〉碑拓全集》首发式在这里举行。中央军委领导出席了首发式。



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

这本碑拓八开本，648页，书重7公斤。多次当成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国礼”传到世界各地。

自70年代起，李铎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流传到联合国、美国、独联体、英国、德国、法国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书法之余，李铎还喜欢填词作赋。一次，江苏连云港派人进京请李铎帮助写幅对联，并要求把“连云港”三字嵌进去。他挥毫而就：

云海云天海天一色，

连山连港山港齐辉。

1985年10月15日，李铎应邀参加武汉黄鹤楼重建落成笔会，他书七绝一首：

客子停舟欲上楼，登临回望楚江秋。

乡书日夜浮黄鹤，闲却霜天万里鸥。

面对成功，他说，书法无止境，下一步奋斗的目标：一是吸取前人的精华，二是努力超越自己，向着书法艺术新的高峰继续迈进。

（责任编辑　刘　文）

折叠伞、三轮车、蜂窝煤的发明者

● 陈英茨

多年来，每遇烈日当头或细雨纷霏，都能看到人们擎着像花朵一样的折叠伞在大街小巷川流飘动，那种直柄的老式油纸雨伞，几近绝迹了。

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从海外引进的技术、其实，早在30年代初，我国的著名机械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老焱若就发明出来了。他看到旧式雨伞在雨前雨后携带极不便，还发出一股熏人的桐油味，便想出用丝绸做面、钢架拆叠的雨伞，还可以把伞柄缩短后，放在手提包里。样品制成了，找不到厂家生产。因为那时人民收入很低，买不起价格比直柄伞高的折叠伞。后来这种技术传到上海，有少量产品面市，不久也因滞销停止了生产。

老焱若出生于书香门第，喜好钻研科学技术。他的岳父唐景崇在任两广总督时，海边停泊着一艘烧坏的轮船，引起了他很大兴趣。于是他每天上船琢磨，终于仿制成了一艘一米多长的蒸汽轮船，他的岳父和众多官员惊奇不已，其时他只18岁。

1905年，他岳父出任吏部尚书，老焱若随岳父北上，到唐山火车头南厂任技师和工程师等职，十年间，他对机械工艺的技术和理论造诣日深，1915年回北京任农商部度量衡权度制造所技正。1930年，到北平新大机械厂和中孚工厂任总工程师。1932年至1937年，在北平艺术学院和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授。

那时，北平的人力车很多，是从日本传入的，人们通称为洋车或东洋车。拉洋车的社会地位低下，而坐洋车的却是官宦人家。老焱若看到那些年老体衰和未成年的人拉着洋车艰难地奔跑，感到钻心的疼痛。他决意要发明一种轻便省力的车，代替旧洋车。他想到自行车，如若在后面再加一个轮，骑着拉人、载货，不就平稳轻巧了吗？经他潜心研究，终于在40年代初制成了第一辆三轮车。产品出来之后，洋车厂主和有点积蓄的洋车夫们，都积极争相购买，很快，三轮车和洋车就平分了天下，此后，他又研制成平板三轮车，专用于运货。

近些年来，载人的新三轮车又出现在街头，多数还改成了双人座，海外来京旅游的人坐在三轮车上，逛大街、遛胡同，欣赏这座古老城市的风光和景物。

老教授的又一功绩是发明了蜂窝煤和蜂窝炉子。多少年来，北京市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火炉子，做饭取暖，都烧煤球，家庭主妇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劈柴生火，弄得满院烟雾迷漫，冬天还要储存许多煤球，既脏乱，又挡道。煤厂的“煤黑子”更辛苦，每天不停地把制煤球的铁筛子摇来晃去。老教授决心研究出一种机械，代替这种笨重的劳动，经过一番努力，40年代就制成了蜂窝煤机；机制的蜂窝煤热量高，烧得透，又便于封火。不仅大大减轻了工人和主妇们的劳动，还节约了大量煤炭和木柴，减少了空气的污染。苏联有关部门在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报道后，曾致函老教授，请教如何解决苏联民用煤的问题，老教授作了详细答复。

老焱若教授

建国初期，他还研制成了“三用抽水机”，为我国农村的吃水和农田灌溉解决了大问题。

他在担任北师大教授的同时，还提任了北京市二十多个大中型工厂技术顾问，为这些工厂创制了许多先进的机器和解决了大量难题。

老教授还应文化部的委托，为首都剧场设计并监制了自动大型旋转舞台。老教授还是杰出的摄影家，早在20年代，他就同陈万里等组建了我国每一个摄影团体——光社，培养了许多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他的摄影作品多次参加摄影展，受到摄影界的高度评价。

他从师大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进行机械工艺方面的研究创造，因年老体衰，先后请了他自己的几个学生帮忙，不料“文革”一起，便被打成“资本家”。受尽了凌辱不说，所有的书籍财物以及他研制的各种工具、模具和新设计产品的图纸等，被洗掠一空。83岁的老教授，一病不起，于1966年10月凄惨地死去。

（责任编辑　仲　文）

贺绿汀说周璇

● 陈浩望

音乐家贺绿汀晚年回到故乡邵阳时，曾向乡亲们谈起他走进上海滩后和周璇交往的情景：

贺绿汀认识周璇是在 1935 年，那时周璇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踏进电影圈子，在艺华公司出的少数几部所谓"软性片"中跑龙套。不久，周璇加入了左翼进步电影的行列，开始在许幸之导演的救亡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接着在史东山根据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改编并亲自执导的讽刺喜剧片《狂欢之夜》中扮演县长千金。正巧这两部片子都由贺绿汀配乐，就在这时贺绿汀认识了周璇。

贺绿汀发现周璇的音乐天赋，是明星公司拍摄《马路天使》的时候。周璇扮演歌女小红，贺绿汀担任该片的作曲。导演袁牧之找了《哭七七》、《知心客》两首苏州民谣曲子，要田汉重新填了词，让贺绿汀改编，作为片中的插曲，这就是传唱至今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

贺绿汀先把两首民谣的唱片收集来，反复地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对这两首民谣的旋律进行艺术上加工，使之更为完整。同时在配器上也费了一番心思：他没有采取演唱者怎么唱，乐队就怎么跟的"大包腔"这种一般的方法，而是用了"对位体"来处理的。

《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是由百代公司灌成唱片的。录音之前，贺绿汀找周璇一起研究了表情和唱法。她领悟力很强，学得也快，尽管她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音乐训练，对于作曲的意图和民谣的风格，稍经点拨，一下子就抓住了。

合作过程中，贺绿汀发现周璇单纯天真，聪明本分。在学习上，很有上进心；对待艺术也很严肃。演戏也好，唱歌也好，她总是认认真真，毫不做作。和当时那些装腔作势，卖弄风情，专唱黄色歌曲的"歌星"完全不同。

以后，周璇找过贺绿汀好几次。贺绿汀要她好好学习，可以买架钢琴，自己学学，趁着年轻，多学点音乐知识；还送过一些曲谱给她。抗战爆发，贺绿汀随演剧一队去了内地，周璇还是留在上海拍电影。

1941 年"皖南事变"后，贺绿汀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准备到皖南新四军去。他离开重庆，经香港到了上海，住在音专同学张昊家里，等待交通来接应。

这时的周璇已经拍过很多戏，是个名气很响的电影明星了。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打听到贺绿汀来到上海的消息的，一天，她突然来到张昊的亭子间里，一见贺绿汀就说："这个短命戏我不拍了！我跟你走，到新四军去！"说得很恳切，也很坚决。听得出来，她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不满意，向往新的生活和要求进步的心情是急迫的。这一切都很使贺绿汀感动，但是考虑到周璇当时的名气已经很大，社会上知道她，日本人也知道她。要是她一走，势必会惊动日本人，这样就对她很不利。再说贺绿汀是秘密到上海来的，带她一起去新四军，过于招风，很可能不仅周璇走不成，甚至连贺绿汀也走不成。即使到了那里，像周璇这样一个长期在大城市住惯了的名演员，不见得能够适应新四军的艰苦生活环境。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贺绿汀一到新四军，就碰上了敌人的五月大扫荡，华中鲁艺死了很多人。魏鹤龄(著名电影演员)的侄子魏镇、许幸之的侄子许睛、丘东平(作家)等都在这次大扫荡中牺牲了，戏剧家邵惟也被捕了。贺绿汀和许幸之因为陈毅作了安排，送到一个地主家"打埋伏"，才幸免遭难。

周璇提出要跟贺绿汀到新四军去时，贺绿汀是这样劝她的："要是走，还是去香港，到了那里，可以找蔡楚生。上海电影界已有不少人士在香港了，去那里好，不要在上海呆了。"周璇后来果真去了香港。

解放后，贺绿汀调到上海工作。周璇也从香港回来，贺绿汀无暇去找她，不久听说她患了精神病，要找她就更不容易。又过了几年，忽然传来噩耗：周璇病死了。在万国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的那天，贺绿汀赶去向她的遗体告别，才见了她最后一面。

周璇出身清寒，尝够了旧社会的苦头，连养父养母都对她百般敲诈勒索。一个弱女子，一位名演员，就这样好端端地被摧残、被断送了！贺老感慨系之地说："周璇的遭遇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责任编辑　仲　文）

皇庄考略

● 张宝年

分布在北京、天津、保定周围的皇庄，名传久远，它比一般村庄都大，至今多为乡一级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皇庄，作为明朝特有的社会现象，已引起不少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对它的产生、分布、发展、衰落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将对当今发展经济产生借鉴作用。

明朝景泰年间，皇上把原属东宫的宅邸和土地硬是立庄称“皇”，于是出现了皇庄的名字。这一称谓，在当时就有大臣反对，上奏曰：四海之内皆属王土，为什么单把这块庄田称为皇庄呢？这不是有损于圣德之光吗？但金口玉言，是不能更改的。其实，皇上是别有用意的。

1465年，宪宗继位。将抄没顺义县安东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土地75顷，拨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成化年间又增宝坻县王浦营皇庄一处。此后，朝廷各宫相继效尤，纷纷建立起本宫的皇庄。就连太监、中官、贵戚也跑马占圈，侵占民田、草场。一时间，皇家贵胄的庄田遍郡县。如：弘治(1488)初，增建丰润、新城、雄县皇庄三处；十八年三月，又在大兴县建庄七处。接着在昌平州、隆平县、新河县、南宫县、东安县、宝坻县、通州、武清县、静海县相继建了几十处。

在宝坻县，不仅有仁寿宫皇庄，还有不少王府的皇庄以及公侯、锦衣卫皇庄。宝坻的牧场和监地也都被中官所盘踞。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由领庄太监刘瑾到这里建立皇庄，称李子沽皇庄。至万历年间，这个皇庄已是著名的大镇了。刘瑾豢养的那些官吏给皇庄百姓带来三大灾难：一是养死了马匹要赔款；二是打芦苇编苇席，供建陵用，官吏从中勒索；三是贡银鱼。由于官吏完不成任务，硬是把一群孩子给判了罪。判的是“惊散银鱼罪。”

明天顺八年至正德九年，皇朝在北京、天津、保定北部一带共建皇庄三十四处。总占地37596顷零46亩。

皇庄的出现，始终遭到老百姓反对，主要表现在对百姓的搜刮与盘剥方面。如成化年间，太监刘永诚献出一块庄田，本应还民佃种，大臣上奏，宪宗批道：“刘永诚退还的官地，朕自处之。”这样，皇上还是把这块地建了皇庄。据成化十六年五月实录：“天子以四海为家，普天率土，莫非所有，何必与贪民较锥刀之利，似为不雅。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

皇威浩荡，宪宗皇帝是不会去顾及史官们说三道四的，值得我们探索的，倒是它那深厚的社会根源。

首先，皇庄是地主阶级利益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其次，明朝经洪武、永乐两朝的恢复，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皇帝与市场有发生关系的欲望。于是皇权冲破官禁，更为有准备地利用国土资源，为开展市场经济准备银两。再次，明皇权空前强化，要有更多的人力、财力做保证，必须广开财源。在当时条件下，立庄招佃收租，不失为增加收入之一法。第四，皇室在经济思想与财富观上有很大的改变，他们认为：山川、土地、蕴藏，是财富增殖的重要凭借。因此，他们大建皇庄，多途聚敛财富。第五，就是思想解放。天顺、成化以后，明初建立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渐趋松懈，市民阶层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传统的礼教观念也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人们在受到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到有了自由，所以商品经济十分活跃。那么朝廷参与经济活动并采取独有的手段——建立皇庄，已是大势所趋。

皇庄既立，就要有管理皇庄的太监，有奏带的旗校，有跟随的名下，每处皇庄一般要有三四十人。当地豪横见有利可图，便去到皇庄那里投为庄头。庄头，名义上是给皇庄收租，实际上给管庄的官役充当打手，如：占房屋，敛财物，污妇女。

还有皇庄那些管庄的人，大多是中官，亦称中使。这些官吏是受朝廷指派专门负责为皇庄收税的官役。他们权力很大，征粮无度。按规定每亩收租五升，他们却要二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皇庄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靠侵夺民田，与民争利。致使生民失业，流离困苦，再加上宦官乱政，几乎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尽管在明朝设置了都察院，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代替皇上巡视地方，纠察百官；又专门设置了六科给事中，主要监察六部官吏的贪污行为，但是，在封建专政的体制中，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在皇庄最兴盛的万历之后不久，明朝就迅速走向了灭亡。

到了清朝，皇庄就不行了。代之而来的是旗人圈地。庄头的肆意行为已受到清廷的整饬。至乾隆十年(1745年)连宝坻县皇庄的名字也改为黄庄了。那么其他地方的皇庄呢？即使还有叫皇庄的，已不是皇家的庄田了。

（责任编辑　仲　文）

炎黄春秋

1987年11月历史学家[illegible]工作室

陈方安生与丈夫合影

名将之后—陈方安生

常荫槐之子谈常荫槐

斯特朗沉痛反“文革”

当代茶圣吴觉农

张经武将军之死

炎黄春秋（总第七十三期）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4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